

汪精衛主義讀本
冊上



汪精衛主義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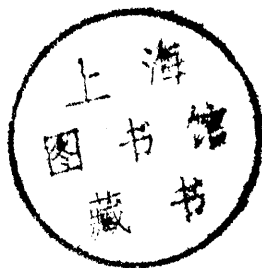
(冊 上)

編者 江蘇省教育廳
校訂者 袁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5705B



政治月刊社發行

中華民國卅一年二月十五日

53652

關於汪精衛主義問題 (代序)

我們今天是研究「汪精衛主義」問題，不是研究汪先生的哲學思想、文學藝術或汪先生個人的人生觀問題；我們今天研究的對象是汪先生的「政治思想」，「政治戰術與策略」及汪先生的「政治作風」問題。雖然有許多問題要聯繫到汪先生的哲學、文學、人生觀方面的材料之引證，但這都是以政治為中心的。若寫汪先生傳記，當然無所不包；但研究「汪精衛主義」，就只能以政治為其中心，為其範疇了。

一 汪精衛主義的歷史根源

汪先生誕生於歐美帝國主義東侵已達極高峯時代，誕生於中國滿清統治階級的腐敗已達頂點的時代，誕生於日本民治維新的改革任務已經勝利的時代，這時代全亞洲除日本外，無一個整的民族，無一個整的國家，而且無一完善的革命政黨。汪先生恰於此時代加入了孫總理的革命營壘，追隨孫總理之左右為三民主義的政治任務，政治組織政治工作而奮鬥了。由此而證明汪精衛主義的時代背景，與三民主義的時代背景是不可分離的，汪先生的政治運動史，與三民主義的政治運動史也是不可分離的。

但是，一班汪先生的中外反對派，或各種汪先生的中外反對派，對這一問題曾作過許多曲解。在某一時期說汪先生是三民主義中的「極左派」；在某一時期又說汪先生是三民主義中的「極右派」。在北伐戰爭時代，歐美帝國主義及蘇聯曾用「左」的帽子來加害過汪先生，在中日戰爭時代，歐美帝國主義及蘇聯又用「右」的帽子來加害汪先生了。他們從「左」邊來反抗時，說汪先生的思想只是代表工農商學兵中的小資產階級內最惡化的一層；他們從「右」邊來反抗時，說汪先生的思想只代表地主買辦資本家中最保守的一層。他們無論其在何時代何地方總企圖將汪先生的政治思想背景與政治思想內容抬到三

民主義以外，或擺在三民主義的某一角上，夫然後便利用自己的政治思想來作爲三民主義的正統思想，以自己的政治組織來代替國民黨的正統組織。

當北伐戰爭時代，那蘇聯企圖以共產主義來代替三民主義正統時代，他們雖然目「西山會議派」是三民主義的右翼是對的，因爲那時西山會議派是違反孫總理手定政策而暗中與英美勾結；但他們目汪先生爲三民主義的「左」派是錯的，是否決三民主義政治正統與組織正統的，其目的是企圖以共產主義代替三民主義，以共產黨來代替國民黨的。

當中日戰爭時代，即英美企圖以帝國主義來代三民主義正統時代，他們雖然目共產派爲三民主義的反對派是對的，因爲這時的共產派是違反孫總理的反馬克司主義思想的，（孫總理反馬克思主義的論據在他的民生主義演講中發揮特多，他批判馬克思學說是「倒因爲果」，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沒有絲毫相同之處）而且這兩種主義根本就混同；但他們目汪先生爲三民主義的「右」派是錯的，是否決三民主義的政治正統與組織正統的，其目的是企圖以歐美帝國主義代替三民主義，以歐美帝國主義的在華教會組織來代替中國國民黨組織的。

合併起來說，他們有一個共同意見，即全部撤消或局部撤消三民主義及汪精衛主義產生時的時代背景，即歐美帝國主義東侵已達極高峯，滿清統治階級腐敗已達最高點，及亞洲日本維新已經勝利的三時代背景；或者取消一個也甘心。

不，假設這三個時代背景取消了一個，既沒有了真正三民主義的歷史根據，也沒有了真正汪精衛主義的歷史根據。凡偽造政治思想之歷史根源，或者對其歷史根源作曲解者沒有不一着棋錯而全盤皆錯的。特別是他們企圖取消日本維新已經勝利的這一時代背景，以取消中國反歐美反封建可能勝利的保證。惟孫總理特別的防備了這一點，并強調了這一點，孫總理在民族主義的演講中一開始即注意到這點，即這樣的說：

「從前以爲世界上有聰明才智的只有白種人，無論什麼事都被白種人壟斷。我們亞洲人因爲一時無法可以得到他們的長處，怎樣把國家變成富強，所以要國家富強的心思，不但中國人失望，就是亞洲各民族的人都失望。到了近來忽然興起了一個日本，變成世界上頭等富強的國家。因爲日本能够富強，故亞洲各國家便生出無窮的希望。（這希望二字與三民主義的時代背景有何關係？想讀者不難了解）：亞洲今日因爲有了強盛的日本，故世界上的白種人，不但是不敢輕視日本人，并不敢輕視亞洲人，所以日本強盛之後，不但是太和民族可以享頭等民族的尊榮，就是其他亞洲人也可以享其國際的

地位」。(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民族主義第一講第十一頁)

因爲孫總理知道將來的反對派必特別的來否決這一時代根源，必從否決這一時代根源起而否決三民主義的大亞洲主義的基本根據，故預爲警告。

汪先生對孫總理這一原則是特別作了守護并發揮的責任，汪先生曾說過：

「自歐美帝國主義的風潮捲到東亞，日本與中國是陷於同一境遇，而日本因國小民寡之故，較之中國尤爲岌岌可危，差不多要和安南緬甸一樣的失敗了。然而日本何以能至今存在，且具有獨立進步的現象呢？……却是日本志士看清革命目標，推翻封建制度，努力於維新事業，將歐美新發明的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盡量輸入，盡量模仿，幾十年造成今日強大的地位。不但歐美的帝國主義不能侵入，不平等條約老早消滅，領事裁判權老早消滅，政治外交完全獨立，便是實業也有一日千里之勢。一樣黃面皮人，安南緬甸等因帝國主義之侵入而至於滅亡。日本却因帝國主義之侵入而刺激其發榮滋長，這祇由於知道抵抗歐美侵與否而決定。茫茫世界，只讓日本替黃面皮人爭氣，這是怎麼說呢？」（見汪精衛集第三卷第十七頁）

總之，日本維新的勝利，對於孫總理和汪先生的政治思想，是起了很大的時代作用的。取消了這一點，即取消孫先生汪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的根源。

孫總理與汪先生的大亞洲主義根源是從兩方面而來的：一方面是歐美帝國主義與全亞洲的磨擦存在着，那時歐美帝國主義與整個亞洲之侵略而及於中日兩國之腹地；另一方面是亞洲有一個即日本對外反歐美侵略對內反藩鎮專橫已經勝利，而歐美帝國主義即開始鼓動亞洲內部的磨擦及開始製造中日戰爭，這裏是亞洲人內部的磨擦存在着。但前者是歐美帝國主義不需要的磨擦，却無法消滅，反而因日本之獨立自由勝利打了個漏洞；後者是歐美帝國主義急需要的磨擦，却可能消滅，但不幸而始終未消滅，對亞洲對中日預示了新的危機。

孫總理曾經這樣的說：

「日本人口太多，現在有了六千萬，百年之後應該有二萬四千萬，因爲在本國不能生活，所以便向各國訴冤。說本國人口太多，不能不向外發展，向東走，美國之加利佛尼省便閉門不納，向南走向澳洲，英國人說澳洲是白色人種的澳

洲，別色人種不許侵入。日本人因為到處被人拒絕，所以便到處向人說情，說日本人無路可走。所以不能不經營滿洲與高麗。各國也明白了日本人的意思，便容納他們的要求，以為日本殖民到中國於他們本國沒有關係。」（見民族主義第一講二十一頁）

這是中日磨擦之起因，由此可見日本開始是想向亞洲以外的美洲與澳洲謀發展的，但至受了英美的獨佔主義打擊和逼迫才經營鮮滿的，孫總理看得最爲明顯。

汪先生於巴黎和會時曾這樣的批判過日本：

「中日問題，何故提出於巴黎和會乎？中日兄弟之國也，兄弟之事何故不能自了而至於請求巴黎和會之公斷乎？」又云：

「日本若吞併中國，固爲中國之禍，但亦非日本之福也。是故日本爲生存計，不可不於併吞中國之外別求其方法。和平派云「中國而能自強者，日本當與之提攜」，殆近之矣。夫人類「爭存」以利害相反之故；而其「共存」即由利害相同之故。淺識者流，每以謂中國日本大小懸殊，中國而能自強，日本將無容足之地。此其持論，似中日利害相反，無所「共存」，誠所謂大謬不然者。第一，中國四千年之歷史，祇有對於他國之侵略而爲抵抗，無對於他國而爲侵略，實不失爲國際之良友。第二，數十年來日本已先中國而進步，以中國之地大物博，苟與之提攜，則關於國民之經濟，可依兩利的方法而得無窮之增益。由此二者，中日之利害相同，瞭然甚明，故有「共存」之條件而無「爭存」之原因也。曠觀歷史，凡人類之結合皆由近而及遠，由親而及疏，故始於家族之結合，繼之以部族之結合，繼之以民族之結合，又繼之以人種之結合，然後乃有世界人類之結合。方今黃種之國存者幾何？本可納之於「共存」之域，何必納之於「爭存」之域乎？」（見汪精衛集二十三至二十四頁）

一班反派 孫總理大亞洲主義者，他們一方面要否決三民主義產生時日本維新勝利的這一時代條件即否決戰勝英美的可能性事實；另一方面又要否決 孫總理與汪先生過去關於大亞洲主義二十年前時代的以往論據，以為大亞洲主義是今日汪先生獨自創造的。方才遂行其將三民主義變成英美侵略主義之附屬品，或者變爲蘇聯共產主義之附屬品，其居心巨測就在這裏。

我們今天爲什麼要力爭三民主義與汪精衛主義之以往論據和強調日本維新勝利的這一時代背景時與其他兩時代背景相提并論？爲的是說明：

一、汪精衛主義與三民主義的關係問題。

二、三民主義與大亞洲主義的關係問題。

三、汪精衛主義與大亞洲主義的關係問題。

即從史的方面證明汪精衛主義是三民主義的繼承與發揚，是大亞洲主義的繼承與發揚。

凡偷運歐美帝國主義或偷運蘇聯共產主義而注射到三民主義中者是改頭是冒牌。

凡否決三民主義及汪精衛主義產生時的「日本維新已經勝利」這一時代背景者即是企圖改頭冒牌的開始。

二 汪精衛主義的戰略與戰術問題

這是三民主義的中心問題，同時也是汪先生守護三民主義與發揮三民主義的中心問題。這一問題是由內外兩方面而來的：一方面是國民黨與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關係問題，另一方面是中國革命與亞洲各民族的關係問題。用一句話來說即是「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問題，這就是國民革命的方法問題。這一句話反派會作了無窮的曲解，在「喚起民衆」問題上，他們不是故意誤解爲「喚起土劣買辦者階層」的解釋如西山會議派和今日之重慶；即是故意誤解爲「喚起地痞流氓者階層」的解釋如中國的共產主義派。他們均離開了總理對內反封建的立場。在「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問題上他們不是故意曲解爲「聯合帝國主義英美」如中國之英美派及今日之渝方行動；即是故意曲解爲「聯合蘇聯共產主義」如中國共產黨及今日之延安行動。總之，他們均離開了總理大亞洲主義的立場。黨內歷屆的糾紛均由此而起，汪先生一生與黨內鬥爭的問題亦均由此而起。汪先生對黨內諸同志在任何問題都採取過謙讓政策，惟有在這兩基本問題上一生沒有退步過，沒有妥協過。他雖遭遇過無窮的挫折，無理的侮辱；但他總是抱着屢敗屢戰終必勝利的決心與自信心以至率領一部份同志堅持到今天。

我們先要從原則上來考慮這兩問題：

很具體的來說：國民革命的目的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國民革命之方法是「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目的與方法是絕對不能混看的，正和戰略與戰術之不能混看一樣的。

這裏要研究的第一問題，是向誰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我的回答是向歐美帝國主義，特別是向英美帝國主義。

這裏要研究的第二問題是喚起那些民眾及聯合那些民族來共同奮鬥？我的回答是除開土劣買辦地痞流氓等少數人外皆是我們要喚起的民眾，是全民性的。其聯合各民族之對象是全亞洲的，而且是包括凡與歐美帝國主義有矛盾之民族。

這樣的回答，大家一定以為太平凡或太機械了，那麼請大家讀 孫總理的講詞罷：

孫總理說：「從前做滿洲人的奴隸，現在做各國人的奴隸，現在所受的痛苦比從前還更甚。長此以往，如果不想個辦法來恢復民族主義，中國將來不但要亡國，還要亡種」（見民族主義第五講八十一頁）

孫總理於上次大戰時即在廣州組織護法政府，這是他再發動革命工作新階段的時候，英國外交官不識相，居然來邀這新政府參加歐戰，其「理由」是中國好收回青島失地。孫先生斥責道：

「我們如果有了力量收回失地，必首先收回英國手上的一切失地，緬甸比青島大，西藏比青島更大，我們要收回，先從這些大的地方做起。」（見民族主義第四講四七十六頁）

孫總理說：「我們現在東亞，處於此時的潮流，便應該說中國和日本要聯合起來，或者說中國和安南緬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聯合起來，此刻要亞洲富強起來可以抵抗歐洲，便要聯成一大邦可以說得通。」（見民權主義第四講八十五頁）

孫總理反覆說明這問題有好幾千遍，我用不着多引原文將本文拉得太長，但汪先生又是如何將此意義守護并發揮的？這裏不能不引汪先生的演詞了。

汪先生說：「所謂國民革命是求國家之自由平等，所謂中國國民革命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所以國民革命惟一目的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不倒，中國之自由平等無由恢復。」（汪集三卷六四頁）

又說：「辛亥革命以前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運動似乎不大注意，及至辛亥革命以後始猛然吃了一驚，——英國便在國會提議，從前已讓日本在東方出頭，如今不可讓中國在東方出頭了。」（汪集二卷一一五頁）

又說「自第二次革命軍之役國內外的會黨團體和知識階級逐漸加入國民革命運動——不斷的和滿洲政府奮鬪卒以造成辛亥革命。那時雖然因顧慮滿洲政府又效法借助英國以打倒太平天國之故智，故未公然提出廢除鴉片烟戰爭以來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以防止各國之援助滿清，然而孫先生於民國元年就臨時大總統之際——清帝退位，民國統一之後即專心致志於抵抗帝國主義」。(同上)

又說：「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以三民主義為根據的，因為有三民主義的根據所以國民革命的責任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担負，而國民革命所得的利益也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享受，這是第一特色。(方法上的特色——筆者)。但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打倒帝國主義，這帝國主義不只是中國的敵人而且是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敵人——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同時也是求世界之自由平等，這是第二特色，(目的上的特色——筆者)。(見汪集三卷六五頁)

又云：「什麼叫做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現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只有兩種：——一是和我們一樣的處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一是從前也和我們一樣受帝國主義的壓迫，現在已經將帝國主義打倒了」。(見汪集三卷六十八頁)

又云：「甲午之役，曾經有三國干涉遼遼的事實，其結果怎麼樣？旅順，大連灣，膠州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以次失去，各省勢力範圍，以次割完，整個中國，降到次殖民地的地位，卒之日俄戰起，所謂遼遼遂成泡影，華盛頓會議，再演一回，其結果怎麼樣？不過種下了九一八事變的原因，卒之爆發，而成爲蘆溝橋以來之四年事變。夫中日事件，應該由中日自己來解決，應該由中日兩國各自反省，各自覺悟，以便走上共存共榮的大道，如果不由中日自己來解決，而依賴歐美的勢力，那只有使冤仇之上，加上冤仇，這一回的事變未了，而後一回更大的事變，早已深深埋伏着，展開三國干涉遼遼的事實，以及華盛頓會議的事實，便是絕明瞭的教訓。一個愛國者要將國家建築在平安的地面上，不要將國家建築在滿埋炸藥的地面上，和平反共建國的論據，是使中國日本能相安於東亞，這是所謂平安的地面，爲中國，爲日本，爲東亞，應該如此主張，并且應該照着這主張實行。抗戰的論據，是引歐美勢力深入中國，以對抗日本，其結果，中國不安，日本不安，東亞不安，所謂將國家建築在滿埋炸藥的地面上，再沒有更切確的比喻。」(見紀念和平反共救國諸烈士演詞)

又云：「沒有三民主義不能喚起中國民衆之自覺及團結中國民衆的力量；沒有大亞洲主義不能喚起東亞民衆的自覺及團結東亞民衆力量。所以孫先生於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把三民主義講完之後，便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講大亞洲主

義」。(二十年 總理誕辰日作)

有了上面的這些引句，幾乎每一問題都清楚了，打倒歐美帝國主義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是目的，即係挽救中國之戰略。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是方法，即係挽救中國之戰術。但年來爭論的問題就在這裏：

從目的上或者從戰略上說：對反對英美帝國主義是中心目的；但有人將之與聯俄聯日或反俄反日混在一塊。連中國說向誰求自由平等的問題也鬧昏了。

從方法上說或者從戰術上說：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中心方法；但有人將之與保護土劣買辦地痞流氓及聯英聯美的革命目的問題也混在一塊了。連鬧得革命陣容中誰是敵人誰是友人也清楚了。

特別是對外問題。

汪先生說得異常清楚，第一種是被壓迫民族，第二種是利害相同或者與英美能對立的獨立民族。如日本與中國利害相同而又與英美對立或其他民族與中國利害相同而又與英美對立時，不管已往只問現實，我們必與之聯合。

但反對派的人對這一問題有了異議了：當蘇聯與歐美對立很尖銳時，說以前不應該聯俄；當蘇聯與歐美妥調時，又說聯俄就該永遠聯俄，這是以前可時常聽到的。這樣的聯俄政策與中國反歐美帝國主義的任務能有作用嗎？

聯日問題係中國革命戰略與戰術之對外中心問題，正因其爲中心更時遭徹頭徹尾的反對，反對到全無理由的時候，而提「什麼日本人的生活太單樸，個性太狹小！什麼日本的民族風格與中國的民族風格太不相同所以任何時代都不能與日本聯合，世界上任何民族都可聯合，惟有日本民族不可與之聯合」這種非政治的反抗及這種反抗之來由都是出發於中國國民常識之太低弱及與歐美教會教育確收到相當社會成果之所致。

但 孫總理與汪先生是始終保持有聯日問題的原理的。

第一出發於大亞洲主義，和利害與共，

第二出發於日本反歐美已經勝利，

第三出發於日本能針對歐美的遠東政策而處世。

孫總理在第一時期，曾招收了許多日本先進份子做黨員，做具有日本反歐美反封建勝利經驗之中國顧問，日本在這時期

爲中國的兄弟革命犧牲者不在少數，而且孫總理會將最高黨部遷移至日本。在戰略上是始終保全其共同奮鬥原則的。

當日日本與歐美對立程度低落時，孫先生與汪先生同樣的勸告日本並嚴格的批評日本；當日本與歐美對立程度發展時即日英同盟破裂時，孫先生正式向日本提出大亞洲主義而且提出聯合作戰的原則。汪先生從北平擴大會起至今天止始終爲這一原則而決定一切；當日本與歐美帝國主義對立至戰爭要爆發時即還都時代汪先生毅然不顧一切的反對而與日本簽訂了一新條約，在戰術上說汪先生亦始終是以日本對歐美關係來決定其態度，這一過程絲毫沒有混亂。

反對派的「新理由」是中國之對日政策應該以日本對中國的關係來決定，而不應該以日本對歐美的關係來決定。若離開戰略從戰術上說似有「理由」，但在戰略上這種說法是幫助歐美，是歐美帝國主義的應聲虫，根本就不懂得戰略錯是原則問題，戰術錯是工作問題，這與大亞洲主義三民主義的對日政策絲毫不相同了。也無怪乎他們今天不走上爲歐美帝國國肉持刀而殺亞洲人同種人的道路了。

有人說，「孫總理在武漢起義時代並不反對英美，是後來才反對英美」。這一方面是侮辱總理，同時也是誤解總理的當時政策。三民主義的第一目的是反對英美帝國主義，他的民族主義的主要精華就在這裏，他反滿清是聯結清朝無力反抗並且屈服於英美帝國主義的意義上而決定的，「予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句話的意義是什麼？他一生在英美勢力範圍地內之活動是指揮華僑的革命活動，並不是與英美有什麼政治上的往來活動，他在倫敦被難是歷史的鐵證。他在武漢起義對日的政策是聯合，其對英美是使之不支持滿清的統治。他具有偉大的天才，知道那時的民衆只知道恨滿清，恨外人，還不知道外人中誰是友人誰是敵。所以他沒有在武漢起義提出更進一步的或過早的口號。既怕與「排滿」的口號混肴，而使英美支持滿清；也怕與盲目的「排外」口號混肴而與他的聯日戰術相混亂，這是總理在政治戰略戰術上的天才。自一次大戰至五卅時代的前夜，中國社會情狀變了，中國民衆對英美的認識清楚了，於是孫總理將他的素志國民革命的全部原理在廣州的大演講中發表了，繞道日本在日本的演講中將他的大亞洲主義也全部公布。這是鐵一樣的事實，誰能否認？

其次是對內問題。

有人說「孫先生以前並沒有提出要反對土劣辦軍閥地痞流氓的，他並沒有確認爲這些社會成份是英美的在華內應機

構。只有汪先生在十四年后才單獨提出來的」。

不，在反抗滿清統治的時代，那時中國社會成份的分化是相當混肴，而滿漢兩族的界限分化是相當明瞭的，即后者顯明於前者。同時那時的主要敵人是滿清是旗人，所以那時的口號是「排滿興漢」，至推翻滿族政治爲止。對土劣買辦與地痞流氓問題在戰略上雖是列在被打倒的對象之內，（二次革命的對象）但在戰術上是採取使之中立。否則就不能很快的推翻滿清政治。因爲那時歐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社會工作已有成績，中國已到處有他們這社會結構，黨內的力量與成份又太混雜及社會的分化尙未顯明，孫總理乃採取了一個勝利了的撤退政策，而作爲二次革命的準備，即一方面暴露袁世凱及土劣買辦軍閥和地痞流氓的惡蹟，一方面重新調整黨內工作的一切準備。

對的嗎？對的，土劣買辦與地痞流氓的惡蹟在尙未昭明時，在排滿的餘憤尙能遮蓋土劣買辦與地痞流氓的惡蹟時，民衆是不會立即跟着黨來實踐新的政治任務的。黨不採取一個暫時與民衆休養及暴露新對象與新計劃政策，必定失敗的。

可是，孫先生在南京讓位后即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在工具的工作，對黨內反對叛徒，對黨外反對袁世凱及北洋軍閥。以迄到廣州組織護法政府。這一階段歷史汪先生目爲國民革命第二的期開始，否則什麼叫做護法政府呢？

總之黨內十餘年的糾紛，從原則上是黨內外反革命與黨的正統思想正統組織的糾紛，汪先生之所以守護三民主義並發揮三民主義同時又必然成爲今天之汪精衛主義者其根源在這裏，只有將戰略與戰術或目的與方法混爲一談者才不知之。

三 汪精衛主義之組織原理問題

對於三民主義的國民黨組織問題，隨着國民黨的戰略與戰術問題會鬧過數十年之糾紛，孫總理自己曾將黨改組過數次，汪先生亦將黨改組過二次，這是什麼原因，其中理由安在？

一個政黨的組織是依據他的目的與方法即依據他的戰略與戰術來決定其組織範圍的。組織和目的與方法三者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例如黨以推翻滿清爲目的時，他的方法是使一切帝國主義不有一國去支持滿清，使一切漢人不有一個去支持滿清；但對

滿清長期豢養下來的士大夫集團，如討伐洪楊之役的那些會左彭胡集團及張勳以至新一點的保皇黨集團加以打擊。他的民衆組織範圍是一切能反滿清的全體漢人，他的黨的組織對象是一切有反滿清覺悟的各階層的先進份子。目的，方法，組織三者是統一的，這是辛亥革命前後中國國民黨的總概況，這一概況在今天的任何文獻中都可以證實的。如果有人要問「那時革命成功爲什麼這樣快？」我們的回答就是：「那時黨的目的，方法，組織三者統一，這是勝利的根據；那時滿清已無一支巨力能支持他，每一支巨力都被革命黨使之中立或使之同情并參加革命，這是條件。所以勝利就很快了」。或者又有人問：「以後的革命爲什麼又這樣難了？」我們的回答是：「以後的目的是反歐美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或與歐美帝國主義能對立的民族要聯合；但對歐美帝國主義所豢養的買辦階層及土豪劣紳，要加以打擊。以後的組織原則，在民衆方面是指一切能反歐美帝國主義的全中國同胞包括五族。在黨的方面是全中國各階層反歐美的覺悟份子也抱括五族。設若是將這三者混亂了，革命就難於成功，難於勝利了」。最新鮮的例子是今天之渝方，他們的目的是不是反抗歐美帝國主義？他們的方法是不是喚起反歐美帝國主義的一切民衆及聯合世界上被歐美帝國主義壓迫或與歐美帝國主義對立的民族？他們的組織原則在民衆方面是不是以一切能反歐美帝國主義的民衆包括五族爲對象？在黨的方面是不是以各階層反歐美帝國的覺悟份子爲對象呢？恐怕一個也不是，這就是革命不能迅速成功而且愈弄愈糟的近因。

從這些事實上我們知道了一個中心的組織原則是：革命組織要與革命目的革命方法一致，革命組織若混亂，革命目的必混亂，革命方法也混亂；革命目的若混亂，革命組織必混亂，革命方法也混亂。革命目的若變動時，革命組織革命方法亦有變動；革命目的不變動時，革命方法雖有時可變；但革命組織決不能變動。

滿清推倒后，革命目的已轉到另外一個方向了，即由反滿清統治轉到反歐美侵略了，所以那時總理乃幾次改組黨及黨的外衛組織，至十三年而概召反英對英之北伐；北伐至武漢后，黨被歐美買辦與共產黨分裂，組織混亂了，其影響的革命目的與方法也必然混亂，所以汪先生急起而提出夾攻中的奮鬥并改組黨及黨的外衛組織；中日戰爭爆發后，黨的革命目的與方法固然亂了，黨的革命組織也同時亂了，所以汪先生由河內來到上海而重組黨的中央，重申黨的目的與方法以至於今日，而洗刷了黨的政治目的與方法及黨的組織原則。

我們先讀一讀汪先生復林柏生先生的一段信，他說明了本黨的目的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是民族的，本黨的組織自然是民族的，是由各階層先進份子而聯合的；換一句話說，革命目的是民族的（反帝），革命組織自然也是民族的（各階級先進份子的聯合）。

他信上說：

最緊要的工作，莫過於清釐本黨理論。這種工作，如不能做到，則其他一切宣傳運動，種種工作，幾乎無從做起，如今來信所說的「本黨之目的（組織目的——筆者），在於集中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之最覺悟的革命份子，組織之，訓練之，使成爲一超階級的革命黨；」「故本黨既非代表任何單一階級的政黨；更非各階級的大聯盟；」「謂本黨爲資產階級的自由黨或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固謬，謂本黨爲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社會黨尤謬；」「真可說得反共以後清釐本黨理論的一篇重要文字。有了這種理論，則此後本黨同志得了方針，不致誤入歧途，這是我所最歡喜佩服的。來信所說我從前在論文及演說裏，也曾說過一二。例如「黨與民衆運動」裏頭有一段說：「我們相信中國之國民革命是以帝國主義爲對象的。所以必須喚起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以從事國民革命，因此國民革命的黨，天然是多階級的，凡是多階級的黨，必不能以一階級的專欲而底於成功，故非各階級集合一個共同目的之下，爲共同目的而奮鬥，同時調節各個階級之特別目的，則此各階級終必不能得真正之聯合，黨的領導之必要即在於此。」這段議論，與來信所說大致相同。……

總理說：（汪先生引 總理的話）

「歐洲從前因爲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爲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爲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到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够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又說：「要把我們國家的自由恢復起來，就要集合自由成一個很堅固的團體，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國家成一個堅固團體，非有革命主義不成功。便是集合起來的士敏土，能够把四萬萬人都用革命主義集合起來，成一個大團體，這一個大團體能够自由，中國國家當然是自由，中國民族才真能自由。……」

所以「本黨所代表的是民族利益」。實在是三民主義裏一貫的理論……。

來信又說到「超階級性的結合，其形成當較任何單級或複階級性的結合爲尤難」。這一段議論，將歷年本黨複雜糾紛

之原因和盤托出，我讀了之後，只有悲從中來。如今本黨有些號爲同志的，其步驟已經和民國元年以後的樣子差不多了。他們（指當時投降英美的一批同志——筆者）已經一交跌倒在帝國主義的懷裏。要和北洋軍閥及其豢養之官僚政客爭食餒餘了。他們已經把三民主義裏頭所諄諄指示的話忘得一句不賸，而且向相反的道路走去了。先生，他們已經連主義都丟掉了，你還說些「組織」「紀律」做什麼？你不看見他們已賜了我一個黨紀先生的頭銜麼？老實說一句，他們黨且不要，何況于紀？我於悲從中來之後，我依然擦乾我的眼淚去和他們爭鬥，我定要將他們的劣根拔去，因爲我覺得他們的可惡。（四卷五十四頁）

這是汪先生一生爲黨的組織原則奮鬥之理論根據，他對那些投降英美帝國主義的同志萬分的憤恨，他發覺了革命目的與黨的組織發生混亂對中國前途非常危險，他把握着 總理的遺言（如上面引句）作了科學上的說明，他預言了今日渝方所走的道路與乎結果。

我們再讀一段汪先生對羣衆的組織理該根據及黨的組織與羣衆組織的關係問題解釋。

汪先生說：

如今要問如何纔能得羣衆呢？國內的軍閥和國際的帝國主義，如此勾結，如此壓迫，眞真是存亡危急間不容髮，若待到羣衆慢慢的了解過來，然後革命成功，那眞真是遠水救不得近火了。所以我們今日，不能不想出一種催促羣衆了解的方法，也就是縮短革命時間的方法。這方法第一要問的，我們是不是要爲羣衆利益而奮鬥？如果不是，那就與羣衆毫無關係，或者竟是羣衆的敵人，什麼也不用說了；如其是的，我們終可以得到羣衆的了解。於是第二要問的，我們如何能使羣衆快快了解？須知羣衆的意思，是散漫的，是暗昧的，這是進步遲滯的總因；我們如果要催促他進步，須要將他的意思，整理起來，顯著出來，我們能够集中羣衆的意思，纔能够集中羣衆的力量；於是第三要問的，我們如何能集中羣衆的意思和力量？我們可以答道，除了結合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黨，沒有第二個方法（二卷八十四頁）。

汪先生在民衆組織問題上對於歐美帝國主義有直接關係之人，主張給以無情的打擊。

第一種人是買辦集團，他將買辦集團產生的原因及買辦集團與中國民族的關係作了基本的說明。而且指出能致中華民族的死亡者買辦集團是民衆中第一種敵人，他將這些人的人格道德愛國心作了尖銳的斥責排斥於民族民衆之外，同時他在反抗

歐美帝國主義的情緒上，對以前那些抵抗方法不良的民衆表示崇敬之意。他這樣說：

「庚子以後，中國因爲抵抗的方法，沒有效驗，便索性不去抵抗了。大家抱着一種逆來順受的態度，來歡迎帝國主義。歡迎他們到中國來掠奪原料，消售商品，歡迎他們來制中國實業的死亡，歡迎他們來制中國社會經濟國家財政的死亡，一般人漸漸的以洋貨爲時髦，以國家爲背時的東西，這種見解，漸漸的成爲風氣。更少的敗類，依附帝國主義的勢力，爲虎作倀。於是一種「買辦式」，始而流行於實業界，終至流行於政治界。及至買辦式有了左右中國政治的勢力，中國之離去亡國滅種，便不遠了。他們提起了從前「擺馬桶陣」，練拳頭，舞大刀的人反抗帝國主義，都大笑的說是野蠻。其實他們的愛國心和人格，比起從前那些人，真真有雲泥之隔，如果照着他們這樣的做法，殷鑒不遠，美洲的紅人，非洲的黑人，澳洲及南洋羣島的棕色種人，以及印度緬甸安南，便是榜樣。」（三卷十二頁）

汪先生在組織民衆問題上對那些間接與歐美帝國主義的人，亦給以無情的打擊。

第二種人是投降歐美帝國主義的軍閥及土豪劣紳，他將他們亦排斥於民族民衆之外，他反對一切舊軍閥新軍閥及其蝥賊（土豪劣紳——筆者），他指出這些人不僅壓迫民衆組織而且愚弄黨的組織，破壞黨的組織，不僅是民衆組織的敵人，而且是黨的組織的敵人。

他說：

「對於軍閥呢，孫先生在十三年十一月裏明白說過，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而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如今呢，擁兵自衛食民自肥的形態，較之從前所謂軍閥，不祇同樣繼起，還要加甚。在這種形態之下，人民的痛苦情形，祇要看那一處軍隊增加的數目，便可得其比例。在這種形態之下，那些依附軍閥的人民蝥賊，還不斷的湊趣，說甚麼「索性把黨也交給武裝同志」。這種說法，比較起從前捧北洋軍閥的進步黨，捧西南軍閥的政治會，還要肉麻。因此現在的軍閥，對於政治的手腕，比較從前的軍閥，也就高明得多。從前的軍閥，對於國會憎厭憤懣，所用的手段，是壓迫摧殘，拙劣極了，如今的軍閥，對於黨，有時也用壓迫摧殘的手段，有時却偷摸撮弄，轉形變性，種種把戲，無所不有。」（四卷一百二十一頁）

以上的敵人大概是汪先日爲從右邊來反對革命的民族敵人，即買辦軍閥及依軍閥的蝥賊（筆者認爲是指土豪劣紳）；同

時汪先生亦反對從「左」邊來反對革命的敵人，即共產黨，雖然汪先生認為右邊聯段，左邊聯共，有打毒針醫病的作用；但病愈此毒針即要停止。

他說：

中國國民黨所信奉的，是三民主義，而中國共產黨所信奉的，是共產主義。無論如何，是不會走到一條路上去的。雖然在國民革命的奮鬥過程中，有暫時攜手之可能，但也不過暫時攜手罷了。國民黨裏頭，都是這樣着想，共產黨裏頭，更是這樣。莫斯科孫文大學的出版物，告誡共產黨道：「我們（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是策略，不是主義。可謂說得最露骨了。所以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一個橫梗在胸中的問題，是攜手到幾時才分開呢？這問題的解答，人人不同。在莫斯科，托洛斯基拉狄客的見解，便和斯達林布哈林不同，托拉諸人主張早些分開，斯布諸人則主張共產黨要一直做到國民黨共產化為止。中國共產黨裏頭，也是不一其說，要以邁從斯布的為多數。那就不是攜手政策而是襲取政策了。國民黨裏頭，對於幾時才分開的見解，也是言人人殊，如要明白幾時分開才是恰好，祇須拿毒藥針做譬喻，一個人有病，打對症的藥針，那怕是毒藥，祇要對症，便是良藥。如果病好了，藥針就該停打。不然，便會弄出別的病來。如今同志裏頭，有主張自始就不應該聯俄容共的，這不但抹殺了十三年以來的事實，而且也不免蔑視總理當日的苦心了。至於有些直至今日還主張維持容共政策的，那就和於開善後會議之後還主張聯段。因這兩種主張，病根所在，由於不明瞭國民黨之主義政策，及不明瞭共產黨是什麼。恰如不知醫理的人，不明瞭打毒藥針的用處。於是或以頑然反共為己盡忠實的國民黨員之能事，或以為祇要不是共產黨就得了，共產主義是革命的，持共產主義才是左派。因革命理論不清楚，以致革命運動荒謬，實是一件可憂的事。（四卷一百五十一頁）

關於汪先生的組織理論的結論，我們用不着來另外作了，他在黨的組織問題上，他在黨與民衆的關係問題上，他在黨領導民衆從右反對那些國內敵人及從左邊反對那些國內敵人或者向右邊或左邊探暫時聯合時作戰時應該在什麼時候要分開，如汪先生所指的「聯段」「聯共」兩問題等等都已引證很多了，總之汪先生的組織理論是與革命目標，革命方法完全一致的，現在再借汪先生自己一段論文作汪稱衛主義的組織原理問題的結論。他說：

「一般革命同志在十三年改組以後，開始對腐化勢力作戰，摧陷廓清的結果，廣東革命根據地，得以統一，北伐得以

進行。在十六年以後，除了對腐化勢力作戰之外，還要對共產黨惡化勢力作戰，一般革命同志，便陷於夾攻的形勢中了，革命進行，因以蹉跌，一般革命同志，也因以受重大損失。當時我們主張在此夾攻的形勢中，應從事整頓革命同志的隊伍，其整頓的方法，為甄別人才，清釐理論。我個人於十六年冬間，被迫去國，不能從事工作，至為痛心，但是十七年間，一般革命同志，却於整頓上得了不少的成績，這是從國內外革命同志所發表的理論和行動上可以看得出來的。所以十七年間，一方面雖然是反革命勢力復興，而另一面却是革命勢力之團結，我們今日最大的工作，不外乎此。革命勢力之團結，由鞏固而發展，則定能為一般民衆，從腐惡勢力的夾攻中，殺出重圍，以博最後勝利。（四卷一百二十五頁）

這一段論文在今天仍是極新鮮極合乎現在環境的。而且是博得最後勝利的預言，每一個國民黨員要起而爭取這最後勝利的實現。汪先生在組織問題上已將孫總理的革命組織理論守護着，不僅守護着而且發揮了並戰鬥化了，這是汪精衛主義的第三個成因。

四 汪精衛主義與國民運動問題

革命運動，本質上就是國民運動，革命運動，除由國民運動這條路上去尋找革命的主力以外，再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到達這國民革命的目的了。雖然，革命的國民運動有時向民衆的右翼政治勢力採取聯合，或者有時向民衆的「左」翼政治勢力採取聯合，例如以前的「聯張聯段」及「聯俄聯共」其主要目的是在徵取民衆的主力站到己方面來為國民革命運動的主力。沒有這一目的，則一個政黨的聯合運動是多餘的了。所以汪先生說：『國民革命的責任，是要由民衆自己來負擔，國民革命的利益，是要由民衆自己來享受』。這是守護并發揮了孫總理的「民治民享」的基本原則。國民運動的基本出發點也就在這裏，這與蔣介石先生為着實現其親善歐美帝國主義的「新生活運動」，其政治意義有天壤之別。離開革命的目的（反對歐美帝國主義），離開革命的方法（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離開三民主義的黨的計劃（各階段之戰略戰術計劃）而談「國民運動」意義與內容者，這與孫總理及汪精衛主義只相反而不能相成。

黨的「革命運動」過程史，本質上就是黨的「國民運動」的過程史；換一句話說，「革命運動」諸階段，實際上就是一

國民運動」諸階段。但黨史的過程與階段，與國民運動史的過程與階段，并不是一致的，因為黨是各階層的先進份子的自身運動，國民運動是指黨領導的全面性的民衆運動，他是以黨的號召作用工作作用，而策動的高潮低潮來分過程與階段的。所以我們可以將中國的「國民運動」劃分爲三時期；同時，中國反革命勢力與歐美帝國主義的關係，亦可以分爲三大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滿清統治屈服於接受歐美帝國主義之束縛時代，貴族及保皇派各集團附之。即不平等條約紛至沓來的時期，自鴉片烟之戰至滿清被推翻爲止，這一時期的「國民運動」雖不全部的，孫總理所發動；但最後的總發動，總領導是孫總理的革命黨，這一階段的史實我們用不着多說了。第二個時期是北洋軍閥甘爲歐美帝國主義保障并加強不平等條約之繼續有效時代，買辦土劣附之。自袁世凱時代起迄至北伐勝利時爲止，這一時期的「國民運動」幾全是以孫總理的領導爲中心，這一階段的史實我們也用不着多說了。第三個時期，是歐美買辦階級及土豪劣紳躍進了政治舞台并統一經濟政治軍事諸力量，一方面藉修改不平等條約而和緩反歐美的「國民運動」，另一方面藉經濟，政治及軍事力量而加強其對日磨擦以分化東亞而開展其高度的反動的親歐美的「新生活運動」以代替革命的「國民運動」了，自汪先生在南京黨的大會上蒙難受傷日起，至汪先生回國主和與德大使調停及汪先生離渝而至還都之日再行號召反歐美帝國主義的，亞洲諸民族團結一致的，孫總理大亞洲主義的「國民運動」日爲止，這一時期的「國民運動」全是以汪先生爲領導的，即今日已定爲「新國民運動」的時代，其綱領是一九四一年末頒發的。

這三大時期的「國民運動」，中間都經過長期的過渡期，在這一過渡期中，汪先生與孫總理總是在一塊作艱苦的奮鬥。第一個過渡期是滿清末葉，一方面有神化式的義和團運動被貴族出賣，另一方面有康梁君主憲運動來和總反歐美帝國主義反滿清統治的革命的「國民運動」，那時汪先生是站在最前綫代表孫總理與康梁作鬥爭的。汪先生文集的第一卷諸巨文都是這時期的戰鬥作品，對號召當時的民衆脫離康梁影響而參加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的「國民運動」起了決定的作用。第二個過渡期是推倒洪憲至北伐前後，黨在這過渡之末期有更大的「聯段聯張」與乎「聯俄聯共」等政策上應用不同之糾紛，汪先生又是站在最前綫代表總理的意見既與腐化勢力又與惡化勢力作鬥的。汪先生文集的第二三兩卷幾全是這一時期的鬥爭文獻，對號召當時的民衆已於北伐出動前反西山會議派，北伐至鄭州後反共產主義派，而爭取北伐發展至北平迄至東北改換青天白日旗爲止的革命的「國民運動」又起了決定的作用。第三個過渡期是英歐扶植中國之歐美派，打擊中國黨之中日親善主

張，（我們認爲中日合作是總理的大亞洲主義，是黨的主張，不是什麼「親日派」——筆者）造成了黨的大會上對汪先生的行刺，及中日戰爭等巨案與乎汪先生離滬而來上海改造黨的領袖機關，政府中央機關，進而至於在日本與英美戰爭爆發後即根據 總理的三民主義，大亞洲主義而發動今天之「新國民運動」，但這一過渡期尚未終結，因爲對內尙未在廣大的，高潮的國民運動中求得統一，對日本的合作，對亞洲的各民族的聯合亦未發展至 總理大亞洲主義所決定是階段。三個「國民運動」的過渡期，是「國民運動」最艱難最困苦時期，但汪先生在每一個過渡期都起了決定的作用。

汪先生在「國民運動」的第一期是怎樣爲三民主義的黨去爭取民衆力量的？那時候一方面有神化了的義和團式的「國民運動」，這運動雖被滿清貴族出賣；但他們是一種未上革命軌道的反帝「國民運動」，「扶清」是反動的，「滅洋」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又有保皇黨立憲式的「國民運動」，這運動雖被貴族鎮壓；但他們是一種改良式的要求欽賜民權的「國民運動」，「保皇」是反動的，「立憲」不是反動的。二者在民衆中均有很大的影響，同時二者均有裁留了民衆跑入 孫總理所號召的三民主義的「國民運動」中的阻滯作用，在這時期的社會情況中，孫總理與汪先生所決定的政策就不能不一方面透過秘密會黨去爭取那些被義和團影響所裁留的反帝民衆；另一方面就親身跑到會黨中學生中知識分子中去爭取那些被康梁所影響的青年知識份子了。

總理說：「民族主義能長期存留在下流社會中是好的；但下流社會中知識太幼稚，自己不能利用這民族主義，反被他人利用了自己」（民族主義第三講四九頁）。

又說：「保皇黨一個也不是滿洲人，完全是漢人，他們經過洪門會，三合會打進了海外華僑中的致公堂，向他們宣傳保護滿清，消滅他們中的民族主義，因爲他們原來的宗旨是反清復明的，不是我們在華僑中宣傳革命思想，民族主義在那裏亡了」（見民族主義第三講四六頁）。

汪先生當時更深入的發揮了 總理的這種意旨，他認爲神化的反帝抵抗，其方式雖愚笨，其意義極光明，比向歐美帝國屈服的知識份子其人格有雲泥之別。（見組織原理斥責買辦式的社會人士一段引文）。

汪先生對保皇黨更斥責無遺，他責「康有爲之滿漢不分爲人妖」，斥梁啟超更不足道矣。他力申「排滿是達民族主義之目的，立國是達國民主義（即民權民生主義——筆者）之目的，此兩目標誓以死達，無所謂以此爲目的，以彼爲手段」。

汪先生在「國民運動」第二期，是怎樣爲黨去爭取民衆的？這一時期一方面是與歐美有關係的西山會議派，想取消民生主義而講「二民主義」，即從右邊裁留民衆不使參加黨領導的「國民運動」；另一方面是與蘇聯有關係的共產主義派，想赤化民生主義而講「階級鬥爭」，即從「左」邊來裁留民衆不使參加黨領導的「國民運動」。二者在民衆中均有很大的影響，同時二者均有裁留民衆跑入本黨所領導的「國民運動」的阻塞作用。在這時的情況中，總理是逝世了，汪先生怎樣辦？第一步尖銳的反對西山會議派，爭取西山派影響下的民衆到黨方面來。這是在總理逝世一周年內的時代，即鞏固革命策源地的廣東時代。第二步深刻的反對共產主義派，爭取共產派影響下的民衆到黨的方面來。這是在北伐到了鄭州的時代，即鞏固革命根據地長江流域的時代。

第一步汪先生容忍共產派，反對西山派的「二民主義」，他嚴格謹守 總理的遺訓所指示的革命的目的與方法而保衛了總理的民生主義。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問題就在這裏。後來他在 總理逝世週年紀念會上，更具體的指出這一中心以號召當時的民衆，他說：

「我們看，現在世界上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帝國主義，一條路是反帝國主義，再不會有第三條路，我們走上英美帝國主義的路上，可以不？比如日本先五十年改革了還可以，但是我們遲了五十年，現在中國差不多做了英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已經一天一天擴大了，不是我們叫他們走，他們就會走，所以要走上英美帝國主義的路，中國只一買辦階級的資格，因爲英美帝國主義，就是想拿中國當作殖民地，決不肯放鬆，使我們走到他們的路上去，最多不過使我們做成一個買辦階級而已，買辦階級就是帝國主義走狗的別名，我們想做買辦階級，就反對民生主義，我想將來帝國主義走狗這個名詞，一定比勳一位還要高尚。我今天并不是說笑話，是確有事實的。從前滿清對於有功的人，就加上巴圖魯的頭銜，滿洲話說巴圖魯就是狗的稱呼，滿清的官僚，做了提督不高興，一加上了巴圖魯狗的稱號，就很高興了，我們如果想取消民生主義就只有這一條路。第二條路是怎樣的呢？就是反帝國主義，是要解放一切殖民地使成爲自由平等的國家，同時還要大多數窮苦的工人農民一齊喚起和所有被壓迫民族被壓迫階級通通起來站在反帝國主義的路上，大家想法來滿足人類的生存慾，就是 總理所說的衣食住行四大端解決的方法。我們對於特殊階級，要壓迫他們的支配慾，節制

他們的資本，平均他們的地權，使多數窮苦人都能享受衣食住行的滿足，得到自由平等的幸福。我們既然知道這世界上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跟英美帝國主義的尾巴，一條路是跟世界上大多數的平民共同奮鬥，共謀幸福，我相信人類有四分之三是平民，除了那想保守特殊階級的少數人之外，決不會走上帝國主義的路上去，本黨的主義完全是爲大多數窮苦工人農民，絕對不許我們去作特殊階級，十四年的北京西山會議，就是想保存他們的特殊地位，所以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把這些亂子撤消，不留餘地。（三卷一百二十頁）

我們記得廣大的民衆那時不去擁護西山派，而參加黨的反英討吳的「國民運動」，這起因於汪先生反對西山派取消民生主義是主要的原因。共產派那時大措其油，認爲汪先生反對西山派取消民生主義即是同情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西山派那時亦客觀上附和共產派這種意見，說汪先生是屈服於共產派了。他們均未在問題的鑰匙上去了解。（即一個是階級協調的民生主義，一個是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在「國民運動」的方法是絕對相反的）。

第二步汪先生停止了反西山派（該派此時已瓦解或轉化），反對共產派的赤化民生主義，他又嚴格的謹守總理遺訓所指示革命目的與方法而保衛了總理的民生主義，武漢分家的中心問題就在這裏。在政治上汪先生的一挾攻中的奮鬥」及「我們有沒有錯誤」兩歷史文獻可以千百遍的去讀。我們下面的引文是比較理論的文獻，我們知道那時的民衆被共產黨思想影響比較深刻，不從理論上作鬥爭，則不能將共產黨的國民運動擊破而開展黨的後期北伐及更大規模的黨的「國民運動」，所以汪先生那時對黨內外號召了理論上的鬥爭。

他說：

「我們容共是一種政策，他們加入國民黨，也是一種政策，這是很明白的事實。但到何時才分手呢？這一個問題怎麼解答呢？這應該以時代環境如何去解答。時代環境變了，政策不能不變，是一定的道理。一切政策都因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推移的，容共政策，當然也是如此，不過總不外跟時代環境如何而定的。因爲一個爲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一個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的，總不能永遠合作在一起的（三卷二二二頁）。

汪先生爲防止因反共而終止了中國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起見，他特爲「反共與反帝」作了一段基本的說明。這一段說明，已成了「西安事變」與「渝方政策」之預言。汪先生說：

「本黨之反對帝國主義，與共產黨之反對帝國主義，其精神面目，完全不同。本黨之反對帝國主義，其理由在 總理所著的民族主義裏，說得最爲詳盡，民族主義之目的，第一步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第二步在求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之解放。帝國主義是中國之自由平等的對頭，是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之對頭，所以要反對他。而共產黨之反對帝國主義，是爲第三國際着想，不是爲中國着想。他的心目中視第三國際爲作戰的大本營，視中國爲作戰的一支隊，如果於全盤戰局有利，雖犧牲一支隊而不惜，所以於第三國際有利時，則犧牲中國以爲第二次國際戰爭之導火線，（預言——筆者）亦所不惜。此與本黨民族主義之目的步驟，大是相反的。至於反對帝國主義之方法，來黨主張用文化，軍事，政治，經濟種種力量，以對於帝國主義，爲積極之抵抗，而最低限度，則在廢除不平等條約，以斷絕束縛中國自由平等之鎖鍊。與共產黨之濫用排外手段，更大是相反。從前本黨容共時代，宣傳裏頭不免往往夾雜些共產黨的調頭，這應該注意矯正的。至於癡想到本黨罷工以後，便不妨拋棄了反帝國主義的主張，這是說夢。（三卷二百頁）

汪先生知道當時尙有廣大層的中下層民衆一部份固在汪先生領導之下，一部份是受了共產派的影响，他對這一方面亦作了基本的解釋，說明了那時「國民運動」之木質。

他說：

「本黨喚起民衆之目的與方法，也與共產黨完全不同，本黨爲民衆而革命，并非爲革命而求民衆。其所以喚起民衆，乃要使民衆知道革命與民衆本身有切膚之關係，使民衆起來，參加革命，使革命的利益歸於民衆。同時還慮到民衆的能力，須以漸漸養成，故定出軍政訓政憲政的計劃步驟，使民衆的幸福，與民衆的能力，同時增進。至於各民衆之間（各階層之間——筆者）則務引導之，使向於共同的利益而進行，而務引避其相互間之利益衝突。此於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及其他重要宣言訓令決議案裏，已不憚反覆說明。至于共產黨呢，口裏說爲民衆而革命，其實是爲革命而求民衆，口口聲聲無非說怎樣「抓住民衆」，抓住二字，何等兇狠，恰如鷹抓住兔一樣，而其所謂民衆，在無產階級已發達的地方，祇是無產階級民衆，在無產階級未發達的地方，則無業遊民，也算在內。抓住了這些無產階級與無業遊民之後，對於其他不過各階級民衆一味打倒，有的說些「聯合農民」，有的說些「聯合小地主小商人中地主中商人」，有的說些「聯合小資產階級」，其實所謂「聯合」不過一時抓住了作工具，以後仍然要打倒的。這樣東打倒西打倒，各階級民衆固然被打得七零八

序

八落，而所謂無產階級，也因經濟衰落的連帶關係，成了失業工人，於是無業游民的集團勢力，愈見浩大，而共產黨即利用之操縱之，以爲奪取政權之憑藉了。一般民衆所懼怕的是經濟衰落，而共產黨所要求的，正是經濟衰落。一般民衆所憂慮的是社會恐怖，而共產黨所要求的正是社會恐怖，他要將一般民衆因階級鬥爭而死亡的尸骸，做他們跳上政治舞台的腳墊。此是共產黨與本黨極端矛盾的所在，也是本黨驅共的最大理由。如今驅共以後，共產黨說本黨不要民衆了。本黨所不要的，是矯揉造作出來的假民衆。花四角錢，僱一個人手持一面小紅旗，口裏大喊，這樣的老把戲，實在看慣了，也看厭了。本黨絕不要這樣假民衆。本黨所要的，是一般爲民衆而革命的人，有目的有方法有步驟的，來領導民衆，參加革命。固然要使民衆知道革命的成功，纔是民衆利益的總匯，同時也要於革命勢力所及的地方，於可能的範圍內，將民衆的利益一點一滴的，積累起來，使民衆知道革命勢力所到，便是民衆利益所在，即使有時不得已而使民衆犧牲利益，也必要使民衆知道少許的犧牲在目前，而巨大之收穫在將來。於是民衆對於革命，纔能漸漸發生與會，發生信仰，纔能漸漸起來參加革命。革命與民衆之利益關係，日益密切，則民衆與革命之關係，也日益密切，這樣纔是真民衆，纔是真的革命民衆。我們不但不能如軍閥官僚之不要民衆，而且不能如共產黨之矯揉造作假民衆，我們所要的是真民衆，是真的革命民衆。（三卷二百頁）

這是那時候一段「國民運動」的基本理論；但那時黨內有人問過汪先生，「要分共即應該早下手」，汪先生對這一問題又作了很具體的回答，他說：

「道全在對於時代環境之看法不同，總理爲什麼要容共，我們試看看十二三年間的情勢如何。那時軍閥吳佩孚從江西向北江進攻，東江叛軍進到石龍，西江連鑿慶也給敵人佔去，南路在鄧本殷手裏，我們祇有一個廣州，但廣州尙有時可以造反的劉楊，故前後左右都爲軍閥圍住。更有帝國主義的壓迫，有商團的作亂，帝國主義明白宣言說，你如打商團我便打你，處在這樣危險的情勢之下，一定要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敵人，內部分裂是不許的，所以分共是不許的。雖有許多同志主張即時分共，但都受了 總理的詰責，默然而止。至於十四年間 總理逝世之後，情勢還是一樣，東江才於三月克復，而劉楊已在廣州陰謀叛亂了。六月十二日才把楊劉打倒，而六月二十三號帝國主國者已在沙基殺我許多學生工人商民農民，死的滿街是血，想來各位當中，必有些是身歷其境的，也不忍多說了。沙基慘案之後，不久東江方面，又被敵人佔

去，把當日克復東江時莫大的犧牲，弄得乾乾淨淨，同時反動派又在廣州幹起來了，八月二十日明目張胆的殺死廖仲愷先生。那并非暗殺是明殺的！廖先生被殺的前一日即八月十九日，曾和我說道，聽見他們要用手機關槍來殺我們哩。說時覺得很是可笑。明日早晨廖先生坐汽車到了中央黨部，他們六七個人真是用大號曲尺裝的手機關槍子彈來殺廖先生。那時廣州大勢，岌岌動搖，東江敵人，已向我們進攻，而南路也同時呼應。在那時候，也有些同志以為容共政策應該變了。但是我們并未注意及此，其所以不注意，如果是因為自私，因為自己的利害，這便是極大罪惡，應該受大家嚴重的懲處。然而，我們當時實因正在把全力去對付帝國主義，對付軍閥。（三卷二百二十四頁）

總之汪先對容共與反共在上面的引文中已作了一個有體系的說明，與汪先生所體仰 總理的目的與方法戰略與戰術是一致的。

汪先生在「國民運動」的第三期又是怎樣為黨來爭取民眾呢？這一時期一方面歐美帝國主義與蘇俄打成一片，另一方面渝方政府與中共延安亦打成一片。民眾中一方有反日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又有反和平的巨大影響。遠東的情況，雖有東亞與歐美戰爭的爆發；但渝日兩方的戰爭仍然存在。這一期是中國「國民運動」劃時代的一期，同時又是最艱苦的一時期。

但汪先生領略 孫總理最主要的「大無畏」風格，他於東亞與歐美戰爭爆發之數日後即預布了「新國民運動」的綱領，根據 總理的大亞洲主義的遺言，而預示了這一更偉大的「新國民運動」一定要勝利的。

他把握着第一個根據是中國反對歐美帝國主義的歷史根源，中國民眾決不會放棄的。因為民眾要民族。

他把握着第二個根據是中國反對歐美買辦式的統治將比反對滿清，反對軍閥更徹底的。因為民眾要民權。

他把握着第三個根據是中國因數年抗戰而鬧得民窮財盡，人民之衣食住行職業等全都破產，中國民眾一定要起來反對中日戰爭，停戰建國。因為民眾要民生。

他把握着第四個根據，是歐美對亞洲的侵略與矛盾既是普泛的，則亞洲各民族的反歐美運動一定是可能聯合一致的。

他把握第五個根據是日本反歐美不能離開中國，中國反歐美也不能離開日本的 總理遺訓及 總理大亞洲主義的主要骨髓。我們今天用不着再多引汪先生在這時期的理論上的文獻，因為這一時期的「國民運動」尚在開始發展中。我們只將這綱領的全文引在下面即够作本問題的結論。

下面係新國民運動綱領：

「戰爭是國民的總檢閱，詳細些說，是一國人民精神力的總檢閱。在四年有餘的痛苦環境裏，我們同胞的優點，以及缺點，都盡情暴露出來，不留一些遮蓋，優點應該發揮光大，缺點應當補救。現在四年有餘的中日事變，已一轉而為保衛東亞的大戰爭。在這新關頭，沒有新精神，怎樣能担负這新責任，完成這新使命？所謂新精神，不完全指創造，只要能去其舊染之污，也是自新之一着。換句話說，要有勇氣來承認缺點，矯正缺點，尤其是劣點，更要有勇氣來掃蕩廓清，新國民運動，就是着重於此的。」

新國民運動，不另標主義，因為我們原有三民主義，以為建設中華民國之根本。我們現在所要問的，是「三民主義，為什麼不能實現？這不是由於我們推行力不够，就是由於我們研究力不够。總而言之，是我們精神力不够，「新國民運動」務須對於此等缺點，有對症下藥的決心與辦法，茲舉其綱要如左：

第一，我們為什麼不能實現民族主義呢？因為我們忘記了大亞洲主義，「中國若不能得到自由平等，則不能分担建設東亞的責任，而中國自由平等之完全得到，必有待於東亞之解放」。這幾句話，直到和平運動開始，方纔覺醒過來。其實大亞洲主義裏，早已諄諄啟示了，為什麼我們忘記了，至於中國腳踏到這般田地？從今以後，把愛中國愛東亞的心，打成一片，東亞諸國，互相親愛團結起來，保衛東亞，這是民族主義的着重點。

第二，我們為什麼不能實行民權主義呢？因為我們忽略了民主集權的制度，所以表面上崇拜民治，實際上造成個人獨裁。從今以後，我們的團體要組織化，行動要紀律化，一件大事，未決以前，充分的研究，既決以後，一致實行，時時想着知難行易，勇猛的實行，即是忠實的求知要着，這是民權主義的着重點。

第三，我們為什麼不能實行民生主義呢？因為我們忽略了發達國家資本，我們如能着重於此點，則國家資本發達，私人資本自然歸於節制，共匪則無所藉口以鼓吹階級鬥爭，英美之經濟侵略，亦無所施其技，何致演成共匪與英美侵略互相呼應，左右夾攻的現象？從今以後，我們要以銖積寸累的精神，來發達國家資本，這是民生主義的着重點。

第四，我們如要從以上三個重點着手，則不可不增加我們的精神力，以推行一切，研研一切。因此我們首先要倡導公而忘私的精神，個人對於國家，貢獻要多，享受要少，平日蒿一己以裕國家，臨難則犧牲一己以救國家。

第五，人與人相處，是國家民族力量團結的樞紐，我們對於人與人相處，要牢記以下數項：說話要老實，心事要光明，善點要能用，惡點要能去，並要有聞人善則喜，聞人過則悲的精神，使人樂於爲善，恥於爲惡。至于同事間之相處，尤其要同甘苦，均勞逸，齊讓美，勿掠美，齊任過，勿諉過；不這樣，不配說精誠團結。

第六，浮囂淺薄，是斷送國家民族的根由，我們知道，我們缺點固多，而行動不能紀律化，知識不能科學化是缺點之最大者，從今以後，紀律要由個人及於全體，科學不但要普及，尤其要深造。

第七，中國大多數人，都是赤貧，說不上節約，所以增加生產，最爲當務之急。然即就節約來說，用之得當，於民生國計，兩有裨益，如多種雜糧，替代稻米，便是一個極顯的例。至於極少數人厲行節約，不只是經濟上的原因，而且是道德上的原因；就經濟來說，消極的把無益的消耗節約起來，積極的可用之於更有效方面；就道德來說，目擊大多數人如此貧困，不節約，在良心上說不過去。

第八，從政治社會做起，在最短期間，必須做到弊絕風清，每一個公務員，每一個軍人，因應該得到生活上的保障，但絕不能藉口於生活上不滿足，而有貪污瀆職的行爲。我們要本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的精神，對每一個貪污瀆職的人，要像對於蝗蟲一樣，毫不留情的予以滅絕。

以上所舉，包括精神方面的總動員及物質方面的經濟建設，雖然卑無高論，然而我們要救中國，要保東亞，捨此無可由之道。所以發起新國民運動，以之自勉，亦以之共勉，至于各項條目，根據綱要，隨時議訂，隨時頒布施行。

大家讀了這一綱領以後，可回想到蔣介石先生頒布「新生活運動」綱領，那內容是什麼？這內容又是什麼？是不是有天壤之別？那一個是親英復古的，這一個是反英建國的。那一個是與總理的國民運動目的及方法相反的，這一個與總理的國民運動目的與方法是相成的。

本文本節固以此綱要作結論，本文全文亦以此綱要作總結論，今後是工作的問題，爭取實現與勝利的問題。關於汪精衛主義的幾個主要問題，本文已談完了，最後是：「汪精衛主義完全勝利也就是三民主義的完全勝利！」

江蘇省政府便條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個黨一個主義
 一個領袖
 李士群拜啟

擁護最高領袖
汪主席！



汪 主 席 最 近 玉 照

汪精衛主義讀本 上冊

第一課	豔電……………	(一)
第二課	舉一個例(上)……………	(七)
第三課	舉一個例(下)……………	(一二)
第四課	中國與東亞……………	(一六)
第五課	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上)……………	(二八)
第六課	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下)……………	(三二)
第七課	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	(三六)
第八課	和平宣言……………	(四四)

- 第九課 和平運動之前途……………(五〇)
- 第十課 怎樣實現和平……………(五七)
- 第十一課 促進全面和平完成時代使命……………(六三)
- 第十二課 反共與民食……………(六七)
- 第十三課 罪己的精神……………(七一)
- 第十四課 共同前進……………(七五)
- 第十五課 紀念和平反共建國諸先烈……………(七九)
- 第十六課 艷電書後……………(八五)
- 第十七課 所望於民國三十年者……………(九二)

附 錄

回顧與前瞻……………周佛海(九七)

汪精衛主義讀本

第一課 豔電

重慶中央黨部，蔣總裁，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均鑒：

今年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①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自去歲七月蘆溝橋事變^②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闡明^③，第一點，為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④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⑤，廢除治外法權^⑥，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第二點，為共同防共。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會提議，吾人願慮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義防共協定^⑦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的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

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爲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澈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②，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三民主義^③爲中華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第三點，爲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尙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義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爲國民政府應即自此爲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聲明^④，已改變一月十六日之聲明之態度^⑤，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爲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鉅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以上三點，爲和平之原則，至其條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爲限，此爲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現代國家之建設。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爲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之基礎，此爲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洋之安甯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謹此提議，伏祈采納，汪兆銘，黠。

【釋註】

汪主席於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飛離重慶，寄寓河內，深知抗戰之不可再續，而救國之道惟有和平。乃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電，向渝當局建議合於正義之和平，蓋以近衛聲明之發表乃中日言和最良之時機，不可坐失而誤國家大計，此電實爲和平運動之嚆矢。

註一：電字爲二十九日的代日韻日，汪主席此電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故稱電。國民政府於首都失守前，即遷至重慶，至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還都南京。此電係汪主席於還都前以中國國民黨副總裁之資格，向中央黨部提出和平主張。

註二：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中日雙方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該協定共分五條，內容規定：中國軍隊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鎮、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南地區，日本軍退至長城之線；長城以南及中國軍駐區以北以及東區域內，由中國警察維持治安。

註三：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從此中日邦交斷絕，烽火遍地，造成無底抗戰之局面。

註四：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聲明，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世稱近衛聲明，原文如下：

「日政府業於再度之聲明，宣布決以武力澈底消滅抗日國民政府，而與華方眼光遠大之人士攜手，努力建設東亞新秩序。現今中國各地更生氣象澎湃而起，建設之機運甚高，因此日政府特欲闡明調整日華關係之根本方針，使中外明瞭帝國之真意。

日滿華三國將以設建新秩序爲共同目的而結合，以期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之實現。是則中國應首先祛除原有之偏見，拋棄抗日反滿之愚策。換言之，日本甚望中國能自動與滿州國建立完全之國交也。

東亞之天地斷不容許共黨勢力之存在，故日本認爲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而締結日華防共協定，實爲調整日華國交上所最緊要者，且鑑於中國之現狀，爲獲到此項防共目的之保障計，在該協定期間內，要求在特定地點，允許日軍駐紮防共，及指定內蒙爲特殊防共地域。

關於日華經濟關係，日本固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際之利益，而僅欲要

求日華之提攜與合作，以期收穫實效。換言之，即按照日華平等之原則，要求中國承認帝國國民在中國內地居住營業之自由，以促進日華兩國國民之經濟利益，且鑑於日華間之歷史，經濟關係，應予日本以便利，俾得在華北及內蒙地域開發利用資源。

上述大綱，即係日本之所求於中國者，苟能明瞭日本之所以調動大軍之真意，則知日本之所求於中國者，既非區區之領土，亦非軍事之賠償；日本實欲要求中國以建設新秩序之分担者之資格，而於實行其職務時所必須之最少限度之保證耳。日本非但尊重中國之主權，抑且不吝進而考慮交還租界廢除中國完成其獨立所必需之治外法權。一

註五：日本明治天皇即位後，完成日本維新之業，世稱明治維新。

註六：各國在中國通商各港劃定界限租地通商之區域。界線以內，各國商民得租地畝建屋，設立行棧，禮拜堂，醫院，墳墓，仍歲納地稅於中國，界內事宜，由各國自設機關管理之。

註七：本國在他國，不從所在國之法律，仍受本國法支配之權利，名曰治外法權。

註八：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德兩國爲防止共產國際之陰謀，締結防共協定，相約對共產活動，作共同防衛之措置。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義國以原署名國資格參加，世稱日德義防共協定。

註九：中國共產黨有邊區政府之非法組織，所有軍隊，皆不受國民政府之指揮，其破壞統一，危害民國之野心，昭然若揭。

註十：三民主義爲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包含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目的欲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

註二：日本近衛內閣於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發表聲明，謂：「日本所望於中國者，在能分擔東亞新秩序設建之任務。」
「日本的真正希望，不在中國之滅亡而在中國之興隆，不在征服中國而在與中國協力。」
「日本認識中國之民族的熱情，承認中國之完成其爲獨立國家，實有必要。」

註三：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爲交涉對手。

【要旨】

汪主席此電發表後，響聲極大，中日有識之士，無不贊同。汪主席的和平主張，但重慶方面，仍執迷不悟，汪主席遂應民衆之請求，起而領導和平反共建國運動。

一、抗戰的原因，爲了不能採用和平方法，調整邦交，維護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

二、自近衛聲明之後，日本政府已改變從前的態度，對於中國無領土的要求，無賠償軍費的要求，表示尊重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的誠意，那麼是和平談判的絕好機會，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爲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

三、根據近衛聲明第一點：善鄰友好，可用和平方法，保全北方各省，並收復抗戰以後淪陷各地，保持我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

四、根據近衛聲明第二點：共同防共，當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目的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的陰謀，制裁違背三民主義的共產黨的組織與宣傳。

五、根據近衛聲明第三點：經濟提攜，日本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我國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商訂各種具體方案。

六、和平的重要條件：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允許在特定地點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爲限。

七、中日發生糾紛，雙方互有責任。今後我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爲教育方針，日本亦應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的基礎。

八、對於太平洋之安寧秩序，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

【研究】

問：汪主席爲什麼主張和平？

答：汪主席是國父的忠實信徒，抱有救國的熱忱，他鑒於無底抗戰的結果，中日雙方都大受痛苦，日本政府既聲明調整中日邦交的根本方針，可用和平方法，結束戰事，不應坐失機會而誤國家大計，所以挺身而出，主張和平，發表豔電，向中央黨部正式提議。

問：救國之道是什麼？

答：惟有和平。抗戰的結果，失地無數，經濟崩潰，有亡國的危險；合於正義的和平，可以保持國家的生存獨立。

問：豔電的影響如何？

答：重慶方面的蔣政權，雖仍執迷不悟，民衆都傾向和平，希望汪主席貫徹此項主張，早日結束戰事。淪陷區的民衆，熱烈擁護汪主席，籲請他出來領導和平運動。日本方面，也贊同汪主席的和平主張，願與我國恢復和平，解決中日事變；後來國府還都，簽訂中日調整國交條約，完全根據汪主席豔電的基本精神。

問：讀了汪主席的豔電，應有怎樣的認識？

答：明瞭汪主席的和平主張，是救國主義。

第二課 舉一個例（上）

曾仲鳴●先生瀟留的時候，有鄭重而簡單的兩句話：「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什麼不放心的。」曾先生對於國事的主張，與我相同；因為主張相同，所以此次不免於死，曾先生之死，為國而死，為對於國事的主張而死，他臨死的時候，因為對於國事尚有主張相同的我在引為放心。我一息尚存，為着安慰我臨死的朋友，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他他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經應該更盡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張的實現；何況這主張的實現，是國家民族生存所繫。

我因發表豔電，被目為主和，主和是我對於國事的主張了：這是我一人的主張麼？不是，是最高機關，經過討論，而同決定的主張。這話有證據沒有呢？證據何止千百！今日舉一個例罷。

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

時間 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

地址 漢口 中央銀行

出席 于右任 居正 孔祥熙 何應欽

列席 陳果夫 陳布雷 徐堪 徐謨 翁文灝 邵力子 陳立夫 董顯光

主席 汪副主席

秘書長 張羣

秘書主任 曾仲鳴

徐次長謨報告

一、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號，接得德國政府訓令，來見孔院長，二十九號上午，又見王部長。據稱「彼奉政府訓令云：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曾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條件數項，囑德國轉達中國當局。其條件爲（一）內蒙自治。（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物爲華北最高首領。現在能結束，便如此做法。若將來華北有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尙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至於目前正在談判中之鐵產開發，仍繼續辦理。（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至於如何擴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權仍舊。（四）對於排日問題，此問題希望照去年張羣部長與川樾所表示之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五）防共問題，日方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六）關稅改善問題。（七）中國要尊重外人在中國之權利」云云。陶大使見孔院長王部長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見蔣委員長，遂即去電請示。蔣委員長立即請陶大使前往一談。本人乃於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與陶大使私人談話，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德國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見，希望中國考慮：並謂在彼看，日本之條件並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本人所述加以考慮後，謂要與在京各級將領一商。下午四時又去，在座者已有顧墨三白健生唐孟瀟徐次辰。蔣委員長叫本人報告德大使來京的任務。本人報告後，各人就問有否旁的條件，有否限制我國的軍備。本人答稱，據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別的附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委員長先問孟瀟的意

見，唐未即答，又問健生有何意見，白謂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爲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委員長又問次辰有何意見？徐答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墨三，顧答可以答應。再問孟瀟，唐亦稱贊同各人意見。蔣委員長遂表示：（一）德之調停不應拒絕，並謂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下午五時，德大使見蔣委員長，本人在旁担任翻譯。德大使對蔣委員長所說，與在漢口對孔院長王部長所說的相同，但加一句謂：現在不答應，戰事再進行下去，將來之條件恐非如此。蔣委員長表示：（一）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條約可撕破，說話可以不算數；但對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調停，因爲相信德國及感謝德國調停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爲談判之基礎及範圍。但尚有兩點須請陶大使報告德國政府：（一）關於我國與日談判中，德國要始終爲調停者，就是說，德國須任調人到底；（二）華北行政主權須維持到底：在此範圍內，可以將此條件作爲談判之基礎。惟日本不可自視爲戰勝國，以爲此條件乃是哀的美敦書。德大使乃問：可否加一句？蔣委員長說：可以，德國大使說：在談判中，中國政府宜採取忍讓態度。蔣委員長云：兩方是一樣的。蔣委員長又謂：在戰爭如此緊急中，無法調停，進行談判，希望德國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戰。陶大使稱：蔣委員長所提兩點，可以代爲轉達；如德國願居中調停，而日本亦願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兩方先行停戰。蔣委員長說：如日本自視爲戰勝國，並先作宣傳，以爲中國已承認各項條件，則不能再談判下去。在歸途中，陶大使表示，以爲此次之談話有希望。反京時，陶大使並對蔣委員長說：此項條件並非哀的美敦書。陶大使在船中即去電東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覆，此後發展如何，尙不可知。

附註一：國防最高會議主席是蔣中正，副主席是汪兆銘，當時國府表面上由南京遷往重慶，實際上在武漢辦公，蔣主席因軍事指揮，留在南京，故國防會議，由汪副主席代理主席。

附註二：外交部長王寵惠，亦為常務委員之一，是日因感冒請假，故由次長徐謨列席，且徐次長新借德大使由南京回，亦有列席報告之必要。

附註三：徐次長報告所說，墨三，是顧祝同；健生，是白崇禧；孟瀟，是唐生智；次辰，是徐永昌。

看了以上的報告，則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國防最高會議函中所說：「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內容具如此。

【註釋】汪主席之股肱，和平運動之鬥士曾仲鳴先生，於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午前二時半，在河內寓次，為渝藍衣社暴徒襲擊，重傷逝世，主席幸免於難。重慶非但不能主持和平，且妨礙和平，於此益明。汪主席爰於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發表此文，引述國防最高會議對和平折衝之決定，由此可見主和實為中樞所定之政策。重慶之妨礙和平，即為違反既定之國策。

註一：曾仲鳴先生，福建閩縣人，歷任國民政府祕書，行政院祕書長，鐵道部次長，中央政治委員會副祕書長，國防最高會議祕書主任等職，追隨汪主席盡瘁國事，久共患難，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與汪主席同離重慶，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河內寓所被渝方暴徒狙擊，傷重逝世，為和平鬥士為國捐軀之第一人。

註二：歐戰於民國三年爆發，至民國七年結束，民國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參戰各國在法國巴黎凡爾賽宮簽訂和約。

註三：國際談判最後所提出之條件，名曰哀的美敦書。

【要旨】

- 一、哀悼為國而死的和運烈士曾仲鳴先生。
 - 二、舉一個例，證明主和是最高機關決定的主張。
 - 三、敘述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中日事變的經過情形，以糾正渝方矇蔽民衆的歪曲宣傳。
- 問：曾仲鳴先生遇害的原因是什麼？

【研究】

答：曾先生主張和平救國，是汪主席的股肱，渝方妨礙和平，所以暗殺他。他爲國而死，爲對於國事的主張而死，是和平運動中殉難的第一人，我們應當崇拜他的偉大人格，繼續努力完成和平反共建國的使命。

問：主和是否汪主席個人的主張？

答：不是，是最高機關經過討論而共同決定的主張，全國民衆一致的主張。渝方妨礙和平，繼續無底抗戰，不但違反既定國策，並且違反民意。

第三課 舉一個例（下）

此外還有證據沒有呢？何止千百，但其性質尙未過去，爲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祕密之必要；而德大使調停之事，則已成過去，故不妨舉出來作一個例。

於此便會發生以下三個疑問：

第一、德大使當時所說，與近衛內閣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相比較，德大使所說，可以爲和平談判之基礎，何以近衛聲明，不可以爲談判之基礎？

第二、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尙未陷落，已經成爲和平談判可以進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南京、濟南、徐州、開封、安慶、九江、廣州、武漢、均已相繼陷落，長沙則尙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燒個精光，和平談判，反不可以進行？

第三、當德大使奔走調停時，國防最高會議諸人，無論在南京或在武漢，主張均已相同，何以當近衛聲明時，又會主張不同，甚至必將主張不同的人，加以誣衊，誣衊不足，還要奪其生命，使之不能爲國家效力？

對於以上三個疑問，我不欲答覆，但對於和戰大計，却不能再爲國民一言。

有人說道：「既已主戰，則不應又主和。」此話不通！國家之目的，在於生存獨立，和戰不過是達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戰時則戰，到可以和時則和；和之不可，視其條件而定；條件而妨國家之生存獨立，則不可和，條件而不妨及國家之生存獨立則可和。「如此尙不算是亡國條件」，言猶在耳，試問主和

有何不可？

有人說道：「中國因抗戰而得到統一，如果主和，則統一之局又歸於分裂。」這話我絕對反對。從古到今，對國家負責任的人，只應該爲攘外而安內，絕不應該爲安內而攘外；對外戰爭，是何等事？却以之爲對內統一之手段！中國是求國家之生存獨立而抗戰，不是求對內統一而抗戰。以抗戰爲對內統一手段，我絕對反對。何況今日之事，主和不會妨害統一，而不主和也不會不分裂！

有人說：「如果主和，共產黨立刻搗亂」。我以爲共產黨是以搗亂爲天性的，主戰也搗亂，主和也搗亂。共產黨的搗亂，如果於主和時表面化，比現時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局面，只有較好，沒有較壞。

有人說道：「國際並不盼我們和」。我以爲和與戰是國家民族生存所繫，應該由我們自己決定，立於主動的地位，以運用外交，求國際形勢有利於我，決不應該俛仰隨人；何況現時除第三國際外，並沒有其他國家反對我們和。

如上所述，已經明瞭，還有鄭重聲明的；甲午●戰敗之後，有屈辱的講和；庚子●戰敗之後，有屈辱的講和；這是說起來就難過的，我不願這一次的講和是如此。普法戰爭●之後，法國有屈辱的講和，直至大戰而後吐氣；大戰之後，德國有屈辱的講和，直至今日而後吐氣；這是說起來就得意的，我也不願這一次的講和是如此。因爲這樣的循環報復，無有已時，決非長治久安之道。我所誠心誠意以求的，是東亞百年大計。我看透了，並且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兩國對於和平只要相與努力，必能奠定東亞百年長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兩敗俱傷，同歸於盡。這種看法，兩國人都懷疑的，然而也都有確信的。尤其二十個月的苦戰，日本的消耗，不爲不大；中國的犧牲，不爲不重。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的一條路，與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又一條路，明明白白，擺在面前。兩國有志之士，難道忱於

一時之禍福毀譽，而徘徊瞻顧，不敢顯然有所取捨嗎？我希望大家本着獨立不屈不撓的精神幹去。和平建國之第一做犧牲者曾仲鳴先生，已將他自己的血，照耀着我們，這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之大道而前進。

末了，我還有幾句話。當二月中旬，重慶曾派中央委員某君來，給我護照，俾我出國，我託他轉致幾句話：其一、我不離重慶，豔電不能發出，然當此危難之時，離重慶已經很痛心的了，何況離國？我所以願意離國，是表明要主張得蒙採納，個人不成問題，其二、開得國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國際調停；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國際調停與直接交涉同時並行，如此，則我以在野之身，從旁協助，亦不為無補。其三、如果國民政府，始終不下決心，任這局面僵下去，我雖離國，也會回來。以上幾句話，定然是構成三月二十一日事變之原因。所可惜的，曾仲鳴先生比我年青，即賣志以殉，先我而死！

我這篇文章發表之後，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我會繼續曾仲鳴先生而死；我所盼望的，我死之後，國人能留心看看我這篇文字，明瞭我的主張，是中國生存獨立之要道，同時也是世界與東亞長治久安之要道。我的主張，雖暫時不能為重慶方面所採納，終有一日，為全國人民乃至中日兩國人民所採納，則我可以無憾。

【註釋】

註一：光緒二十年（民國紀元前十八年），中日發生戰爭，我國大敗，於光緒二十一年（民國紀元前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簽訂馬關條約。

註二：光緒二十六年（民國紀元前十二年），因義和團事件，發生八國聯軍之役，天津北京等地，均告失陷，後於光緒二十七年（民國紀元前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簽訂和約，賠款四萬萬餘兩之鉅。

註三：公元一八七〇年普魯士法蘭西兩國開戰，普軍攻陷法京巴黎，一八七一年議和，法國割亞爾薩斯洛林二州，償金五十億法郎於普。

【要旨】

一、證據何止千百，但爲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祕密之必要，故將已成過去的德大使調停之事，舉出來作一個例。

二、提出三個疑問，反證渝方妨礙和平，是違反既定之國策。

三、和戰不過手段不同罷了，到不得不戰時則戰，到可以和平時則和；和之不可不，視其條件之是否妨及國家之生存獨立而定。——此點駁斥「既已主戰，則不應又主和」的謬論。

四、一個國家，只應該爲攘外而安內，不應該爲安內而攘外。主和不會妨害統一，不主和也不會不分裂。——此點駁斥「中國因抗戰而得到統一，如果主和，則統一之局又歸於分裂」的謬論。

五、共產黨是以搗亂爲天性的，主戰也搗亂，主和也搗亂。主和時的搗亂，比現時操縱把持挑撥離間的局面，只有較好，沒有較壞。——此點駁斥「如果主和，共產黨立刻搗亂」的謬論。

六、和戰應由我們自己決定，運用外交，求國際形勢有利於我，不該俯仰隨人。現在反對我們和的只有存心叵測的第三國際。——此點駁斥「國際並不盼望我們和」的謬論。

七、暫時的和平，結時循環報復，無有已時，現在我們祈求的是永久的和平。

八、汪主席主張和平，抱着捨生救國的決心，生命置之度外，但求主張爲中日兩國人民所採納。

【研究】

問：實現和平之後，國內統一之局怎樣？

答：對內可以修明政治，確立治安，改善民生，使統一的基礎，更見鞏固。

問：國際對於和平運動的見解怎樣？

答：國府回都後，有日、德、義、滿、羅、西、匈、保、斯洛伐克、克羅特等國先後承認，可證多數友邦，都贊同和平運動的。

問：讀了汪主席的舉一個例，應有怎樣的認識？

答：汪主席是中國最高領袖，抱着不怕死的精神，救中國，救東亞的苦心，而起來領導和平反共建國運動的，我們該信仰汪主席的救國主義，擁護汪主席，在汪主席領導之下，共同努力，担負這新時代的使命。

第四課 中國與東亞

在中日戰事繼續進行中，日本輿論界有東亞協同體之揭示，日本政府，去歲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亦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爲言，雖其定義及其內容，尙未完全明確充實，然吾人從其論據可得兩要點：其一爲排除侵略主義，其一爲排除共產主義也。侵略主義來自西方，以經濟侵略爲骨幹，以軍事侵略輔之。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爲不平等條約所束縛，淪於次殖民地之地位，迄於今日已百年矣。共產主義，亦來自西方，其侵入中國雖不滿二十年，然其階級鬥爭之說，將使中國人類，相砍以盡。侵略主義，譬如多年痼疾，能使中國奄奄不振，以至於死。共產主義，譬如暴病，能使中國咄咄致死。日本自維新以來，已以其國力邁仰侵略主義，使不得逞於國內，共產主義雖欲侵入，然社會組織，已臻健全，亦不能得間。惟中國若受侵略主義共產主義之禍，則東亞的一部分受其禍，從而東亞全體亦將受其禍，結局日本亦將不免，所謂東亞協同體，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實着眼於此，欲以自由獨立之精神，排除侵略主義共產主義，使不得爲禍於東亞也。

然而中國輿論界，對於東亞協同體及建設東亞新秩序之二名詞，不但不感覺興趣，反有恐懼之意，甚至詛咒之惟恐不力，其故何耶？中國人不可不深自反省，同時亦不可不要求日本輿論界之注意。蓋中國人今日第一之大憂，在於日本欲滅亡中國，侵略主義固可怖，共產主義固可怖，而日本欲滅亡中國尤可怖也。充其極，甯結合侵略主義共產主義之國家以反抗日本，明知爲飲鴆止渴，亦所不恤。蓋日本之排除共產主義，中國人雖知之，日本之排除侵略主義，中國人則未之知。中國人以爲日本亦一侵略主義者，其對

於中國侵略最易亦最甚，不惟以暴易暴，且暴中之暴也。中國人持此見解，故對於東亞協同體對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直視爲滅亡中國之代名詞，其恐懼與詛咒，由於此也。

日本輿論界聞吾此言，必將愕然，以爲中國人太不注意日本輿論界之趨向。由中日戰事爆發以來，日本國民深念東亞前途，知中日兩國兵連禍結之結果，適足以助長侵略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燄，使東亞益陷於水深火熱之境遇，故毅然決策，更以東亞協同體，建設東亞新秩序爲號召，欲使中國人明白了解，相與同心協力，以改造東亞之天地，不圖中國人於此等趨向，忽焉不察，而若是之誤會也。日本輿論界爲此責備，吾欲受之，然尚有欲爲日本輿論界一言者。古人有曰：「易地皆然」日本今爲強國，日本人今爲強國之民，其欲進一步改造東亞，誠當然之事，至於中國人今第憂其國亡之不暇，乃能憂及東亞乎？普惠帝問侍臣曰：「何謂荒年？」侍臣曰：「無穀食也。」帝曰：「何不食肉糜？」中國人憂其國亡，獨之憂無穀食也，語以改造東亞，則肉糜而已。關於此點，願日本的輿論界一念及之也。

日本在東亞爲先進國，改造東亞，日本有領導之權利及義務，此中國人所能知者，中國在東亞，爲地大人衆歷史悠久之國，改造東亞，中國有分擔責任之義務，此亦中國人所能知者。中國之所憂，乃在如何始能分擔責任之能力，換言之，中國滅亡，固無分擔責任之可言，卽不滅亡，而主權牽制，獨立自由不能完全，其分擔責任之能力，亦必因而削弱。故中國之求生存，求獨立自由，爲中國計，亦爲東亞計也。關於此點，不能不望日本輿論界之深切了解。惟中國輿論界亦必須注意者，中國之生存及其獨立自由，必有待於侵略主義共產主義絕跡之後，始能完全無憾，中國欲達到此目的，當與日本協力，同時對於各國在中國之合法權益，固當尊重，對於各國之友誼固當維持，然對於侵略主義與共產主義則必不當容其存在，尤不當有利用之意思存於其間，必如是始能舉分擔責任之實而無愧也。要而言之，日本期望中國之分擔責任，

則不可忘中國之獨立自由，爲不可侵；中國期待日本不妨害其獨立自由，則不可忘共同目的之不可忽視。如是各自努力，而有相互了解，改造東亞之大業，始可邁進，而底於成也。

中國國民黨 總理孫先生之大亞洲主義，暨最近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於中國與東亞之關係，及中國國人所當致力者，已有明確之指示，吾人以此自勉，以此相勉，並以此貢之日本輿論界。

【註釋】

二十八年十月一日，汪主席應日本中央公論雜誌撰文，說明中國之求生存獨立自由與建設東亞新秩序，義當一致，中國必先有能力，然後可以分担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責任。

註一：以東亞各民族視同一體，謂之東亞協同體。此協同體與反乎王道精神之霸道集團不同，以團結一致，外禦其侮爲目的。

註二：東亞舊秩序始終不脫歐美帝國主義之支配，此次中日事變後，東亞各民族均獲得一種劃時代的覺悟，深知欲達孔子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之世界大同理想，非打破一切舊秩序不可。建設東亞新秩序云者，乃指在東亞共榮圈內，建設一種與舊秩序不同之秩序之謂，此種建設工作，實爲達世界大同之理想的初步工作。

註三：清道光十九年（民國前七十三年）清廷以英人販運鴉片，流毒全國，命林則徐赴廣東禁之，焚鴉片二萬餘箱，絕英人互市，英人以兵攻粵，擾及沿海，進攻南京，乃斥林則徐，與英人和，於道光二十二年（民國前七十年，七月二十四日（陽曆八月二十九日）簽訂南京條約，賠款二千一百萬元，以香港全島永遠割讓與英國，闢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爲通商口岸。

註四：國父在民族主義第二講裏說：『中國所受列強經濟力的壓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較全殖民地，還要利害。……中國是對於已經締結了條約各國的殖民地，凡是和中國有條約的國家，都是中國的主人，所以中國不只做一國的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故叫中國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對的，依我定一個名詞，應該叫做「次殖民地」。這個次字，是由於化學名詞得來的，如次亞燐便是。藥品中有屬燐質而低一等者名爲亞燐，更低一等者名

爲次亞憐。又如各部官制，總長之下低一級的，就叫作次長一樣。」

註五：晉惠帝，姓司馬名衷，武帝之子，在位十七年。（公元二九〇年——三〇六年）

註六：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三日間在上海舉行，出席者全國各黨

部代表二百四十餘名，議決各要案：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一日以後中執會及監委已失其行使職權之自由，一切決議及命令完全無效；解散中央及地方黨務機關靜待改組；推汪精衛同志爲中執會主席，廢總裁制，以主席代行總理職權；及其他關於推動和運之各要案。八月三十日發表大會宣言及政綱。宣言原文如下：

去歲四月，本黨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武昌，在宣言中明示中國此次抗戰之目的，及對於將來之希望，其追溯既往，有曰：『蓋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以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爲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爲合作原則。』此於中國本來之目的，及其維護和平之意響，闡述甚明。其敘蘆溝橋事變以來，中國以和平無望，迫不得已，出於抗戰，然仍鄭重爲之結論曰：『吾人之本願在和平，吾人之最終希望仍在和平，惟吾人所謂和平，乃合於正義之和平，必如是，然後對內得以自立，對外得以共存。』於此可見中國本來之目的及和平之基本條件，始終無改。且重言以申明之曰：『必使日本瞭然於中國之目的，知中國終不可以暴力屈服，幡然變計，放棄其侵略主義，更與中國謀合於正義之和平，然後中日共存之希望始達，太平洋之危機始息，世界和平始得到真實之保障。』中國對於將來之希望，於此更坦白真摯披露無餘。凡此不特爲本黨同志之言，抑亦中國同胞之公意。中日兩國，同在東亞，文化關係，至深且切，數十年來，日本已成維新之業，使東亞增重於世界，中國亦正覺悟其歷史之使命，繼續總理孫先生之遺志，努力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在此次不幸之戰爭中，中國固深切認識日本國力之強，日本亦深切認識中國民族意識之盛，與建國信念之堅固而不可拔。雖抗戰以來，中國喪師失地，瀕於覆亡，然全國人民犧牲決心，久而彌厲，將士效命，前仆後繼，合於正義之和平，一日不達，則抗戰一日不懈。日本於此，亦毅然不以戰勝者自處，於去歲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聲明，此聲明中，列舉日本所要求於中國者，爲『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項，於『共同防共』項中，標明『

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於『經濟提攜』項中，復標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除此三項要求之外，歷述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抑且不吝進而考慮交還租界，廢除中國完成其獨立所必需之治外法權』。並鄭重說明日本之所以出此，『實欲要求中國以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分擔者之資格，於實行其職務時所必需之最少限度之保證。』日本之爲此聲明，其爲放棄侵略主義，欲與中國謀合於正義之和平，至爲顯然。日本在戰爭中，有此反省，中國亦不可不深自反省，使合於正義之和平得以早日實現。夫中日兩國之關係，總理遺教中國於大亞洲主義之演講久已示其正鵠；『中日兩國無論從何方面着想，均宜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中日兩國當爲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原動力』，其深切著明久已爲吾人之所服膺。前此深維中國若不能得到自由平等，則無分擔此責任之資格與能力，故不得不先致力於國民革命以求之，乃國民革命尙未成功，中國之獨立生存已受威脅，息息有覆亡之懼，侵尋不已，始釀成此不幸之戰爭。今者日本既有此聲明，不惟目前之爭可息，歷年以來之糾紛，亦可本此以爲解決，且不惟對於東亞可與日本攜手協力進行，世界和平亦可於此奠其基礎；此正上屆宣言所謂『中日共存之希望始遂，太平洋之危機始息，世界和平始得到真實之保障』者。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汪兆銘同志建議中央，主張對於日本之聲明，『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討各種具體方案，實爲根據宣言所明示之方針，以漸實現合於正義之和平；此全黨同志所公認，亦即全國人民所漸其實現者也。』

上屆大會既於宣言中明示方針，並選舉蔣中正汪兆銘兩同志爲正副總裁，使負執行此方針之責，同時布告海內外同志，當在共同信仰的三民主義之下，竭其忠誠，服從領導。乃蔣同志棄置方針，對於日本政府去歲十二月二十二日之聲明，遽以個人武斷，發言拒絕，對於汪同志之建議，更不念大會付託之重，遽予以永遠開除黨籍及解除一切職務之處分，復用極端嚴厲手段，箝抑輿論，極端慘酷手段，殘殺同志，遂使和平運動橫受挫折，戰爭依然繼續。而其尤可痛心者，去歲四五月間，共產黨人所祕密傳授『中共策略路線』一書，已被發覺，其所謂『一切以抗日爲前提，在抗日口號掩護之下，進行階級鬥爭土地革命』，已定爲信條，其見之於行事者，假藉抗戰，以削弱國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繼續不斷，喪師失地，以促成其崩潰之勢；假藉抗戰，以實行民窮財盡政策，

所至焚殺，使所謂中小資產階級歸於掃蕩，且使大多數人皆成爲無業游民，供其利用；假藉抗戰，以實行愚民政策，剝奪所謂智識階級之一切自由，使全國陷於精神破產，不識不知隨而盲動；假藉抗戰，以擴大邊區政府之勢力，謀於相當時機取國民政府而代之，夷中華民國爲中華蘇維埃，使永爲蘇聯之附庸；假藉抗戰，使中日兵連禍結，蘇聯得安坐而乘其敝；凡此種種，無不根據已定的策略，爲有系統的進行。其在邊區以內，則利用封鎖政策，以隔絕耳目；其在各戰區及各淪陷區，則以無恥的宣傳，掩其率獸食人的行徑；其在國民政府所在地，則隱身於擁蔣抗日口號之下，狐假虎威，含沙射影，使人民爲之側目，將士爲之離心，同志爲之解體。此在共匪，出賣祖國是其素志，殊不足責，所可怪者，蔣同志陽則受其擁護，陰則使其利用，曾不一念，十餘年來，諸將士爲剿共而流之血徧於十餘省，人民直接間接死於共匪之手者不下數千萬。當此國家存亡繫於一髮之際，置一切同志之忠言於不聽，惟共匪之所左右，一切同志不見容於共匪者，即不見容於蔣同志，馴至關係國家存亡之和戰問題，不取決於大會所明示之方針，不取決於同志之建議，而取決於共匪之顛指氣使；以是之故，使和平運動橫受挫折，戰爭依然繼續。夫在未得合於正義之和平以前，戰爭爲不得已，既得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猶繼續戰爭，則實無意義之尤，況乎和戰問題爲共匪所劫持，則合於正義之和平永無實現之望，而繼續抗戰適以促其滅亡，此誠不能不加以糾正者。上屆大會以執行方針之責任之蔣同志，蔣同志乃棄置方針於不顧，以自誤國，本屆大會爰以一致之決議，解除蔣同志總裁之職權，並廢除總裁制，更授權汪同志，使本於上屆及本屆大會所定方針，領導同志積極進行。

日本政府聲明中，關於共同防共，其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的陰謀，於中國實爲當務之急。前此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干涉及於軍事內政，今既聲明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其所謂：『鑑於中國之現狀，爲獲到此項防共目的之保障計，在該協定期間內，要求在特定地點允許日軍駐紮防共，及指定內蒙爲特殊防共地域』，其協定期間及特定地域。自有待於兩國之協商同意，而內蒙雖爲特殊防共地域，其領土主權仍屬中國，自無疑義。關於經濟提攜，日本既聲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復聲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占，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而僅欲要求中日之提攜與合作』，則與上屆大會宣言中，

所謂『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適相符合。惟關於善隣友好，包括滿洲問題，此為九一八以來中日之間所久懸未決者。惟上屆大會宣言中既已明示：『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蔣同志在大會宣言中對於此點加以說明，謂『日本如能保障在東北問題解決以後，不再侵犯我領土主權，則個人可以挺身負責，使此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今日本對於中國之領土主權既有如此之聲明，則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的解決，中國自當履行諾言，以期貫徹善鄰友好之目的。凡此三者，本屆大會決定原則，至其具體方案，當由國民政府以交涉方式，悉心厘訂，以求適當。要之，合於正義之和平，已因中日兩國之相互了解，而得其途徑。本屆大會特鄭重宣布，自今以後，當易抗戰建國之口號為和平建國，且鑒於共匪之死灰復燃，為禍未已，特再鄭重宣布，以反共為和平建國之必要工作。蓋和平所以順利建國之進行，反共則所以掃除建國之障礙。望海內外同胞，共喻此旨，在共同信仰的三民主義之下，竭其能力，以完成此重大之使命。本屆大會更對於外交內政一切重大方針加以檢討，宣布如左：

關於外交，上屆本會宣言中曾明白提出：『中國今日對外關係，惟當謹守以下兩原則；其一，對於曾經參加之維持國際和平之條約，必確實遵守；其二，對於世界各國既存之友誼，必繼續不懈，且當更求其增進』，並對於當時流行之人民陣線論加以指正，其言至為痛切。惟人民陣線論者，陽襲救國之名，陰則追隨共匪之後，仍鼓其謬說，甚至創為世界大戰爆發其結果必有利於我之譏言，此對於中國為不忠，對於世界為不仁。最近國際關係之劇變，更足使此等譏言已窮於辭，尤足使中國國民認識彼循國際陣線之外交政策，直將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蓋中國為積弱之國家，斷無實力以縱橫捭闔於世界列強之間隨其瞬息變遷之離合，以決大計，尤無實力妄冀遠交近攻，以取勝利，充其所至，徒使戰則無同盟之援助，和則受外來之牽制，惟有任東亞相與為隣之兩大民族共受其禍，而不能自己，非獨不忠不仁，抑且不智。不忠、不仁、不智、不特不齒於中國之國民，且不齒於世界之人類。故中國今後外交方針，當謹守上屆大會所示之兩原則，以謀國際關係之維持，各國友誼之增進，以及各國在華正當權益之安全發達，而益之以睦隣友好，庶幾可由東亞之和平，而得到世界之和平，不惟遠交近攻之策絕對屏斥，一切合縱連衡之技亦無所施，必如此，然後對內得以自直，對外得以共存也。

關於內政，上屆大會宣言中，明示內政方針，實與外交方針相為表裏，而皆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指揮原理。其關於民族主義者，上屆大會宣言中，引第一屆大會宣言，說明『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所謂『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乃對外而言，中國所求，為自拔於次殖民地之地位，故『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之必要途徑。所謂『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乃對內而言，第一屆大會中，已對於諸少數民族有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國家之諾言矣。本屆大會對此惟有以前後一致之精神，期其貫徹。其關於民權主義者，上屆大會宣言中提出『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為發展民力之必要工作，亦為增進民權之必要條件，亦為本屆大會所當繼續力行者。』惟上屆大會宣言中，關於政權機構，有謂『戰爭既起，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關於國民大會之召集，憲法之制定頒布，不得已而延期，政府此時惟有依據國民會議所制定頒布之約法，以行使治權；』並謂『應設置國民參政機關，俾集中全國賢智之士以參與大計』。本屆大會檢討國民參政會成立以來之結果，深覺有名無實，蓋個人獨裁變本加厲，中央同志已無討論之自由，國民參政會形同虛設，亦固其所。且即以國民參政會之職權而論，亦未能舉參與大計之實。本屆大會特鄭重宣布，授權汪同志，延請國內賢智之士，參加中央政治委員會，前此中央政治委員會為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其人選限於黨員，今當破除此例，以收集中全國人才之效，並鄭重宣布，除共產黨外，凡屬人民，皆當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本黨願以至誠聯合全國有志之士，不分派別，共同担负收拾時局之責任。而尤為切要者，則戰爭既息，國民大會之召集，憲法之制定頒布，已無延期之必要，務於最短期間，使全國和平得以實現，國民大會得以召集，憲法得以制定頒布，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以完成民權主義之階段。其關於民生主義者，上屆大會宣言中申述總理遺教，諄諄以消弭階級鬥爭為念，其言固已深切。本屆大會，當共產黨人野心復熾之日，不得不再有所申明。蓋共產黨人往往截取民生主義第一講中『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一語，以為其行動之護符，殊不知民生主義第一講原文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此為泛指『梳西利甚』而言，非指馬克思之共產主義而言，其意甚明，豈容附會。且民生主義自第一講以下，詳細講述民生主義與馬克思之共產主義之異同，馬克思之共產主義以物質為中心，民生主義以民生為中心；馬克思之共產主

義認階級鬥爭爲社會進化的動力，民生主義認階級鬥爭爲社會病態，階級合作爲社會生理的常態；馬克思之共產主義主張以社會革命改造社會經濟，民生主義主張以和平方法改造社會經濟；故其見諸政策者，馬克思之共產主義主張沒收一切工業私有權，民生主義則提倡節制資本，凡工業之宜於國營者，以國家資本任之，宜於私人企業者，以私人資本任之，而國家以法律爲之保護；馬克思之共產主義主張沒收一切土地私有權，民生主義則反對沒收方法，而採取平均地權的和平方法；由此可見民生主義與馬克思之共產主義在理論上固根本不同，在方法上更相水火。馬克思之共產主義，其學理與政策所有弱點，至今已盡暴於世，而世亦無有一國家實行馬克思之共產主義者。蘇聯之新經濟政策與五年經濟計劃，其去馬克思之共產主義已不可以道里計，況乎共匪惟知以殺人放火爲李自成張獻忠之續，附會馬克思之共產主義已爲不倫，牽合民生主義，益以見其心勞日拙而已。中國今日以後，以和平反共爲建國之必要工作，對於民生方面，惟有在理論上篤守民生主義，在方法上力行實業計劃，既不蹈襲私人資本主義之窠臼，尤不與馬克思之共產主義有所關涉。此則上屆大會所已宣布於國人，而本屆大會尤不憚鄭重以申明之者也。

外交內政如上所述，其關於教育思想者，上屆大會宣言中提出二義：一爲道德修養，一爲科學運動。此在和平反共期間，尤爲重要。共匪之物質觀念，舉凡人類崇高和平之理想，悉被唾棄，其結果淪入道於禽獸，而其愚民政策尤與科學運動背道而馳，簡單之標語，籠統之口號，最爲科學運動所不容，亦最爲共匪所利用，以爲殺人放火之工具。以道德修養提高社會互助精神，排除階級鬥爭思想，以科學運動提高求知起信精神，排除盲從魯莽思想，和平反共之成功，必有賴於此。尤有進者，近年以來，中國之民族意識日益普及而堅強，此爲中國之進步，世界之所同認。然因此之故，有惡中國之民族意識欲及其萌蘗而加以摧殘者，亦有欲利用之以遂其陰謀大欲者，此爲中國近年以來所逢之厄運，識者之所引爲深憂。今者中國於創鉅痛深之後，知非和平不能建國，非反共不能和平，彼懷挾陰謀者已無所逞，今日以後，中國惟有本於三民主義之指示，以至誠發揚固有之道德，以虛心勇氣翁受現代之文化，使生長成熟中之民族意識，內則爲自立之楨幹，外則爲共存之柱石，中國決不以狹隘的愛國主義自囿，而陷於排外思想之歧途，同時亦望我隣國暨諸友邦共明此旨，以兼相愛交相利之精神相與努力，以

期於東亞和平暨世界和平有所貢獻。

本屆大會，檢討過去一年有餘之經過，對於中國現狀，及外交內政一切進行情形，有不能不鄭重聲明者，本黨同志追隨總理，致力國民革命，至今已五十餘年，所擔負者爲歷史上之使命，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爲職志。乃自執政以來，對內則未能根據建國大綱使三民主義逐步實現，對外則未能防禍未然，以致事變猝發，又未能及時挽救，以致日益擴大，言念及此，至爲痛心。今日以前，吾人認非抗戰無以建國，集其精力，艱難奮鬥，無時不準備犧牲一己，以爲國家爲民族；今日以後，吾人認非和平反共無以建國，其事業之艱鉅，一己所受之勞苦與所冒之危險，較之抗戰更爲嚴重。蓋和平運動正在開始，能否得有效果，全視乎吾人之努力如何。日本政府之聲明爲其一定之國策，亦爲其一致之輿論，吾人固不應加以無端臆測，惟吾人不可不全力謀其原則之實現，以及各種具體方案之斟酌盡善。此外則戰後收拾，亦非易言。現在全國人民無論所履何地，皆在水深火熱之中，抗戰時代必要之犧牲，固無所憾，然因政府措置不善，以及共匪從中作祟，使大多數人民之生命財產斷送於無益之消耗，民力疲敝，國力隨之，若不恢復，國家民族何以能自立於世界。本黨同志當以極大之決心與勇氣從事自責，從事自任。本黨同志必須認識，數年以來，黨已失去民主集權制度精神，而日益趨於個人獨裁，此實爲一切敗壞之原因。當危急存亡之際，爲應付事機，固當授權於有德望才力之同志，使行動得以敏捷，但其基礎仍在民主，必有健全之民主組織，乃能有敏捷之集權行動，故自由意志與紀律實當並重。必如是，然後黨乃能集中意思集中力量；必如是，然後黨乃能不斷的吸收有獨立見解及自由思想的分子，以同負責任，遇事乃能有真實之認識，堅決之行動。至於個人獨裁之下，則但有盲從與脅從，其結果仍一盤散沙而已。同時黨的組織與訓練必須健全，然後能領導民衆，從事於民衆組織，民衆訓練，而黨的活動尤必須涵於民衆活動之中，然後黨與民衆之間始無隔閡。要之，本黨同志當此厄運，逢此鞫凶，自責不可不嚴，自任不可不重，過去之使命，本黨同志當繼續擔負，當前之困難，本黨同志尤當努力克服，但求能挽國家民族於將亡，而致之於復興，即可無愧先烈，無負子孫，此外一切生死禍福榮辱毀譽皆當置之度外。黨內之能精誠團結胥繫於此，而對於全國有志之士能真實合作，向和平反共建國之目的攜手前進，亦胥繫於此也。

自蘆溝橋事變以來，舉國一致，出於抗戰，其最高目的，在於斬致合於正義之和平，迄於今日，雖戰事未息，而和平已見其曙光。本屆大會謹以滿腔誠悃，對於爲國犧牲之同胞，致其哀悼，同時對於爲和平運動獻身努力之同胞，致其敬禮，今日以後，更當一其心志，齊其步驟，以致力於和平之實現，憲政之實施，使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確立於東亞，確立於世界。

【要旨】

一、中國求生存，求獨立自由，是爲中國計，亦爲東亞計。中國要達到此目的，當與日本協力，使侵略主義共產主義絕跡。日本所號召的東亞協同體與建設東亞新秩序，有二大要點：（一）排除侵略主義，（二）排除共產主義，與中國的期望，完全膺合。

二、日本在東亞爲先進國，改造東亞，有領導之權利及義務；中國在東亞爲地大人衆歷史悠久之國，改造東亞，有分擔責任之義務。不過中國須達到生存及獨立自由之目的，始有分擔責任的能力，這一點要望日本輿論界深切了解。

三、過去中國輿論界對於東亞協同體及建設東亞新秩序二名詞，因爲不知日本有排除侵略主義之意，不免發生誤解；現在看了近衛聲明，已經明瞭；從此中日要在共同目的之下，各自努力，相互了解，完成改造東亞之大業。

【研究】

問：改造東亞，爲什麼要排除英美侵略主義與共產主義？

答：這兩種主義，都危害國家的生存與獨立自由。日本自維新以來，雖已遏抑英美侵略主義，使不得逞於國內，又因社會組織健全，共產主義無隙可乘。然而中國被英美侵略主義壓迫已有百年的歷史，共產主義的侵入，將使中國人類滅盡，中國是東亞的一部分，受到這二種主義的禍害，長此以往，東亞全體將同受其禍，結局日本恐亦不免。所以中日兩國爲東亞計，要以自由獨立之精神排除英美侵略主義及共產主義。

問：關於建設東亞新秩序，中國應怎樣做？

答：中國有分擔責任的義務。但須獲得生存及獨立自由，始有分擔責任的能力；使英美侵略主義共產主義絕跡於中國，然後中國之生存及獨立自由，始能完全無憾，舉分擔責任之實而無愧。

問：讀了汪主席的中國與東亞，應有怎樣的認識？

答：本文雖是汪主席寫給日本輿論界的文章，我國民衆也有恭讀的必要。汪主席對於過去中日輿論界誤會的癥結，觀察得非常清楚；闡明中國在東亞的立場，求生存及獨立自由的目的，與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意義，完全相同，也句句是肺腑之言，對友邦人士，披露救中國救東亞的誠意。我們要欽佩汪主席的愛國精神，信仰汪主席的救國主義，擁護汪主席領導的和平反共建國運動，與友邦同心協力，實現建設東亞新秩序。

第五課 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上)

總理孫先生告訴我們：「中國革命之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這句說話意義重大。日本是東亞一個大國，經濟軍事文化着着先進，最近幾十年，可以說無日本則無東亞。中國事事雖然落後，却是東亞一個個大人衆歷史深長的國家，如果要強盛起來，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國的強盛對於日本會發生什麼影響，於日本有利呢還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當然願意中國強盛，願意與中國爲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將中國強盛的動機打消了去，決定以中國爲敵。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爲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

因爲這樣，中國革命若要成功，必須使日本知道，中國革命之成功，於日本有利，這不是權謀策略的，而是誠意的。怎樣纔能於日本有利呢？中國與日本外交方針一致，軍事方針一致，更進而根據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經濟合作，這樣中國的強盛，便於日本有利而無害。這是不是有損中國主權呢？絕對不是，因爲一個國家對於一個國家，因爲利害相同結合，絕對不是有損主權；這是不是有損第三國正當權益呢？絕對不是，因爲中日的結合，爲的是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並沒有排斥第三國正當權益的意味。

十三年間，孫先生在廣州手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①，那時候對於中日關係，是照着以上所述方針進行的。十四年間，孫先生逝世^②，我繼承遺志，主持國民政府，對於以上所述方針，兢兢業業，不敢少變。十七年間，便不然了，濟南事件^③爲中日關係惡轉的起頭，但是冤仇宜解不宜結，中國此時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釋。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復歸於好轉，不幸當時國民政府計不出此，遂使中日關係由惡轉

而更惡轉，由此一直至九一八事變發生。

我說這話，並非有意責難當時主持國民政府的人，我是一個國民黨員，是一個與國民政府有關係的人，對於這種錯誤，我當然該分擔責任。不過我要求讀者知道，我在當時是一個亡命者，是一個被國民政府通緝而飄流海外的人，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回到南京，擔任行政院長，其後又兼外交部長，我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來矯正當時「反對直接交涉」的論調，在我手裏先後訂定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我當時的用意，仍是本於冤仇宜解不宜結的觀念，想從局部暫時的安定，進而謀全國的永久的和平。我的主張，四年之間，並未達到，我絕不諉咎於人，我只自認才力不逮，事與願違而已。

但是我必反對一種論調，這種論調就是當時所謂主戰派，試問以一個剛剛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爲敵，戰的結果會怎樣？這不是以國家及民族爲兒戲嗎？

我當初以爲蔣介石先生與我是同心的，我看了二十年十二月蔣辭國民政府主席職後，一篇告誡國人的文字，認爲蔣與我是同心，所以誠心誠意與蔣合作，然而四年之間，我已漸漸覺得不對了。及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我於大病之後，又受了三傷^②，身體上支持不住，二十五年一年以內，我遠適異國，直至西安事變發生^③，方纔趕了回來，則情形更加大變了。我當時只能牢牢認定剿共事業決不可中止，因爲共產黨是只有第三國際，不知有中國的，他受了第三國際的祕密命令，將階級鬥爭的招牌收起，將抗日的招牌掛起，利用中國幾年來的民族意識，挑動中日戰爭，這種大當斷斷乎上不得的，我當時的言論方針注意此點，讀者可隨時加以覆按。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我對於中日戰爭，固然無法阻止，然而沒有一刻不想着轉圜；對於共產黨的陰謀，也沒有一刻不想着抵制他，揭破他，直至最後最後，方纔於十二月十八日離開重慶，二十九日發表和平建議。

我的和平建議，是贊同日本近衛內閣聲明的，我爲什麼贊同呢？我依然是向來一貫的觀念，對於日本冤仇宜解不宜結。打了一年半的仗，日本的國力，中國的民族意識，都已充分表現出來，日本既然聲明，對於中國沒有侵略的野心，而且伸出手來，要求在同目的之下親密合作，中國爲什麼不也伸出手來，正如兄弟兩個廝打了一場之後，抱頭大哭，重歸於好？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歡喜的事？假使蔣能認識這是中日關係已到了一個新時期，毅然決然對於此聲明的大意，表示贊同，則中日和平途徑即可開展；更進而根據所謂三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條件，期於彼此交受其益，則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即可確定；此後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不難循序而得。不幸蔣不出此，反而用深閉固拒的態度，對付日本的提議，更用極端壓迫摧殘的手段，對付國內黨內的一切和平建議。以此之故，蹉跎半年，大局日益敗壞，不可收拾，這是真可痛惜的！

【註釋】 本文爲二十八年七月九日汪主席在上海之廣播演辭，七月十日中華日報在上海復刊，即刊載於該報。本文闡明對日和平爲國民黨總理孫先生之遺志，抑且爲時代之需要，並可由此而進達於確立東亞永久和平之大道。和平運動爲國民革命之繼續開展，由此可以明瞭。本文可以視爲開始實際和運工作之宣言。

註一：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國父手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二十五條。

註二：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國父在北平逝世。

註三：民國十七年五月三日發生，至翌年三月二十四日解決。

註四：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中日兩國解決一二八一事變，成立淞滬停戰協定。

註五：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汪主席在中央黨部被暴徒狙擊，受傷甚重，幸天相吉人，經醫治後即愈。

註六：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勾結共黨叛變，蔣介石只知保持個人生命地位，不惜破壞國策，停止剿共，遂造成後來的抗日戰事。

【要旨】

一、中國與日本外交方針一致，軍事方針一致，更進而根據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經濟合作，這樣於日本有利無害，也絕對無損於中國主權，並且沒有排斥第三國正當權益的意味。

二、當國父手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時，對於中日關係，照這方針進行；到北伐時，纔開始惡轉，而致發生九一八事變。汪主席繼承國父遺志，挽回危局，想從局部的暫時的安定，進而謀全國的永久的和平，曾費了很多的心血。

三、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爲敵，簡直以國家及民族爲兒戲。過去中日發生戰爭，是被萬惡的共產黨利用，上了一個大當，今後應當重歸於好，親密合作以奠定東亞永久和平的基礎，而達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目的。

【研究】

問：中國的強盛，對於日本有利呢還是有害？

答：有利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能和日本共同負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責任。

問：調整中日關係，應該怎樣？

答：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結的信念，使中日關係好轉；中國與日本外交方針一致，軍事方針一致，更進而根據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經濟合作，走上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大道。

問：共產黨的陰謀是什麼？

答：共產黨受了第三國際的祕密命令，挑動中日戰爭，要使中日兩敗俱傷，坐收漁翁之利。過去中日關係的惡轉，被共產黨利用機會，很覺痛心；今後要明白他們的陰謀，中國與日本共同防共，消滅危害東亞的共產黨。

第六課 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下)

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項原則，固然在近衛聲明中，方纔輪廓明白，但是數年以前，日本已經有此提議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有吉大使與蔣會見，曾經提出以三原則爲改善中日關係之基礎，蔣表示贊同，並表示無對案。其後忽然翻覆：一則曰，那時是軍事委員長，不是行政院長，所說的話，不算數，二則曰，那時以私人資格談話，不是以公式談話；三則曰，所謂贊成者，乃是贊成對於三原則之討論，不是贊成三原則；四則曰，所謂無對案者，乃對於三原則之實施而言，絕非無條件贊同；這是二十五年整整一年中日交涉反覆停頓之原因，也是二十六年中日衝突終於爆發之原因。我們讀了當時的外交談話紀錄，只有浩歎。及至二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一月，德國陶德曼大使調停戰事，所述日本政府之和平條件，何嘗不也是三原則？我在「舉一個例」文中，已經說過，不必再述，至於近衛聲明，本其向來一貫的主張，爲系統的敘述，並且於我國顧慮之點，均已加以解釋，例如關於共同防共，因爲我國顧慮以此之故，干涉及於軍事內政，故聲明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關於經濟提攜，因爲我國顧慮政治糾紛尙未解決，故聲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聲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有了這樣鄭重而明白的聲明，則三原則之實行，決無害於中國之自由獨立。不但此也。所謂共同防共及經濟提攜，其主要目的在使其產擾亂與經濟侵略兩大毒害絕跡於東亞，這等責任非常重大，日本既屬望中國分擔這等責任，則中國必須有充分之自由獨立，方能有分擔此重大責任之能力，自無待言。然則我們贊同此聲明，決不是苟求一日之安，而爲的東亞百年大計，然則

我們爲何對於此聲明採取深閉固拒的態度？

在蔣統制下的宣傳，動不動說，日本正在以全力滅亡中國，所謂三原則，不過是一種託詞。這種宣傳，實在是不對的：第一，日本若要滅亡中國，則以全力繼續作戰便了，不必有所託詞；第二，三原則的提出，已歷數年，如上所述，自近衛聲明以來，更明顯的定爲國策，全國輿論，已趨一致，何以見得是託詞？第三，中日兩國如果沒有一個共同努力之目標，則因利害衝突之故，勢必至於水火不相容，反之，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則利害一致，衝突自然無從發生，這樣的關係重大，如何可以說是託詞？第四，數年以來，中日關係所以不能改善，且日趨於惡劣，係誤於一種循環論。例如日本說：中國排日，是九一八事變的起源；中國說：日本侵略是排日的起源；日本說：中國要拋棄以夷制夷政策，纔能使中日關係好轉；中國說：日本要放棄對於中國的野心，纔能使中日關係好轉。諸如此類，都是互相期待，互相責備，以致愈弄愈糟，如今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以同時着力，先期待自己，然後期待他人，先責備自己，然後責備他人，則進步必然較快，成功必然較易，如此做去，不但使中日過去的糾紛得以解除，現在的戰禍，得以結束及補償，而將來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大道，也可以從此踏了上去。

然則爲什麼一定要拒絕和議而高調繼續抗戰呢？我們必須知道，抗戰以來，軍隊和人民都已充分的表示了民族意識，這是不可磨滅的，然而同時我們又必須知道，這種民族意識，如今已被共產黨利用了。利用民族意識，在民族意識的掩護之下，來做摧殘民族斷送國家的工作，在共產黨是以爲當然的，因爲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所謂民族，有所謂國家。他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國際的命令，要把中國來犧牲，犧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犧牲的人數，越多越好，犧牲的時間越長越好。中國固然犧牲個精光，日本也不免要受多少創傷，這在第三國際看來，真個是一舉兩得。何況天從人願，抓着了蔣來做幌子，以盡情發洩十六年以來一

剿共」的仇恨，等到盡情發洩之後，他自然會回到他的第三國際老家去，用不着一些留戀。因為這樣，所以三番幾次得着了恢復和平的機會，偏要說抗戰到底，這就是說中國永遠得不着和平的，非替第三國際犧牲到底不可。總而言之，共產黨的罪惡，浮於義和拳^①，而為共產黨利用的人，其罪惡又浮於剛毅^②諸人以上，雖然尚有忠勇的軍隊，忠勇的人民，至多不過如聶士成^③一般，只能盡自己報國的心事，決不能挽回當前的劫運，不如學劉伸一張之洞^④之保障東南，李鴻章^⑤之挺身入京，在八國聯軍槍桿之下，成立和議，或者還可以補救一些。

我覺得今日有兩條路擺在面前：一條是跟着蔣高調繼續抗戰，以蔣現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並且不足以控制共產黨，以蔣現有的環境，雖欲不跟着共產黨而不能，這樣下去，只有以整個國家民族跟着蔣為共產黨的犧牲。另一條路是把總理孫先生的遺志重新闡明起來，重新實行起來，對於日本，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結的根本意義，努力於轉敵為友。第一步恢復中日和平，第二步確立東亞和平，這兩條路，前一條是國亡滅種的路，後一條是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路。我決定向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一條路走，我決定團體同志並團結全國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有志之士，來共同走上這一條路。

【註釋】

註一：義和拳即義和團，於清同治光緒之際，用「扶清滅洋」的旗號，戕殺士，焚教堂，引起庚子八國聯軍之役。

註二：光緒二十六年，（民國紀元年十二年）大學士剛毅刑部尚書趙舒翹等人，先後引導拳匪數萬人到北京，遂肇排外的巨禍。

註三：直隸提督聶士成因痛恨義和團，不贊成開戰，在前線抵當聯軍時，被直隸總督裕祿多方掣肘，義和團又把他的家屬殺盡，士成大憤，在天津失陷的那一次舍身血戰而死。

註四：庚子之役，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合各省和各國領事訂約保護東南，所以東南不會糜爛。

註五：李鴻章爲當時我國數一數二的外交家，聯軍攻破北京，聲稱非李鴻章出來，不能議和，清廷遂派李與慶親王奕劻二人爲全權大臣，奕劻不敢開口，只推在章鴻章身上，李臨難不懼，挺身而出，與各國磋商了幾月，積勞病深，盡瘁而死。各國十分感動，乃稍些讓步，於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簽定和約。

【要旨】

一、近衛聲明中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項原則，如能實行，既保持中國之自由獨立，又可使共產擾亂與經濟侵略兩大毒害絕跡於東亞。我們贊同此主張，決不是苟求一日之安，而爲的是東亞的百年大計。

二、駁斥蔣統制下的荒謬宣傳，根據近衛聲明，中日兩國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可以解除過去的糾紛，踏上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大道。

三、揭破共產黨的陰謀，他們根本不知道有所謂民族，有所謂國家，只知接受了第三國際的命令，要把中國來犧牲，盡情發洩十六年以來「剿共」的仇恨。並以庚子之役來比，共產黨的罪惡，較拳匪爲重，被共產黨利用的人，其罪惡又在剛毅諸人以上。

四、指出現在有兩條路：一條是繼續抗戰，斷送整個國家民族；一條是實行國父遺志，恢復中日和平，確立東亞和平。前者要亡國滅種，後者才是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路。

【研究】

問：日本政府的三原則，對於中國怎樣？

答：與中國調整邦交，尊重中國的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屬望中國分担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責任，根絕共產擾亂與經濟侵略兩大毒害，而奠定東亞的永久和平。

問：調整中日關係，雙方都有誠意嗎？

答：國父昭示我們：中國革命的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所以中國對日合作，是誠意的。同時，日本提出三原則，是他們的國策，也是誠意的表示。

問：讀了汪主席的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應有怎樣的認識？

答：明白冤家宜解不宜結，中日應在共同努力的目標之下，密切合作。我們敬謹接受最高領袖汪主席的訓示，團結一致，向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路上邁進。

第六課 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下）

第七課 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

各位同胞，今天是兄弟回到南京之後，第一次同各位同胞說話，說話的時候，心裏頭有無限悲痛。想起過去，看到現在，心裏頭有無限的悲痛說不出來。不過我們對於將來，也有無限的光明。我們應該提起勇氣，把光明來天天擴大，這樣，我們從前的悲痛，才可以慢慢減少。今天兄弟所講的題目，是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這一回國民政府爲什麼要還都呢？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看得出來，從前就各人就各地來做和平運動，現在統一起來做和平運動。和平運動，拿什麼來做目標呢？就是實現和平，實施憲政。這兩個大方針，是和平運動最大的目標，也就是國民政府還都最大的使命。關於怎樣才能夠實現和平，在三月十三日早上我有一篇宣言，在報上登過●是要根據日本近衛聲明，善經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原則，來調整中日的關係。我並且確實聲明我們所有的和平方案，不會超過近衛聲明的範圍，大概我們各位同胞，都已經看見過這一篇宣言了。同一天晚上，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米內的聲明●，這個聲明裏頭的說話，也是一樣的意思，也就是拿近衛聲明做中日調整邦交的基礎，大概各位同胞，也看見了。看見了近衛聲明之後，有米內聲明，我們就可以知道多年以來日本方面，關於中日和平運動是一貫的，中間並沒有什麼參差，並沒有什麼變更。再看見了前年十二月廿九日兄弟的豔電，以至於最近三月十三日的宣言，我們也就可以知道這多年以來，中國方面，關於中日和平運動，也是一貫的，沒有變更，沒有參差。這樣我們的路線是看清楚了，這樣就要走上這條路上去。因爲有了路線，我們不去走是沒有用的，現在國民政府爲什麼還都呢？就是要來實現這種和平的主張，換句話說：就是要走上這條路線去。從前只是主張，現在却

是實行了，要把裏頭個個字能夠實行，這就是關係實現和平一個大概的意思。關於實施憲政，中央政治會議，已經解決了，在國民政府還都之後，就設立憲政實施委員會，務要於最短期間，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一個實現和平，一個實施憲政，一個要來謀中日關係的調整，謀東亞和平與秩序的建設，一個要來完成中華民國的建設。這兩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國民政府還都以後，一切對內對外的政策，都是根據這個大方針去做。國民政府爲什麼要還都，就是爲此。我們要把這幾年以來百姓的痛苦，國家的危險，能夠速除，就要靠實現和平，實施憲政。實現和平實施憲政能否做到這一點，國民政府的同人，願意同我們全國的同胞，同心同德，往這條路上走去。關於實現和平實施憲政，這兩個大方針的內容，我們從前說過很多，今天只是這樣子簡單同我們各位同胞說一次。現在我們所要說的，是從今天以後，和平運動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了。因爲以前和平運動是各地方做的，現在是統一起來，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做的，可以說是一個新的階段。從今以後，我們看見國裏頭，所有主張和平的人，都在一塊了，剩了少數反對和平的人，這種反對和平的人，我們希望他將來也一樣加入這個和平運動。我們天天在等他，我們天天在想方法感動他，就算他們對我們有什麼誤解，有什麼曲解，甚至於污蔑種種，我們都不管，大家都是同胞，只要他們早一點過來，全面的和平，就早一點實現。他們的反對論調，說來說去，總是說我們如果在日本軍隊沒有撤去的地方來組織政府，是沒有用的，是不會有力量的，這一句說話，好像是對的，實在是不對的。我們不能等到和平已經實現之後，才來組織政府。因爲和平能否實現，要看我們能不能努力於和平運動，能不能調整中日關係，能不能大家走上新的光明的大路，所以我們必須組織政府，把實現和平的責任，擔負起來。這樣才有真正的和平，不然，和平是不會實現的。我們知道，我們的前途，一定還有種種困難，我們知道，我們一定還有種種不能十分順手的事情。但是這種困難，這種不能順手，是那一個人給我

們的呢？就是這些反對和平的人給我們的。如果他們能了解和平運動的意義，能接受國民政府的命令，而受其領導，則全面的和平，自然可以實現。目前全面的和平不能實現，完全由於他們的阻礙，所以我們絕不能說全面的和平沒有實現，我們就不去做和平運動。這句話，是不通的。做了和平運動，全面的和平，才可以實現。不是全面的和平實現之後，再去做和平運動的。對於這一點，我想重慶方面唱高調的人，自己要想一想。我們始終都是誠心誠意，盼望全國的了解和平運動的人來了解，盼望反對和平運動的人來贊成，當然我們不能等他，他不贊成，我們自己先做。我們在理論上說明白，給我們的同胞聽，我們還要努力在事實上做去，來給我們同胞看。那麼，我相信和平運動一定能夠發展，並且一定能夠普遍。沒有什麼人，可以妨礙我們的，國民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們老百姓心裏頭所盼望要做的，國民政府的心事，就是老百姓的心事，國民政府的使命，就是要把老百姓所希望的事情，能夠實現出來。這一點盼望了解和平運動的人，多出一點力，多做一點理論，多做一點事實，不了解和平運動的人，也得要迴心轉意，大家走上這條路上去，這一回國民政府的使命，是要實現和平，實施憲政，這樣重大，所以關於國民政府的組織，我們商量了很久很久。我們現在盼望林主席早一點回到南京來，在他沒有回來以前，我們只好照着中央政治會議的決議，努力去做。關於國民政府的組織，和從前差不多的。關於行政院，各位已經看見所發表的組織的內容了，因為要容納各方面的人才，所以這一回機關，好像多一點，不過細細看去，就曉得並不是多。我們舉兩個例，一個是宣傳部，一個是社會部。社會部從前叫做民衆訓練部，關於工人農民商人學生婦女各種民衆訓練事情，現在叫做社會部。這兩個部，從前行政院沒有的，好像我們現在添了兩個機關一樣，不過大家曉得，這兩個部，從前就有的了。不過從前是放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裏頭。中央黨部第一個部是組織部，第二個部就是宣傳部，第三個部就是社會部，這兩個部，從前是放在中央黨部裏頭，現在移來放在行政院裏頭，這並不是多設這兩個機關。一方面來看宣傳是很重要的，是要全國的人民了解政

策，了解主義，是很重要的，訓練民衆也是很重要的，從前放在中央黨部裏頭，也是有道理，不過那時候，百姓已經有一點感覺不便當，譬如一個商會，因為民衆訓練的事情在黨部，商會常常要同黨部接頭，同時還要向政府接頭，大家就感覺到好像多一層隔閡，現在直接交給政府，還要便當，這是一個道理。還有一個道理就是現在國民黨打算放棄一黨專政，既然放棄一黨專政，把這宣傳部的大權，把這民衆訓練的大權，放在中央黨部裏，怎樣可以表示不是一黨專政呢？因為這樣子，我們把宣傳部，把社會部放在行政院裏頭，一方面免除兩重政府的隔閡，一方面免除一黨專政的嫌疑，這是一個例。還有一個例，就是各種委員會，僑務委員會，振務委員會，邊疆委員會，從前是有的，至於水利委員會呢，好像我們又添一個新的機關一樣，不過水利委員會的設立，不祇不是添機關，倒是省去許多機關，因為從前有導淮委員會是直屬於國民政府的，還有一個黃河委員會，也是直屬於國民政府的，還有一個廣東治河委員會，有時直屬於國民政府，有時屬於廣東省政府，還有一個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則屬於財政部。先就水利一想，已經有了四個了，導淮，黃河，廣東治河，揚子江水利。此外一時還說不盡，這樣東一個機關，西一個機關，南一個機關，北一個機關，幹什麼呢？從前我們要改革種種人事問題，解決不了，現在綜合起來設立一個水利委員會，不是添機關，是省機關。大家曉得的，現在水患很厲害，水利機關是不能不設立的。但是爲什麼不叫水利部而叫水利委員會呢？是因爲全國要治的水太多了，所以設委員會，多一點委員來共同負擔，而將來還要分派出去。不過機關是一個，不像從前那個樣子分做幾個，這又是一個例。綜合兩個例說來，表面上好像我們添了宣傳部，社會部，水利委員會，添了許多機關，實際上並沒有添，不祇沒有添，而且還省了。還有一點，我們於設立機關之後，打算機關的經費，努力使他減少，機關的事業費，努力把牠增加，就是人才我們固然要延攬，但是一切的日常經費，能夠省多少，就要省多少，不要使國家有駢枝的機

關，不要使機關之內，有浮濫的經費，這是政治上最要緊的。現在國家這樣危急，這樣困窮，地方這樣的分崩離析，人民這樣的顛沛流離，我們是不能夠有一刻可以安心的，爲這樣子大家才不顧一切的困難，來擔負這個責任。我們相信每一個國人，都是拿着廉潔勇敢的精神來替百姓服務，我們最大的希望，第一，是把全國普遍的和平實現起來；第二，是把中華民國的建設完成起來。我們要達到這重大的使命，我們只有拿着廉潔勇敢任勞任怨的精神來打破一切困難，我們打算一切的事情，如果沒有人來擔任的時候，我們都擔任起來，我們不管多少，要擔任我們就擔任，如果是好的人才，比我們好的，我們立刻退讓，請他來擔當。我們再說一遍，就是一切事情，沒有人來擔當的時候，我們挺身來擔任，我們絕不推諉。但是如果有比較我們好的人才來的時候，我們立刻退讓，我們絕沒有一點留戀。例如海軍，中國的海軍，是不堪言的，但是中國不能不注意復興海軍的，因此我們在這種破碎的時候，並建設海軍部，但是海軍部長的人選，如果一時不能確定，只好仿照各國內閣的例，由內閣總理暫時擔任，等到人選確定之後，再來讓賢與能，這不只兄弟一個人如此，兄弟敢說，我們這次出來，在國民政府服務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如此的。例如軍政部參謀本部，軍事參議院，軍事訓練部，現在擔任的人，其資格其才力都是勝任的，但是我們都願意以次或副的地位來代理。一方面表示負責，一方面表示讓賢，這是我們同人共同的心事。還有一件，現在社會生活這樣的艱難，老百姓連米都沒有得食。一切的心事，都有許多的障礙，我們一方面要替老百姓解除痛苦，一方面要和老百姓共甘苦。我老實告訴大家：在政府的人，有時公式的宴會，是免不了的，但是我們盼望除了公式的宴會，我們的宴會愈少愈好。爲着大家有機會見面，多說話，也許我們在一起食晚飯也不定，但是我們盼望愈早愈好。我們有能夠刻苦，我們才能夠廉潔，唯有廉潔，我們才能夠勇敢。不刻苦的人，不能廉潔的，不廉潔的人，不能勇敢的。我們同人時時刻刻以此自勉，以共勉。我們要有這樣精神，我們才能夠把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來達到，今天所說的話，總共分四段：第一段，國民政府還

都的使命，在實現和平實施憲政。第二段，我們盼望這和平趕快普遍於全國。第三段，說明白組織機關的理由，要有這種機關，才能夠擔任這種使命。第四段，說明白我們在服務的人應該拿廉潔勇敢任勞任怨與老百姓同甘同苦，同生同死的精神做下去，我們才能夠擔起國民政府還都的使命。

【註釋】

爲國民政府改組還都，汪先生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名義，邀請南北已成政權，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具有聲望賢智之士，在南京舉行中央政治會議。會期自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議決政府樹立大綱，中央政治委員會及華北政務委員會組織條例，決定國民政府名稱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並推定各院部人選，還都問題，全部圓滿解決。會議終了之次日，汪主席廣播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第一是把全國普遍的和平實現起來，第二是把中華民族的建設完成起來。並指示我們要拿着廉潔勇敢任勞任怨的精神來打破一切困難。

註一：汪主席和平宣言，於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刊載各報。

註二：三月十二日汪主席在上海發表和平宣言，日本政府以米內內閣總理談話形式發出聲明，響應和平宣言。原詞如下：

「矯正對立鬥爭之弊害，顯現仁愛廣被之和平，是乃我肇國精神——八紘一字之大理想，而建設東亞新秩序之理念，實亦淵源於茲；宜乎東亞諸國，各安其處；敦睦修好，彼此尊重以共赴興隆發展之途。當完成此種神聖事業之前，中日滿三國首須基於道義，創造新的關係，不待言，此種新的關係，亦應依據上述精神，遵守建設東亞新秩序之理念；曩者近衛聲明中所提倡之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其昭示於世者，已甚明顯矣。帝國與新中國中央政府所欲共同建設新秩序之具體方案，亦俱以近衛聲明爲依歸，換言之，即互相尊重國家民族之本色，提攜聲援以防止唯物赤化之侵襲；確立東亞永久和平，經濟互惠以謀長短相補，有無相通之實現也。帝國尊重中國之獨立自主，在屢次聲明中迭加表白，隨時局之鎮靜，當有事實的證明。目下中日兩國，干戈相見，然不無憫隱與寬容，存乎其間。惟戰事延長，徒增東亞之犧牲而已。雖以犧牲之大與歲月之久，而偉業之不可遽廢，又屬理之當然。於今朝野上下，俱有決心，國力計劃，益見躍進；苟容共抗日政權，不自覺悟，則無

論如何長期，亦不辭應戰。中國四萬萬人，非盡盲目；已有先覺之士倡導和平，爲拯救民衆而見義勇爲殺身成仁者矣。此皆顧念東亞大局，志同道合，更有何人不壯其志而崇其道乎？

其中尤以汪精衛氏，鑒於愛國熱忱，不忍默視重慶政府，陷人民於塗炭，任國家於赤化；於是毅然決然，分道揚鑣，和運旗幟，天下景從。新中央政府建樹工作，自客歲八月底在滬召開中國國民黨六大會以後，即迅速進展；於今準備中央政治會議，在既成政權，各黨各派以及社會名流一致擁護之下，中央政府不久即告成立；帝國得見東亞和平之曙光，洵爲欣慰；全幅援助，自不待言；即承認問題，亦既經考慮矣。此外，過去兩年餘，不辭艱辛，一意爲國計民生繼續努力之既成政權領袖，莫不與汪氏同其理念，向和平建國之途，一路邁進，此尤爲吾人所銘感者。

方今中央政府，成立在即，深盼汪氏與先知先覺之士一致協力，藉使龔亞偉業，及早完成。想「得道者多助」，庶幾此次事變可轉禍而福也。」

【要旨】

一、國府還都最大的使命，是實現和平，實施憲政。前者謀中日關係的調整及東亞和平與秩序的建設，後者要完成中華民國的建設。

二、國府還都，和平運動統一起來，是一個新的階段，相信一定能够發展，一定能够普遍。

三、國民政府的組織，和從前差不多，打算機關的經費，努力使她減少，機關的事業費，努力把牠增加，並容納各方面的人才，共同負起這個偉大的使命。

四、在機關服務的人，要拿着廉潔勇敢任勞任怨的精神，一方面替老百姓解除痛苦，一方面和老百姓共甘苦，才能够擔起國府的重大使命。

【研究】

問：國府還都的意義是什麼？

答：從前各人就各地來做和平運動，現在統一起來，實現和平的主張，大家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努力前進。

問：國府還都的重大使命是什麼？

答：●實現和平，謀中日關係的調整及東亞和平與秩序的建設，●實施憲政，要完成中華民國的建設。這兩個使

命，都很重要，可把這幾年以來百姓的痛苦，國家的危險，迅速的——解除。

問：讀了汪主席的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應有怎樣的認識？

答：明瞭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是實現和平，實施憲政。一致熱烈擁護國民政府，在汪主席領導之下，同心同德，努力去做。

第八課 和平宣言

『中日兩國無論從何方面着想，均宜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中日兩國當爲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原動力。』此爲手創中華民國孫先生之言，同胞同志，皆當共喻。不幸中日兩國關係，歷年以來，未獲調整，終至戰禍勃發，擾攘連年。前歲十一月三日，日本近衛內閣發表聲明，謂「日本所望於中國者，在能分擔東亞新秩序建設之任務。」並於廣播中申述其意旨，謂「日本之真正希望，不在中國之滅亡而在中國之興隆，不在征服中國而在與中國協力。」並謂「日本認識中國之民族的熱情，承認中國之完成其爲獨立國家，實有必要。」復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聲明，列舉所望於中國者爲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並謂日本非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不吝進而考慮交還租界，廢除中國完成其獨立所必須之治外法權。日本政府有此聲明以後，中國方面瞭然知抗戰之不必繼續，和平之必當恢復，尤瞭然知中日兩國不僅當求消弭目前之戰禍，且進而根本除去過去糾紛之原因，重新確立將來之親善關係，於是和平運動漸次普及於全國。去年八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鄭重宣佈自今以後，易抗戰建國之口號爲和平建國，並鄭重宣佈以反共爲建國之必要工作。且鑒於個人獨裁之誤國，憲政實施之不容再緩，復鄭重宣佈，務於最短期間，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使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者，得見之實行。數月以來，與日本朝野，披瀝誠意，根據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之原則，使之爲具體的實現，務期兩方交受其益。復與國內各已成政權，各已成政黨，暨賢智之士，悉心討論收拾時局之辦法，以一致之決意，爲共同之努力，由是有中央政治會議之組織，中央政府亦將緣是產生。自今以來，舉國人

民皆在此統一而有力之中央政府領導之下，對外調整邦交，對內實施憲政，掃除歷年之糾爭與戰禍，而實現和平與幸福之新天地矣。關於對內實施憲政，吾人已訂立適合時勢之政綱與政策，務於最短期間完成此使命。關於對外調整邦交，吾人所釐訂之各種具體方案，全部公開，固有所待，惟吾人敢負責爲國民保證此等方案決不軼出近衛聲明範圍之外，且決不與其原則有所抵觸，於中國之獨立生存無所危害，於第三國在中國之正當權益，不惟無所傷損，且可因中國之和平恢復而得所保障，遂其發達。且中國恢復和平之後，除與日本爲經濟提攜外，並當依據建國方略之實業計劃，容納各國之技術與資本，以求完成中國之建設，致東亞之繁榮，是則和平運動非惟中日之利，亦世界各國之利也。抑有爲國人言者，吾之和平運動，當從切近方面與遠大方面同時探討。事變以來北平故都南京新都相繼失守，天津上海青島三特別市綏遠察哈爾河北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廣東廣西十三省會以次淪陷，將士死者數百萬，人民直接間接死於亂亡者數千萬，此真宇宙之奇變，神州之浩劫，明亡以來未有之禍也。抗戰至今，兩年有半，所失據點，未聞有一處恢復，徒使子遺之人民，日卽於淪胥，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同人負咎深重，雖粉身碎骨，不足以對國家對人民。苟危亡尤有可救，則挺身任過，與日本停戰言和，接受可以忍受之條件，以保存尙未耗盡之國力，收拾敗殘，重謀興復，實爲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同人應有之責任。誠不可把持權勢，脅迫民意，日日以抗戰到底，最後勝利自欺欺人，使國土愈蹙，國力愈耗，終至於不可救藥也。此就切近方面言之也。至於遠大方面：則此次之和平運動，不徒欲消弭目前之戰爭而已，必深求戰爭之原因，解除過去之癥結，重新建立將來之正鵠，使中日兩國得向於共存共榮之大道攜手前進，中日兩國爲東亞之柱石，兩國相安，則東亞和平得所保障，而世界和平亦有以奠定其基礎。是故就切近方面言之，則救國家民族於將亡，吾人不可不忍辱負重，以從事和平運動；就遠大方面言之，則致中國及東亞於復興，吾人尤

當積極努力以從事於運動。兆銘服務於國民政府，爲中國國民黨之一人，過去心力交瘁，對於不幸之戰爭未能防止，及戰事發生以後，又未能挽回，撫躬省愆，日夕不遑，去年以來，竭其忠誠，向重慶同人致其呼籲，乃未蒙聽納，惟兆銘默察今日全國人民皆希望和平，了無疑義，所懷疑者，特和平之能否實現而已。用是不揣固陋，集合國民政府及中國國民黨同人，並聯合各已成立政權已成政黨暨賢智之士，同心協力，以担负和平運動之責任，務使全國人民所希望之和平能一一實現。茲因中央政治會議組織諮詢謀僉同，成立有期，爰以和平運動之真意及和平方案之要旨，昭告海內；自此以後，中央政府必以實心實力謀和平方案之實現以底和平運動於成功，所望全國同胞，咸喻此旨，同心同德，荷此艱鉅，並望重慶方面拋棄成見，立即停戰，共謀和平方案之實現，更能普遍而迅速。救亡復興，實基於此，血誠耿耿，惟共鑒之。

【註釋】

汪主席於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 國父逝世紀念日發表和平宣言，以爲和平運動進入組府還都實踐階段之指標，揭

示實施憲政實現和平之具體方案已與國內已成政權，各已成政黨及賢智之士，商定中央政府會議之組織，中央政府亦將緣是產生，並以和平運動真義及和平方案要旨，昭告國內。最後，仍望重慶方面拋棄成見，立即停戰，共謀和平，俾和平方案之實現，更能普遍迅速。

註一：國父於十三年十一月廿八日在日本神戶東方飯店，對神戶各團體歡迎宴會演講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說：「照中國同日本的關係說，無論講到那一方面，兩國國民都是應該要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

註二：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第五條：建設之程序分爲三期，一曰軍政時期，二曰訓政時期，三曰憲政時期。

註三：事變後北平有臨時政府之成立，南京有維新政府之成立，迨國府回都，均於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宣告解散。

註四：中國國家社會黨與中國青年黨，中華共和黨，興亞建國運動本部及大民會等。

註五：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二十八年八月三十日發表修訂中國國民黨政綱如下：

修訂中國國民黨政綱

甲、外交

- 一、本國家生存及主權獨立之主旨勵行睦隣政策以奠東亞永久和平。
- 二、聯合非共產主義之有關各國防制第三國際之陰謀。
- 三、尊重各友邦之合法權益並調整其關係增進其友誼。
- 四、本平等互惠之原則與各友邦共商通商條約之修訂。
- 五、爲謀經濟之恢復與資源之開發，歡迎各友邦資本及技術之合作。
- 六、以和平及外交方式收回租界並修訂其他有損中國主權獨立之條約取消領事裁判權。

乙、政治

- 七、召集國民大會商討建國之大計。
- 八、政府草擬憲法交國民大會審議由政府公佈實施。
- 九、除共產份子外人民之一切合法自由應予以充分保障。
- 十、本均權共治之原則釐訂地方制度。
- 十一、恢復治安撫輯流亡力謀人民之還鄉及復業。
- 十二、實行以縣爲單位擴大其行政機構充實其行政經費培植其自衛能力以安定地方推行建設。
- 十三、確定文官制度登用各方面行政人才。

丙、軍事

- 十四、軍隊國家化消滅個人及地方之系統。
- 十五、召集軍事復員會議解決軍事復員軍隊駐防及軍事建設等問題。
- 十六、撫卹傷亡擢敘功勳並遣歸被徵發有職業之壯丁助其復業。

第八課 和平宣言

七、解散游擊將士助其復業其志願服兵役者經甄別後分別編入國防軍或地方保安隊。

六、釐訂士官任用法不分派系登用各方面軍事人才。

丁、經濟

九、整理幣制安定金融儘量減少人民因幣價低落所受之損失。

二〇、釐訂銀行制度使盡其扶助農工商業之任務而不以社會金融供國家財政之犧牲。

二一、統制進出口貿易及外匯力謀輸出輸入之均衡。

二二、發展公營產業並充分保護及獎勵私營企業。

二三、流暢農村金融改良農村技術便利農產運銷以謀農村之繁榮。

二四、力謀人民負擔之平均及減輕並注意人民生活之改善。

戊、教育

二五、保持發揚民族固有之文化及道德同時儘量吸收適於國情之外國文化。

二六、剷除狹隘之排外思想貫徹睦鄰政策之精神。

二七、勵行紀律訓練及科學研究以養成健全公民及建國人才。

二八、改訂教育制度重編教材以適應新中國建設。

【要旨】

一、汪主席領導的和平運動，漸次普及全國，已與國內各已成政權，各已成政黨賢智之士，決定收拾時局的辦法；組織中央政治會議，產生中央政府。從此全國人民在統一而有力的中央政府領導之下，對外調整邦交，對內實施憲政，掃除歷年之糾紛與戰禍，而實現和平與幸福之新天地。

二、和平運動，非惟中國之利，亦世界各國之利。

三、就切近方面說，和平運動，救國家民族於將亡，就遠大方面，和平運動致中日及東亞於復興，都是我們應當

積極努力的目標。

四、中央政府以實心實力謀和平方案之實現，以底和平運動於成功，希望重慶方面拋棄成見，立即停戰，共謀和

【研究】

平，俾和平方案之實現，更能普遍而迅速。

問：和平運動的真義是什麼？

答：消弭中日戰爭，保存中國的國力，重謀復興，與友邦日本向共存共榮的大道攜手前進，確保東亞和平，而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礎。

問：和平方案的要旨是什麼？

答：根據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之原則，保存中國之獨立生存，無傷於第三國在中國之正當權益，可救

問：讀了汪主席的和平宣言，應有怎樣的認識？

答：明瞭國府還都，是統一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實心實力，謀和平方案之實現以底和平運動於成功，全國同胞，要擁護國民政府，擁護汪主席，同心協力，盡國民的責任。

第九課 和平運動之前途

二十九年這一年，無疑的是和平運動由開始而達於成功。前幾日我在豔電書後中，已經有所說明了，如今再說幾句話，加以引申，作為二十九年獻歲發新的頌辭。

或者有人會問我道：「和平運動的意義，我們已經知道了，但是我們的實力如何呢？如果我們沒有實力，如何能擔負和平運動呢？」這種問法，我是很高興解答的。因為「不量力」，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我們最應該時刻提心吊膽，不可忘却「量力」兩個字，方纔能夠立國於東亞，立國於世界。

我對於所謂實力，想分析為兩部份：第一是軍事力量，第二是經濟力量。如今先說軍事力量。

如果說我們的軍事力量，夠不上和平運動。那麼，夠得上抗戰嗎？這真所謂不值一駁的。在蘆溝橋事變以前，我們如果知道力量，則應該誠意的努力調整中日關係，並且把軍事方針確定於防共這一點，那麼，我們的軍事力量可以保存而且可以發達。即在蘆溝橋事變以後，我們如果知道力量，在德國出來斡旋的時候，誠意的努力的謀和平之實現，那麼，軍事力量還不至過於消耗。即在近衛聲明以後，我們如果知道力量，誠意的努力的以謀實現全面的和，那麼，軍事力量，雖然消耗，也還可以想法子來恢復。可是一誤再誤，以至於今。連所謂全面的和也在不可知之數了，軍事力量，這樣的消耗下去，只怕恢復無期了。然而沒有軍事力量，就不能做和平運動，也未必然的。普法之戰，法國的軍事力量，已經被普國擊破，為什麼法國還能恢復和平？上次歐洲大戰，德國的軍事力量，在停戰時候，幾乎可以說是全被繳械，為什麼德國還能恢復和平？天下祇有相類的事，沒有相同的事，我不是以法德例中國，我也不想中國蹈法德循環

報復的覆轍。但是我想說明，一個國家，在軍事力量不幸而被擊破之後，這個國家還有一種力量，可以存在，這一種力量是什麼？是民族意識。普法之戰，法國軍事力量，被擊破了，然而民族意識，仍然存在，所以於割地賠款之後，仍能保有法國，上次歐洲大戰，德國軍事力量被擊破了，然而民族意識，仍然存在，所以於割地賠款之外，再加以種種不平等束縛，仍能保有德國。至於中國民族意識的存在，已經數千多年，尤其數十年來，特別發達，不但我們自己知道，便是日本也知道的。不過我們對於民族意識的力量要估計清楚，我們不可妄自菲薄，以立國纔二十多年的捷克斯拉夫爲比，我們尤不可妄自期許，以爲只憑民族意識，便能得到最後勝利。我們要於估計清楚民意識力量之後，隨時隨地而善用之，用之於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用之於分担東亞永久和平的責任。這是我們所能做的，也是我們所應做的。我們必須明瞭所謂軍事力量是什麼，除了專門的軍事學識和技能之外，一切物質都是取給於人民的，一切精神，也都是由民族意識而來的。卽所謂專門的軍事學識和技能，也莫非是由人民培養而成，決不是如小說書所謂，一位金甲神，從天下降，所以軍事力量不能包括民族意識，而民族意識，却可以包括軍事力量，可憐的中國人，幾十年來，前誤於軍閥，後誤於個人獨裁，把軍事力量，看得如同下降金甲神一樣。於是，開口實力，閉口實力，把實力與軍事力量看成一物。從前以爲沒有軍事力量，不能抗戰，如今以爲沒有軍事力量，不能講和，這不是把軍事力量看得太重，却是把民族意識的力量看得太輕了。自然，我們將來還是要建軍，還是要鞏固國防，還是要綏靖地方，保衛人民，我們並沒有一刻忘記軍事力量。不過我們只要說明，決不是有了軍事力量，纔可以做和平運動。

如今再說經濟力量。

說到經濟力量，日本是先進國家，最近已駸駸然進於重工業發達的階段，中國是經濟落後國家，重工

業還沒有萌芽，輕工業剛剛開始，還在幼稚時代，便遭着摧殘了，甚至號爲以農立國，而糧食一項，無論米麥，都不能自給自足，因此有許多人，對於中日經濟提攜，抱着絕對的悲觀！以爲兩個幼稚的國家，可以說提攜，兩個強盛國家，也可以說提攜，一個幼稚國家和一個強盛國家，却如何可以說提攜呢？這不是狼與羊提攜一樣嗎？這種論調，在戰前已經普遍，在戰後尤其深刻，以爲中國已經是一個落後國家了，如今再加上一個戰敗國家，所謂經濟提攜，還堪問嗎？無論如何，都是合作其名，獨佔其實，這是勢所必至無可逃避的。這種絕對的悲觀論調，浸淫起來，便成了以下的判斷：中國和歐美講提攜，還可，和日本講提攜絕對不可。因爲歐美離中國遠，來的人不多，來的貨色也不多，所以中國還可以在歐美指縫裏過生活，日本離中國近，來的人多，來的貨色，各樣齊全，精粗美惡，應有盡有，所以中國人休想日本人手下留情，除了做苦力外，只有做叫化子了。總而言之，中國和歐美講提攜，歐美人嚼牛肉排，中國人還可以吃鹹菜飯，中國和日本提攜，日本人吃「沙斯美」，中國人連湯也沒得喝了。由於這種別斷，便只能有以下的兩個希望：其一，日本火山爆發了，其二，歐美合起夥來將日本打倒。但這兩個希望，不是等於望天打卦嗎？根本就不會成立的。至於枝節呢，幾十年來，中國往往發生抵制日貨的事情，這固然由於政治的理由，然而在經濟的理由看來，却成了一種變相的保護政策。因爲一方面正堂堂的以政治的理由來抵制日貨，一方面却正好偷偷摸摸的，以經濟的理由來提倡國貨，於是許多國貨在抵制日貨的環境之下，便應時而興了。但這是好辦法嗎？恐怕無論何人，都不會承認爲好辦法的。十年以前，我曾經在香港一間客棧裏住過，和茶房談談天，我問他道：「近來生意好嗎？」他嘆口氣道：「噯！廣東沒有亂，這裏生意怎樣好呢？」我聽了真是哭笑不得，靠抵制日貨來提倡國貨，可不是和這種見識一樣？不用說根本，連枝節也不應該這樣的啊！然則中日經濟提攜，真個的是這樣絕對的悲觀嗎？如果是的，和平運動自然無從做起。

但是我的看法，却不是如此絕對的悲觀。我以為日本對於中國，本來有兩條路：一條在軍事上謀征服，在經濟上謀獨佔。那麼，那是以中國為殖民地，第一期，榨取原料，銷售商品，同時並行，第二期，中國人的購買力盡了，無所謂銷售商品了，就只有於榨取原料之外，更榨取其勞力，使中國人以苦力始以叫化終了。這條路行得通嗎？行不通的。強行起來，必然遇着中國民族意識之激烈反抗。民族意識不是槍砲所能擊破的，其結果必致徒勞而無功。所以這一條路，是斷斷乎行不通的。另一條路呢，便是近衛聲明所謂按照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了。這條路行得通嗎？行得通的。上頭說過，中國號為以農立國，而糧食一項，無論米麥，都不能自給自足，這不是中國地理之咎，而是人工之咎。如果以人工發達地利，使之科學化，現代化，則中國的農業，不但能充分的自給自足，並且能充分的供給日本之需求。如棉花，如羊毛皆是。這些在農業知識上，已有定論，用不着多說。至於輕工業呢，中國在戰後，必須從事恢復，這是不待言的。那麼會和日本的銷商品發生衝突不會呢？普通看來，似乎必然衝突，不是日本商品布滿了中國市場，使中國的工業製造品，無從銷售，因之，工業無從發達，便是中國的工業製造品，將日本商品，從中國市場，驅逐出去。方纔所說絕對的悲觀論，即是從此出發的。但是中日兩國，難道不能適用有無相通長短相補的原則嗎？難道不能分別部門，以各顯所長嗎？難道不能於同一部門之中分別精製品，粗製品，以各盡其所能嗎？難道不能於同一部門，同一質量之中，更從事於數量的分配，以使之各如其量嗎？那見得就這樣絕對的悲觀呢？中國的民族資本，本來有限，如有限的資本，來經營工業，勢必至因分散而薄弱，對外不能競爭，而且資本愈少，則歸本及贏利之心愈急，內部因此亦時時發生破裂。這實在是幾年來中國工業不振之最大原因。如果認定幾個部門，集中力量，從事經營，對外既不至因重複而惹起衝突，而內部亦不致左支右絀，使事業中途停頓。有許多人恐懼日本貨品的廉價，以為必然獨佔市場，殊不

知中國若能用避免重複的辦法，對於自己所經營的部門，專心致力，則對於所放任的部門，正可利用日本貨品的廉價，減輕買價的負擔，而增加購買力，增加消費力，則豈不是較好的辦法嗎？不特此也，即使同一部門，也可從質量上數量上，想出平均發展的辦法的。舉一個例來說，二十六年的上半年日本在中國所辦的紗廠，以及中國自辦的紗廠，都獲厚利，其原因在什麼？在於二十五年之豐收，中國農民得到豐收，過年的時候，替自己或替子女買一塊布，各紗廠就覺得銷路大暢了。說起來，真傷心，中國號爲以農立國，號爲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農民，但是農民所過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嗎？不用說別的，衣不蔽體的现象，鄉村間觸目皆是。自然在上海跳舞場的人們，是不會看見的，可知道陝甘一帶有些十七八歲的姑娘們，因爲衣不蔽體，見了人就躲在土坑內啊！如果政治能修明，共匪能肅清，一切不必要的政費軍費能減少，則政府可以拿出大批的錢來，從事於農業之改良發達與輕工業之恢復，那麼一般農民收入自然增加了，購買力自然也因之增加了，照現時的紗廠，再添十倍，乃至數十倍，也不怕沒有銷路。那裏見得便衝突呢？「不患寡而不患不均，」這是一偏之見，均不均是分配問題，寡不寡是生產問題。生產則欲其多，分配則欲其均，纔是正理。中國今日可謂寡到極處了，提高人民的生力，即是提高人民的購買力，即是提高人民的消費力，商品不愁不暢銷，市場不愁不推廣的。絕對的悲觀論者，請放心罷。以上所說，農業輕工業是如此。重工業在發達程序上自然較後，但是中國如果要興辦重工業，如鋼鐵廠等等，則歡迎投資，歡迎技術人才，是必然的。因之經濟提攜，也是必然的。所以絕對的悲觀論者，以爲經濟上若沒有同等的力量，則不能提攜，這話是沒有根據的，此於和平運動，關係極大，明白了經濟提攜之可能性與必要性，便可明白和平運動之可能性與必要性了。

以上所說，是「量力」不是「不量力」。我們不但應該擔任和平運動，我們並且能夠擔任和平運動以

努力於具體的和平條件之獲得，並努力於實現。未了，還有幾句話，日本輿論，大體上都盼望中國能有愛國者出來擔任和平運動，這是重視中國民族意識的表示，我們十分感謝。但是還有一小部份責備中國，不應只知愛國，應知興亞尤大於建國。我想答覆道，日本人如不愛日本能愛東亞麼？然則中國人如不愛中國，又安能愛東亞？至於中國人呢，應該記着孟子所說，不要「自暴自棄」，尤應該記着韓文公所說，不要成爲一個「怠者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的人。那麼，於創鉅痛深之後，同心協力，必能將建國興亞兩重責任。擔負起來。

【註釋】

二十九年元旦汪主席廣播演講，就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兩個問題，加以討論，指出我們不但應該擔任和平運動，並且能够擔任和平運動以努力於具體的和平條件之獲得，並努力於實現。

註一：捷克斯拉夫爲歐戰後新興共和國。

註二：日本人吃的生魚片，譯音沙斯美。

註三：韓愈，唐鄧州南陽人，字退之，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在朝鯁直無所忌，德宗時上疏極論官市，憲宗時諫迎佛骨，皆坐貶，在外有惠政，爲潮州刺史，民尤德之，卒諡曰文。

【要旨】

一、軍事力量與民族意識並重。和平運動注意軍事力量，所以要建軍，鞏固國防，綏靖地方，保衛人民；同時，又要善用民族意識，用之於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及分担東亞永久和平的責任。

二、我國的經濟力量，雖很薄弱，如果與先進國日本實行經濟提攜，農業可以改良發達，輕工業可以恢復，進而興辦重工業，達到繁榮的目的。

三、指出無底抗戰，是消耗軍事力量，永遠不能恢復。並研究幾十年來中國農工業不振的最大原因，確信和平運動是救中國的復興中國的。

四、我們不但應該擔任和平運動，並且能够擔任和平運動以努力於具體的和平條件之獲得，並努力於實現。希望大家不要自暴自棄，同心協力，負起建國興亞的兩重責任。

【研究】

問：軍事力量與民族意識的關係如何？

答：軍事力量，除了專門的軍事學識和技術之外，一切物質都是取給於人民的，一切精神也都是由民族意識而來的，即所謂專門的軍事學識和技能，也莫非是由人民培養而成。所以，軍事力量，不能包括民族意識，而民族意識，却可以包括軍事力量。

問：我國工業不振的最大原因是什麼？

答：我國的民族資本，本來有限，以有限的資本，來經營各種工業，勢必至因分散而薄弱，對外不能競爭，而且資本愈少，則歸本及贏利之心愈急，內部因此亦時時發生破裂。這是幾十年來我國工業不振的最大原因。

問：讀了汪主席的和平運動之前途，應有怎樣的認識？

答：汪主席昭示我們，和平運動正由開始而到達於成功，就軍事力量與經濟力量兩個問題來研究，都證明和平運動之可能性與必要性。我們要熱烈擁護和平運動，在最高領袖汪主席領導之下，同心協力，實現東亞永久的和平。

第十課 怎樣實現和平

各位同胞：如今我在廣州向你們廣播，眼睛裏雖然看不見你們，心神早已和你們在一起的，如今身體也和你們在一起了，說不出的感動，說不出的興奮！

七月九日我曾廣播一次，題目是「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當時沒有將廣播地點說出來，有些自命高調的人，說我定然淪陷了的地方失了自由了。我如今告訴各位，我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和平建議之後，沒有離開河內一步，我當時實在盼望蔣介石肯替國家民族着想，接收我的建議。等了幾個月，知道盼望是徒然的，可是國家民族不能不救，於是開始奔走。當奔走的時候，我沒有通知藍衣社的義務，自然只好把行蹤秘密起來，不但當時如此，以後如有必要也是如此。如今我第一句要問的：我爲什麼不可以走到淪陷的地方？須知道在戰時一個人所能站着的地方，不外以下幾種：一是前方，一是後方，一是淪陷了地方，一是外國。可是中國人呢，却多了兩種：一是租界，如上海，天津等；一是外國的殖民地，如河內，香港等。我並沒有鄙夷住在這兩種地方的人，我以為只要看他的目的和他的言論行動。如果他的目的和他的言論行動，時時刻刻是替前方後方及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着想，時時刻刻想去解救，那麼他的努力，毫無分別。如果他以爲現在托庇在外國帝國主義努力之下，站在風涼地方來說風涼話，我自然鄙夷他。

在前方後方的民衆心事是怎樣的呢？如果和平沒有希望，同歸於盡，無可說的；如果和平有了希望，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爲什麼不可以講和平？然而在蔣介石及共產黨壓迫之下，「講和平的

是漢奸」，這些民衆，只有在壓迫之下，一聲不響，由他擺佈，至死爲止。我們想到這裏，只有用盡方法，把這些前方後方的民衆解放出來。

至於在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呢？他們的心神，與前方後方的民衆，是不可分的，不但心神如此，身體也是如此，所謂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如果和平沒有希望，同歸於盡，無可說的；如果和平有了希望，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他們當然講和平，並且熱烈的追求着怎樣實現和平。

就廣州來說，在去年十月以前，民衆所聽到的是當局叫人民安心，日本軍隊斷斷不能來到，直至十月初旬，還是如此說。及至日本軍隊將要來到了，當局帶領軍隊先走，將民衆丟下，而臨走的時候，還要放一把火，把居民商店燒個精光，這是廣州民衆在前方後方地位的時候所身受的。至於丟剩了燒剩了的，在當局看來，只有恨他死不盡，燒不光，還不斷地唆使土匪，用游擊的名義來繼續焚燒搶掠的工作；這是廣州民衆處在淪陷地位的時候所身受的。當局爲什麼如此呢？是奉蔣介石的命令。蔣介石爲什麼如此呢？是奉共產黨的教條。試問這些犧牲有得到一點代價沒有？當初燒的時候，日本軍隊不會因此不來；燒了之後，日本軍隊來了也不會因此站不住。試問這一場燒，除了燒死人民，燒絕了人民生命所寄託的財產，還有什麼其他意義！廣州燒了還不算，武漢臨去的時候，也照樣的一道命令要燒個精光。因爲奉令的人於心不忍，燒得不甚徹底，因此索性長沙於未丟以前，就澈底的燒個精光了！未來的重慶成都，也是如此。而且除了這樣的大燒特燒之外，還要帶着游擊隊零零碎碎的燒，要使全國都變成瓦礫，變成灰燼。如果和平沒有希望，同歸於盡，無可說的，如果和平有了希望，而且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爲什麼要把民衆趕上了死絕的路上去！這些呼聲，在前方後方的民衆被箝着口發不出來；可是在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却已發出來了。我爲什麼要走到淪陷了的地方來？我是爲這種呼聲所召喚，我是將這種呼聲與前方

後方被箝着口發不出來的呼聲連結在一起！

我第二句要問的是：爲什麼我走到淪陷了的地方便會失了自由？無論在日本方面，並沒有侵奪我的自由，我既然下了決心，走到這地方來，難道連「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道理也不懂得？我只會死，絕不會失去自由。不但此也，我時時刻刻準備着以我的生命，換取同胞的生命，以我的自由，換取同胞的自由。

以上兩句要問的已問完了；如今所要說的是怎樣實現和平。這似乎很繁複，其實很簡單。只要蔣介石看得國家民族比他個人重要些，遵守孫先生大亞洲主義的遺教，接受日本關於和平的聲明，那麼全國停戰，立即可以實現，跟着和平談判，就可開始。在和平談判中商量各種問題，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等，都根據原則以謀具體條件之折衷至當；於是全國所渴想的撤兵，必可以做到。試問這樣，豈不是一件極簡單的事？

但是蔣介石，既然看得他個人的利益大於國家民族的利益，甯可將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獻給受第三國際指揮的共產黨，以爲西安事變替他個人救苦救難之酬勞品。明明白白和平有了希望，而且這和平明明白白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他偏要悍然不顧的加以反對。這樣一來，和平的實現，便遇着極大的阻礙了。

然而要除去這極大的阻礙也有方法，而且這方法並不繁複，實在簡單得很。只要在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隊的人，明白了和平有了希望，而且這和平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破除了蔣介石的欺騙宣傳，擺脫了蔣介石的箝制力量；第一步公開的贊成和平，在自己力量所及之地，肅清共產黨的一切陰謀罪惡，保衛地方的治安，保衛人民生命自由財產的安全；第二步將贊成和平的聯合起來，公開的要求蔣介

石以國家民族爲重，不再做和平的阻礙。這樣和平的實現，在短期間內，必然普遍全國。由和平實現而得回獨立自由，由得回獨立自由而奠定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基礎。復興中國，復興東亞，必由於此。

或者有人會提出疑問道：假使我們有這樣的表示，而日本軍隊仍然進攻，那麼，不但和平會成泡影，而且徒然懈怠了軍心，散亂了人心，豈不爲害甚大呢？我如今鄭重的明白的答覆道：如果在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隊的人，能有贊成和平的表示，反共的表示，則日本軍隊必不會進攻。因爲日本政府，已有聲明在前，盼望中國同憂具眼之士出而收拾時局，以復興中國，以進而分擔復興東亞的責任，因此，日本軍隊，決不會向着我們和平反共的地方及軍隊進攻的。現在我在廣州與安藤最高指揮官會晤，關於怎樣實現和平，彼此互相披瀝誠意，其結果使我確信，如果廣東方面的軍隊，有和平反共的表示，安藤最高指揮官，必能以極友好的考慮實現以下幾件事，即是：不僅對於這種軍隊立刻停止攻擊，而且更進一步將日本軍隊已經佔據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備，以及行政經濟，都從日本軍隊手裏，次第交還中國。因此今日我敢公開約束：如果廣東方面的行政當局和軍隊，能贊成我的和平主張，則我必能得安藤最高指揮官的同意，先在廣東做起部分的停戰，而以次及於全國，使全國和平得以完全恢復。尤其是對於廣州市民，我敢說在最短期間，必能以廣州市還之廣州市民之手，使廣州市成爲比較去年十月以前更有秩序，更有幸福的地方。

各位同胞，聽到了我這篇廣播之後，可以知道我所謂和平可以實現，而且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不是一種空想，而是早晚可以證明的事實。各位同胞，你們不是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啊！你們從前曾經盡了前方後方的責任，忍受許多的痛苦，許多的犧牲，及至蔣介石將你們丟了之後，還要加你們以種種惡名，恨你們死不盡，燒不光，加你們以種種惡名，好將你們繼續的燒，繼續的送往死路。蔣介石

不是以日本爲敵，是以中華民國爲敵，是以中華民國的民衆爲敵！蔣介石在今日已爲和平之唯一阻礙者，你們只有將阻礙除去，你們必然能洗却了種種惡名，而重新做中國復興之柱石，進而做東亞復興之柱石。各位同胞：我知道我廣播了這一篇談話之後，蔣介石必然又逼迫各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隊的人發出聯名通電來攻擊我，但我知道這是無效的。只要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而且可以爲復興之基礎，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能阻礙和平之實現！

【註釋】

二十八年八月九日，汪主席廣州廣播，爲從事和平運動實際工作之開始，具體的表示實現和平之方法，並宣示可由局部之停戰做起而以次及於全國，使全國和平，得以完全恢復。

註一：藍衣社爲蔣介石私人的祕密組織，專做情報工作及暗殺行動，以保持個人地位排斥異己爲目的。

註二：民國十三年冬，國父北上，道經日本，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高等女學校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演講大亞洲主義，主張以王道爲基礎，亞洲全部的民族親密的聯絡起來，脫離歐洲人之束縛，並明白指出中國與日本，是這種行動的原動力。

【要旨】

一、努力救國救民的運動，無論在什麼地域，毫無分別。淪陷了地方的民衆，與前方後方的民衆，是不可分的；都熱烈地追求着怎樣實現和平，汪主席要用盡方法，去解放他們。

二、實現和平是很簡單的一件事。只要遵守國父大亞洲主義的遺教，接受日方近衛聲明，就可停止戰爭，開始和平談判，解決各種問題。

三、和平的最大障礙，是蔣介石以個人的利益爲重，不惜將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獻給受第三國際指揮的共產黨，以爲西安事變替他個人救苦救難的酬勞品，因此他知知和平可以救國，偏要阻撓和平。除去這最大障礙，也有很簡單的辦法，只要大家破除蔣介石的欺騙宣傳，擺脫蔣介石的箝制力量，努力肅清共產黨的陰謀罪惡，從局部和平而促進全面和平，完成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使命。

四、揭發蔣介石陷害民衆的罪惡；他不是以日本爲敵，是以中華民國爲敵，是以中華民國的民衆爲敵。民衆應該

【研究】

一致起來，除去這和平運動之唯一阻礙者，做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柱石。

問：和平運動的實際工作，怎樣開始的？

答：汪主席發表豔電後，盼望渝方接受建議。等了幾個月，知道蔣介石執迷不悟，並且阻撓和平，爲了貫徹救國家救民族的主張起見，於是開始奔走和平，想從局部停戰做起，然後普遍全國。

問：汪主席指示我們實現和平的辦法，在事實上做得到麼？

答：一定可以做到，例如汪主席在本文裏所指示的：「更進一步將日本軍隊已經佔據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備，以及行政經濟，都從日本軍隊手裏，次第交還中國」，現在國府還都以後，在江南區域，實行清鄉，已經完全做到了。我們信仰汪主席的救國主義，在汪主席領導之下，努力於和平反共建國的運動，一定獲得成功，汪主席說：「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能阻礙和平之實現！」這話真是不錯。

問：讀了汪主席的怎樣實現和平，應有怎樣的認識？

答：應該認識汪主席是我們民衆的唯一救星。汪主席說，「我時時刻刻準備着以我的生命，換取同胞的生命，以我的自由換取同胞的自由。」這句話何等懇切，何等透澈，凡有天良的人無不感動，欽佩，汪主席是我們的最高領袖，我們要竭誠擁護汪主席，團結一致，共同努力，達到實現和平的目的。

第十一課 促進全面和平完成時代使命

各位同胞：兄弟在這三年中，每年都來廣州一次。在前年八月，差不多這時候曾經得日本軍當局的同意，公開宣佈，如果前方將士能有傾向和平的表示，日本軍隊必然與之締結局部的停戰協定，先做到局部的和平，進而擴展到全面的和平。這種宣布，當然是共匪及準共匪所不願聞的。不多幾日，沈次高同志便在香港被這班匪徒所暗算了。沈次高同志的死，固然給我們同志心上一條不可回復的傷痕，然而和平運動不但不因此而有所摧折，反益以激昂進步。第二次在去年四月，那時候國民政府已經還都南京了，廣東省政府便在這一次來廣州的時候，經過鄭重的商議，開始成立，開始工作。如今第三次來，相隔一年有多了，兄弟自從下了飛機之後，一路看見幾萬的民衆，這是多年沒有看見的同胞，這是多年在顛沛流離中的同胞，這是多年身受痛苦心念着國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同胞；我看見了許多青年學生，許多農工商界的代表，真使我不知道是歡喜是悲痛，無論如何，總是前兩次所未見到的，如今見到了。

還有一層，我同時看見許多日本的小學生成羣結隊的手拿着日本國旗和中國小學生手拿着中國國旗互相飄蕩，這樣的青年，這樣的朝氣，這樣的相親相善，令人對於中日提攜共興東亞的前途發生了無限的希望，這也是前兩次所未見到的。自從廣東省政府成立以來，一年的工夫，各種行政都有了進步，我在今年五月廣東省政府舉行週年紀念的時候，發來一個電報，所說的話，都是事實。這種進步，由於友邦陸海外各當局的大力援助，由於廣東省政府同人努力不斷，由於廣東各界民衆的同心戮力，這種進步，證明了中日提攜共興東亞不但在理論上是絕對正當的，在實際上也絕對可以接着步驟以期其實現的。全國同胞人

人都知道如果重慶方面，不再作和平障礙，則全面和平實現之後，中日兩國更加可以將其心力物力用在共與東亞的上面，然即使全面和平還未能實現，而由於中日雙方的協力，仍然可以使和平領域逐漸堅實，逐漸擴大，使和平障礙逐漸消除，使全面和平終於實現，終於完成復興東亞的使命。我盼望廣東省政府同人及各界民衆，本於這一年來的經驗，更加努力。現在最要緊的無過於確立治安，如今和平領域內仍然有不少的土匪潛伏着，把持稅收，此種行爲，妨害地方行政，妨害民衆的安居樂業，這種土匪必然的要於最短期間使之肅清，然後和平領域纔能得到保障，這一塊地方得到了堅實的保障，然後展拓起來及於第二塊地方，這樣的逐漸擴大及於全省及於全國！廣東省的治安確立，用這個方法，全國的治安確立也是用這個方法。

講到物質，現在仍然是艱難的，但比較重慶方面痛苦程度已差得多了。現在是全世界戰爭的時代，近百年來科學發明，使用物質的技能，不是百年前所能想像，而物質的消耗，也不是百年前所能想像，戰爭科學化，物質的消耗數量之大，一場戰爭，較百年以前的數十場戰爭還多過數十倍，所以戰爭越延長，物質的消耗越多，因而物質補充的要求也越加迫切。所謂長期戰，總力戰，其最大的意義還是怎樣的加增物質的生產，以及怎樣的節省物質的消費，使所有的物質能用於最有效的方面，以保衛國家。我們生在這個時代，惟有以個人的刻苦節約所得，貢獻於國家，這是我們對於國家不能不盡的義務。末了扼要一句話，中日提攜，共興東亞，是我們今日唯一出路，但是這條出路是有多少的障礙橫在前頭，我們還要經歷過許多艱難。廣東是國父孫先生的故鄉，是革命的發祥地，數十年來對於革命是有一種朝氣，一種蓬蓬勃勃的朝氣，仗着這種朝氣，打破了重重障礙，克服了重重困難，方纔誕生中華民國，方纔於風雨飄搖之中，一直的撐持以至於今日。現在和平反共建國的大路已經展開在面前了，需要我們鼓起朝氣一直前進，中國

若不能得到自由獨立，必不能分擔東亞的責任，而中國自由獨立之完全獲得，必有待東亞解放之成功，這是不不可動搖的真理，鐵一般的事實。我謹以此意祝我伯叔兄弟諸姑姊妹的健康，並祝我伯叔兄弟諸姑姊妹一同鼓起朝氣勇往直前，完成此時代的使命。

【註釋】 強化國府實現後，和平運動的力量，與日俱增。汪主席於八月初，巡視粵省，於六日在廣州廣播促進全面和平，完成時代使命，指出中日提攜，共興東亞，爲我們今日唯一出路。大家鼓起朝氣，一定可以促進全面和平，完成時代的使命。

註一：廣東省政府成立一週年，汪主席致電嘉勉，原電如下：

「廣東省政府陳主席暨各委員各廳長同鑒：自去歲五月，廣東省政府成立以來，諸同人勵精圖治，接任之始，首在開源節流，共謀財政之整理，其時收入，月祇六十餘萬，今已增至四五〇餘萬，去歲五六七月，中央體念財政整理，尙須時日，每月發給補助，迨至八月，即已呈請停發，十一月并已有款遞解至中央，足徵財政基礎，漸臻鞏固。而民政，教育，建設，治安諸端，亦次第展布。粵省產米，事變以前；即不能自給，事變以後，匱缺尤鉅。幸諸同人妥籌辦法，民食不致恐慌，食鹽供給數量亦已逐漸增巨。賭博爲粵省巨患，今已禁絕，雖每月失去數十萬之收入，亦不之顧。凡此舉舉諸端，固賴友軍遇事協力，始得以着着進行，而諸同人不避艱苦，同心匡濟，實無負中央付託之重。今當舉行省政府成立一週紀念之際，遙企賢勞，良深嘉慰。所願益加奮勉，力扶顛危，俾全省秩序，早得安定，全面和平，早得實現，南天翹首，不盡欲言，行政院長汪兆銘歌。」

註二：國父是廣東中山縣翠亨村人，故廣東是國父的故鄉。

註三：朝氣，謂凡事有振作之氣也。

【要旨】 一、這次到廣東所見的可喜的現象，是從前所未見到的，可證和平運動在突飛猛晉，令人對於中日提攜共興東亞的前途，發生了無限的希望。

二、從廣東省政的進步，證明中日提攜共興東亞的理論絕對正確，可以按着步驟的實現起來，只要中日雙方協

第十一課 促進全面和平完成時代使命

力，將和平領域逐漸堅實，逐漸擴大，一定能掃除障礙，促進全面和平，完成東亞的使命。

三、和平運動最要緊的工作是確立治安，確立治安的方法，先從一塊地方做起，然後拓展到第二塊地方，逐漸擴大及於全省全國。

四、中日提攜共與東亞，是我們今日唯一出路，前面有着許多障礙，我們要鼓起朝氣，一直前進，打破重重障礙，克服重重困難，才能獲得中國自由獨立與東亞解放。

【研究】

問：怎樣可以促進全面和平？

答：中日雙方協力，使和平領域逐漸堅實，逐漸擴大，和平障礙逐漸消除，全面和平便可以實現了。

問：時代的使命是什麼？

答：中日提攜，共與東亞。

問：讀了汪主席的促進全面和平，完成時代使命，應有怎樣的認識？

答：明瞭全面和平雖有重慶方面做障礙，一時還不能實現，只要中日雙方的協力，可使和平領域逐漸鞏固擴大，和平障礙逐漸消除肅清，全面和平終於實現，終於完成復興東亞的使命。我們要遵照汪主席的昭示，一同鼓起朝氣，勇往直前，在和平反共建國的大路上走，完成時代的使命。

第十二課 反共與民食

每逢總理孫先生逝世紀念日，想起「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訓，格外傷感，格外興奮，如今單就反共與民食，尋譯遺教說幾句話。

三民主義是孫先生最後的著作，依着順序，民生主義尤爲最後，十三年十一月北上以前，方纔定稿。民生主義裏對於馬克思主義，反覆辨正，不厭其詳，這是對於馬克思黨徒的耳提面命，「照馬克思的黨徒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是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這是何等深切著明。

孫先生爲甚麼這樣反對用劇烈辦法呢？因爲孫先生生平主張以東方道德精神與西方物質開化，融洽爲一，所以提倡「博愛」，提倡「和平奮鬥救中國」，提倡「大同」，對於政治經濟的改進，都儘可能的策用和平辦法，決不願以劇烈辦法，使之多所損傷。至于馬克思黨徒，則正與之相反，率其殘忍之性，對於一切事物，都以破壞爲快，所以劇烈辦法，正所謂習與性成。在十二年間，孫先生已看破馬克思黨徒的心術了，所以不憚諄諄的提撕警覺，及至孫先生于十四年逝世了後，那一般馬克思黨徒獍狺面目，已漸暴露，至十六年之後，便老老實實成爲共匪，連馬克思黨徒的名稱也用不着了。因爲他們已經連馬克思的學說也完全丟掉，而成爲黃巢，李自成，張獻忠的繼承者了。從此之後，劇烈辦法，越演越兇，江西及各處經過共匪的地方，所謂人坑，直至今日，纍纍尙在。中國本是一個貧窮的國家，劇烈辦理沒得用之于富豪階級，只得用之于一般平民，沒得用之于奢侈品，只得用之于一般人所必要的糧食，于是共匪遂成

爲民食最大仇敵。

建國之首要在民生，民生之首要在民食，所以民生主義第一第二兩講，說明原理原則之後，第三講關於具體事項，首先就是民食問題。「現在我們講民生主義，就是要四萬萬人都有的飯吃，並且要有很便宜的飯吃」。在今日吃貴米餓肚子的時候，想起這幾句遺教，格外難過。

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以後，受到外來經濟的壓迫。米的生產，日日減少，民生主義裏已經指示無遺。倘使中國得到和平環境，遵照遺教，解放農民，並實行七個加增生產的方法，那麼民食問題自然可以解決。不幸數年以來，遇到這樣空前的戰爭，隨着戰事狀態，直接間接都可以造成米貴的原因。更不幸在戰事中，夾雜共匪在裏頭，其所用「劇烈辦法」是唯恐國力不摧殘，民力不消耗。焦土戰的結果，使農村成爲赤地，農田成爲荒野，農具成爲灰燼，米的生產只有更加減少。游擊戰的結果，使交通阻塞，無從運輸，生產地與消費地沒有調劑的可能，生產的農民與都市的消費者，兩受其害。再加上農民辛苦耕作得來的米，本來想換取貨幣或其他物品的，半途碰着游擊隊，一撈一個精光，不但過去耕作的勤勞是白費了，連將來耕作的資本也無着了。如此種種，米安得不一天一天的貴起來呢？我去年曾有一段演講，將共匪譬喻做蝗蟲，是確切不過的。誰將蝗蟲散布于全國境內呢？是重慶當局，數年以來，重慶當局散布蝗蟲政策，已成了能發不能收的局面了，最近新四軍的決裂，原是無可避免的，然而重慶當局還想苟且彌縫下去，這是能發不能收的十足證據。

除了蝗蟲政策之外，濫發紙幣至一百一十萬萬元，較之戰前增加七倍，對外匯率，則減低百分之六，因之洋米價格飛漲，土米價格又隨洋米價格及其他物價而高漲，這可說是蝗蟲政策之輔翼，至於奸商賤價，操縱取利，囤積居奇，則猶米之有蠹，可說是蝗蟲政策之尾附。

所以今日維持民食與反共，是一件事，換句話說，要維持民食，只有反共，因爲反共才能消滅一切摧

殘生產阻礙運輸的毒害。每一塊地方，于肅清共匪之後，才能使遺黎得所喘息，安居農村，耕作農田。這一塊地方肅清工作做到了，以次及於那一塊地方，從而保持聯絡，恢復交通，才能使運輸通暢，調劑便捷。今日維持民食，治標方法，尚有種種，而排除最大障礙，能消最大癥結，莫過於反共。這是每一個人都要明白了解的。乾嘔肚子餓沒用，看見人家肚子餓乾着急沒用，工作要緊，齊心一意向反共的最大工作而努力要緊。

末了，還有一句話。論語「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生亦吾所欲也，義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這種犧牲精神，似乎敝屣人生，其實正是重視人生的價值。如今全中國都在水深火熱，重慶當局直接壓迫下的民衆，呻吟憔悴，所不忍言。其他地方，亦爲其間接所波及，我們要拯救這些呻吟憔悴的同胞，不可不有犧牲的精神，這種精神是純潔的，堅忍的。這種精神是反共之本源，也是維持民食之本源，我們於孫先生逝世紀念日，這種精神，格外要加以淬厲，加以振奮。

【註釋】 本文係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二日 國父逝世十六週年 汪主席所撰紀念辭。

註一：見民生主義第二講。

註二：亦見民生主義第二講。

註三：黃巢，唐曹州冤句人，作亂十年，始平。

註四：國父在民生主義第三講裏說：「我們對於農業生產，除了農民解放問題之外，還有七個加增生產的方法要研究；第一是機器問題，第二是肥料問題，第三是換種問題，第四是除害問題，第五是製造問題，第六是運送問題，第七是防災問題。」

駐五：汪主席曾於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演講「田鷄與蝗蟲」，將共匪喻爲蝗蟲。

【要旨】

- 一、闡明 國父遺教，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用和平辦法，使大家有飯吃，反對馬克思黨徒的劇烈辦法。
- 二、指出現在的共匪，禍國殃民，是民食之最大仇敵。要維持民食，只有反共。
- 三、檢討米價高漲的原因，是由於重慶當局散布蝗蟲政策，濫發紙幣，外匯暴跌，和奸商囤積居奇。
- 四、盼望從事和平運動的人，要有孔孟的犧牲精神，努力反共以維持民食，拯救被重慶當局直接間接壓迫之下的苦難同胞。

【研究】

問：怎樣可以解決民食問題？

答：實現和平，確保治安，改善民生，遵照 國父遺教，解放農民，實行七個加增生產的方法，民食問題就可以解決。

問：維持民食與反共，爲什麼是一件事？

答：因爲反共才能消滅一切摧殘生產阻礙運輸的毒害。每一塊地方，於肅清共匪之後，才能使遺黎得所喘息，安居農村，耕作農田。這一塊地方肅清工作做到了，以及於那一塊地方，從而保持聯絡，恢復交通，才能使運輸通暢，調劑便捷。今日維持民食，治標方法，尙有種種，而排除最大障礙，消滅最大癥結，莫過於反共。

問：讀了 汪主席的反共與民食，應有怎樣的認識？

答：明瞭要維持民食，只有反共。汪主席領導的和平運動，是奉行 國父遺教，替民衆解除被共匪摧殘的痛苦。

第十三課 罪己的精神

怎樣纔能担負起和平反共建國的責任呢？扼要一句話，要有罪己的精神。

關於和平運動，一般人所熱烈要求的：是收回主權，完成國家之獨立自由。這誠然是必要的，而且是這一次和平運動之真實意義。但是這要求如何纔可以達到呢？扼要一句話，要有罪己的精神，纔可以到。

罪己的精神，與傲慢不同，與卑屈更不同。

何以說與傲慢不同呢？如今重慶方面還有人說：「這一次戰爭，日本是侵略者，中國是被侵略者，所以只要日本撤兵，就一切完了。」這是徹徹頭尾的傲慢精神。釀成這一次的戰爭，中國方面全然沒有責任嗎？「中國是被侵略者」，中國何以會被侵略呢？因為中國積弱。中國何以會積弱呢？因為中國國內，軍閥縱橫，共匪猖獗。中國何以會軍閥縱橫共匪猖獗呢？因為中國政治沒有修明，經濟沒有發達。這樣，中國能說沒有責任嗎？中國以前因為傲慢，弄到這步田地，如今傲慢精神還不除去，恐不至國亡種滅不止。何以說與卑屈不同呢？有些人說：「中國因為軍事失利，眼見得抗戰到底最後勝利是無望了，所以不得不低心下氣，講求和平，以求苟延國家民族生命。」這是卑屈精神。這種卑屈精神是懦弱的，是苟且的，懦弱苟且的人，不能負起和平反共建國的責任。

然則罪己的精神是怎樣呢？我舉出以下兩點：

第一，要有深切的反省。我們如果肯將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細心研究，便可知道，中日兩國只可為

友，不可爲敵。我們如果肯將事變以來日本方面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主張，細心研究，從日本政府所宣布的國策，以及日本全國的輿論，一一探討，便可知日本確具有排除中日兩國以往糾紛，重新建立將來親善關係，共存共榮，復興東亞的大決心。我們如果肯將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原則，細心研究，便可知根據這些原則以定出合理的方案，俾中日兩方皆受其益，並非不可能。我們經過了這種研究之後，應該恍然大悟，從前沒有及早想到此着，以致弄得兵連禍結，民不聊生。我們應該拿着古人所說：「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的精神。從頭幹起。

第二。要有深刻的責任心。一種主張到了實行的時候，必然會發生種種窒礙，種種困難的。尤其今日在全面和平沒有達到的時候。種種窒礙，種種困難，更不能免。我們經過深刻反省之後，我們便應該先責已後責人，例如收回主權，日本曾經屢次聲明，爲要中國能夠分擔建設東亞的責任，日本不但尊重中國的主權，並且還要援助中國完成其爲獨立自主國家所必須之條件，所以收回主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中國不要只知道盼望日本交還，中國必須知道，怎樣纔能使得日本放心交還，怎樣纔能使得日本樂於交還。中國每一個人必須提起全副精神，每一件事，都從改善中日兩國關係復興東亞着想，使得每一件事都能表現出一種新精神，這種新精神，足以使中日兩國很迅速的很穩實的走上共存共榮之路，那麼，日本自然放心交還樂於交還的了。這是中國收回主權的第一要義。總而言之，中國必須盡其在我。古人說：「責己重以周」，又說：「重以周故不怠」這是至理名言，我們不可不確切做到。

我親愛的同胞！我在全國民衆慶祝國民政府還都擁護和平的日子，提出罪己的口號，爲的是鞭策自己，並互相鞭策。從前兩國交戰，戰敗的國家，要担负賠款割地的義務，於是或者垂頭喪氣，偷生苟活，或者腐心切齒，立意報仇。如今我們所要担负的，不是這種義務，而是另一種義務，這種義務不是等閒，

即是要中國與日本共同擔負復興東亞的責任，這種責任真不是等閒的。我們常常聽說「中日協力」，我們不止慚愧，而且着急，我們的政治力量，經濟力量，文化力量，軍事力量，能講得上和日本協力嗎？但是我們慚愧無用，着急無用，我們只有鞭策自己，加倍努力，以求繼續不已的進步，進步的結果，使日本覺得中國是復興東亞的一個最良的伙伴，一個不可缺少的伙伴，那麼，中日兩國相依為命的關係，便做成了，共存共榮的基礎，便奠定了，而三年以來，兩國因為戰爭所忍受的種種犧牲，也就得到莫大的代價了。這是每一個從事和平反共建國的同志，都應該時時刻刻放在心裏，而以為一切行動之準繩的。

最後，我還有幾句話，告訴重慶方面對於和平運動抱着反對的見解的人。我深深知道，中國以內，除了共產黨及其走狗以外，沒有不想望和平的。他們所以反對和平，無非懷疑和平之不能實現。他們認定中日兩國不能共存，「及汝偕亡」實為其一切政治軍略之出發點。如果中日兩國可以共存，那又何必走向「及汝偕亡」之路呢。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日本會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同年十一月三日，日本又會聲明日本的真正希望，不在中國之滅亡，而在中國之興隆，能與日本分擔東亞的責任；並且聲明，如果國民政府能棄其抗日容共的政策，為人事的更迭，則日本必不拒其重新建立。如今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發表宣言，闡明政策之後，日本政府使節及國民使節便到來了，即此一端，可以知道和平必非不能實現，而且和平的第一步已經有事實的表現了。來罷！勿再為和平之障礙，勿使全面和平因你們的反對與懷疑而有所阻滯。和平之實現，有待我們全國民眾努力，如果努力，和平方案只有更好，如果不努力，和平方案雖好，亦徒託空言。我們於慶祝國民政府還都擁護和平之際，格外想念你們，願意你們共同努力，向着和平反共建國的光明大道勇猛前進！

【註釋】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全國民眾舉行慶祝國府還都擁護和平大會，同時日本特派慶祝特使阿部大將及國民使

節蒞臨南京，向國府致賀。汪主席特爲大會撰罪已的精神一文，說明罪已的精神，固與傲慢不同，與卑屈更不同。罪已的精神，第一要有深切的反省，第二要有深刻的責任心，以此策勵國人，加倍努力，以達到和平建國目的。

【要旨】

一、擔負起和平反共建國的責任，要有罪已的精神，罪已的精神，與傲慢不同，與卑屈更不同。

二、罪已的精神，第一要有深切的反省，細心研究 國父的大亞細亞主義，日本方面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主張，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原則，覺悟到沒有及早想到此着，以致弄得兵連禍結，民不聊生，今後應該本着「昨死今生」的精神，從頭幹起。

三、罪已的精神，第二要有深刻的責任心，先責己後責人，提起全副精神，每一件事，都從改善中日兩國關係復興東亞着想，表現出一種新精神，使中日兩國很迅速的很穩實的走上共存共榮之路。

四、在全國民衆慶祝國府還都擁護和平的日子，提出罪已的口號，策勵自己，並互相策勵，共同加倍努力，以求繼續不已的進步，使日本覺得中國是復興東亞的一個最良的伙伴，那麼，中日兩國相依爲命的關係便做成了，共存共榮的基礎便奠定了。

五、和平的第一步已經有事實的表現，希望重慶方面對於和平運動抱着反對的見解的人，勿再爲和平之障礙，幡然覺悟，共向和平反共建國的光明大道勇猛前進。

【研究】

問：爲什麼要有罪已的精神？

答：有了罪已的精神，深切的反省，覺悟中日兩國只可爲友，不可爲敵，從此從改善中日兩國關係復興東亞着想，担起和平反共建國的責任，可以達到完成國家之獨立自由的目的。

問：罪已的精神是怎樣呢？

答：與傲慢不同，與卑屈更不同，最重要的兩點，第一要有深切的反省，第二要有深刻的責任心。

問：讀了汪主席的罪已的精神，應有怎樣的認識？

答：汪主席提出罪已的口號，策勵我們，我們要一致努力，本着罪已的精神，担負和平反共建國的責任。

第十四課 共同前進

和平運動所要求的，不是一時的和平，是永久的和平，如何纔能得永久的和平呢？中日兩國不但要把兩年有餘以來的戰爭現象，從根本上消滅了，所以中日兩國有把過去嫌猜疑忘的心理，完全肅清，從頭幹起，向着一個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的必要。

所謂共同目標是什麼呢？我在中國與東亞文中，已經說過，一是廓清百年以來流毒於東亞的殖民主義，一是要拒絕二十年以來在世界猖獗者尤其在東亞猖獗者的共產主義，這不是指那一個國家，而是指那一種主義。這兩種主義，在思想上組織上比較弱點的民族國家進攻。中國因為積弱，所以被進攻的最利害。日本雖然能自強，但是東亞有一塊地方被進攻，無異日本被進攻。所謂共同防共，即是對於共產黨的拒絕，所謂經濟提攜，即是對於殖民主義的廓清，這是中日兩國的共同目標，為中國，為日本，也為東亞。

中日兩國有了共同目標，便有了共存共榮的基礎了。可是如何纔可以向着這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呢？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國家民族之獨立生存自由平等，這是毫無疑義的，中國的國家民族有了獨立生存自由平等，纔能和日本分担東亞安定與和平的責任，這也是毫無疑義的。然而中國必須注意到一個根本問題，即是中國必須時時刻刻自覺為東亞之一員，中國的安定與和平，必須於東亞的安定與和平求之。因此中國必須在外交上，在國防上，與日本採取同一方針，在經濟上，與日本根據着平等互惠的原則，實行有無相通，短長相補，這樣，東亞的安定與和平纔可獲得，而中國的安定與和平也隨之獲得。所以中國的

建國事業，與東亞復興事業，是要一致的，如果分離，中國的建國事業不會成功，如果背道而馳，更只有自相投於失敗之途。

以上是中國必須注意的，同時日本所必須注意的，也想略略的說幾句。

日本既然屬望中國分擔東亞安定與和平的責任，則不可不使中國能充分自由發揮其能力，以期能夠分擔此責任。日本是東亞的先進國，對於後進國的援助，是日本應有的責任。可是援助與干涉是有極大分別的。援助是培養其能力之發達，干涉則是摧殘其能力之發達。日本如果採取干涉主義，不但不能啓發中國自動的願與日本一致分擔東亞安定與和平的責任，並且會驅使中國與日本分離，甚至背道而馳，日本如屬望中國分擔東亞安定與和平的責任，則關於這一點必須注意。

中國的建國事業能與東亞復興事業相一致，日本能援助中國，俾之能完成其建國事業，並俾之能分擔東亞復興的責任，這樣中日兩國，便可以向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了。共產主義雖然猖獗，但是這種絕對的功利思想，與東方的道德精神，終是格格不入的，只要中國能根據三民主義，以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則民生主義實現之日，亦即共產主義在中國完全消滅之日。因為共產主義以階級鬥爭爲主旨，民生主義以社會合作爲主旨，這是在根本上不同；共產主義以絕對的排斥私有財產爲目的，民生主義則以根據實業計劃發展資本保護私人資本爲目的，這是在辦法上的不同，所以中國如能得到時間以實行民生主義，則共產主義必然絕跡。至於殖民主義侵入中國，已及百年，根深蒂固，似非一朝一夕所能廓清，然而最近數十年來，尤其二十餘年來，中國的民族資本已經萌芽，這種民族資本，固然還是很幼稚的，却是培養起來，必然成爲中國經濟社會的基幹。日本如能與中國的民族資本互相提攜，以先進國的資格，隨時加以援助，則從此廓清殖民地主義的勢力，亦並非不可能的事。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都着眼於此的。於此

有附帶說明的，所謂廓清殖民地主義的勢力，並沒有排斥第三國正當權益的意味，含在裏頭。中國實業計劃的完成，有待於外國資本及技術，這是極顯然的事。這與中日經濟提攜並沒有矛盾。因為中日經濟提攜的結果，中日之間，並無衝突，在這種關係上，歡迎第三國的資本與技術，自然沒有矛盾，而且第三國的正當權益必然因此而得到合理的保障與發達。東亞的安定與和平，是世界的安定與和平之一部份，由東亞的安定與和平，進而為世界的安定與和平，更是世界人類所渴望的事。

【註釋】

廿九年元旦，主席論文，揭出中日兩國因共同之需要，立共同之目標，向此而共同前進，對於和平運動之理論，又有進一步之開展。

【要旨】

- 一、中日兩國，向着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纔能得到永久的和平。
- 二、共同目標是消滅共產主義，廓清殖民地主義。
- 三、中國的建國事業，能與東亞復興事業相一致，日本能援助中國，俾之能完成其建國事業，能分擔東亞復興的責任，於是中日兩國可以向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
- 四、中國如根據三民主義，實現民生主義，則共產主義必然絕跡。日本如能與中國的民族資本互相提攜，以先進國的資格，隨時加以援助，則廓清殖民地主義的勢，亦並非不可能的事。
- 五、中日兩國對這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可使第三國正當權益，得到合理的保障與發達，由東亞的安定與和平，進而為世界的安定與和平。

【研究】

問：為什麼中日兩國要樹立共同的目標？

答：中日有了共同目標，便有共存共榮的基礎。為中國，為日本，為東亞，都有樹立共同目標的必要。

問：中日兩國應該如何向着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

答：中國必須實現民生主義，肅清禍國殃民的共產主義，與日本經濟提攜，完成實業計劃。日本要以先進國的資格，援助中國，俾能完成其建國事業，分擔復興東亞的責任。

問：讀了汪主席的共同前進，應有怎樣的認識？

答：明白共同目標是爲中國，爲日本，爲東亞，中日兩國要對這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我們信仰汪主席的主義，在汪主席領導之下，加緊努力，向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路邁進。

汪主席的主

第十五課 紀念和平反共建國諸先烈

今日紀念和平反共建國諸先烈，我們後死同志，於無限痛苦之中，有無限興奮。二十八年九月一日，中國國民黨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大會裏，決定了對於時局的態度，決定了本於和平反共建國的方針，來收拾目前的中日事變。這種收拾事變的辦法，不是彌縫補苴，而是將中日兩國過去的糾紛，完全切斷，同時把將來的親善基礎，建立起來。這種工作是巨大的，從前因為沒有注意到這一層，所以中國建國基礎，不能穩固，而東亞大局，也為之動盪不安，這樣的互為倚伏，纔會發生此次的空前事變。如今要一掃舊的糾紛，建立新的親善關係，其責任之巨大可想，同時工作上，必須經過種種艱難困苦的路程，也就可想。

在六全大會以前，已經有同志為和平反共建國而犧牲了，自從六全大會以後，犧牲的同志，前仆後繼。去年今日，我們在這裏開追悼大會，先烈的留影以及種種事跡，先烈的家屬哀傷的情形，閉目一想，如在面前。自從追悼大會以後，犧牲的同志，依然前仆後繼，以至於今年，今日我們又在這裏開紀念大會，這些同志，為什麼做了犧牲呢？因為努力於和平反共建國運動，給嫉忌的人謀害了。其實說他是人殊覺不稱，只能說他是匪徒，這些匪徒，受了蔣中正的收買，以殺人為發財之具，用種種卑鄙惡劣極殘忍極黑暗的手段，來謀害和平反共建國的同志，出了這樣的蠹賊，實在是國家民族的不幸。但是這種蠹賊，決不能阻止和平反共建國之進行的，猶之中華民國紀元以前，各種官僚軍閥，決不能阻止革命之進行一樣。今年三月廿九日我們在這大禮堂紀念黃花岡七十二烈士，這些烈士，抱着革命的信心，身雖死，精神不

死，革命事業終告成功。和平反共建國運動同志信仰精神與七十二烈士完全一致，沒有革命運動，中華民國不能發生，沒有和平反共建國運動，中華民國的建國事業不能完成。我們今日在這大禮堂紀念和平反共建國諸先烈，應該對於他們的信仰和精神再加一番體認。

和平反共建國諸先烈的信仰精神，大約有以下三點：

第一 確信中日兩國應爲友，不應爲敵，爲敵則兩敗俱傷，爲友則共存共榮。

第二 既然確信了以上的道理，即使目前中日兩國的事變，有和平解決的可能，必要挺身出來主張，並且見之實行，作一個中日新關係的前驅者。

第三 何況事變以來，日本已經提出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口號，廿七年十一月三日的近衛廣播，以及同年十二月廿二日的近衛聲明，和平不但是理想，而且有實現的可能了。中日兩國的人民，更應該同時反省，同時覺悟，以期建立中日新關係，努力前進。

以上三點，在道理上，是絕對正確的，在事實上，是絕對需要的。一個革命黨人，只問真理，真理所在，便是精神氣力寄托所在，一切危險困難，是不顧慮的。和平反共建國諸先烈，抱着這樣的信仰精神，爲和平反共建國而生，爲和平反共建國而死。

我們須知要救中國，只有這一個主張，才是給中國一條生路，其他都是絕路。蔣中正的抗戰理論，完全以依賴歐美爲基礎，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締結中蘇不侵犯條約時，蔣曾聲言蘇聯三個月內一定參戰，同時又說國聯必能制裁，同時又說英美必能援助。姑無論這些說話，到了現在，都已證明其爲幻想，即使真的可以實現，便能救得了中國嗎？甲午之役，曾經三國干涉還遼的事實，其結果怎麼樣？旅順，大連灣，膠州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以次失去，各省勢力範圍，以次劃完，整個中國，降到次殖民地的地

位，卒之日俄戰起，所謂遼遼也成泡影。華盛頓會議，再演一回，其結果怎麼樣？不過種下了九一八事變的原因，卒之爆發而成爲蘆溝橋以來之四年事變。中日事件，應該由中日自己來解決，應該由中日兩國各自反省，各自覺悟，以共同走上共存共榮的大道。如果不由中日自己來解決，而依賴歐美的勢力，那只有使冤仇之上，加上冤仇，這一回的事變未了，而後一回更大的事變，早已深深埋伏着。展開了三國干涉遼遼的事實，以及華盛頓會議的事實，便是絕明顯的教訓。一個愛國者要將國家建築在平安的地面上，不要將國家建築在滿埋炸藥的地面上，和平反共建國的論據，是使中國日本相安於東亞，這是所謂平安的地面，爲中國，爲日本，爲東亞，應該如此主張，並且應該照着這主張實行。抗戰的論據，是引歐美勢力深入中國，以對抗日本，其結果，中國不安，日本不安，東亞不安，所謂將國家建築在滿埋炸藥的地面上，再沒有更確切的比喻。

如此說來，國際援助，即使實現，也非中國之福，何況這祇是蔣的幻想。

可是近來關於八一三的宣言，口口聲聲中國的抗戰，是爲世界，試問他，中國今日危急存亡到了這般地步，做中國人的，爲甚麼不專心致志想法子救中國？爲什麼却要去爲世界而戰，姑無論德力量，這些大言不慚，徒然使人肉麻，而且照他所說，爲世界而戰，不外爲英美而戰，這就是說他早已將中國的國命民命，看做等閒，只要英美給他一些錢，維持着他偏安的政權，他就要將中國的國命民命來做交換品，從今以後中國的抗戰軍隊，不過是英美的僱傭兵，英美花了些錢，僱傭了中國的兵，來替他做一種別動隊，牽制日本，使之無暇他顧。這在英美，誠然得計，可是中國的軍隊，却真是冤枉，抗戰四年，結果成爲英美的僱傭兵了。何況這些錢，並不是英美自己荷包裏掏出來的，左右不過是中國人的存款裏挪移得來，中國

人自己出錢，自己出命，去做英美的僱傭兵，真是古往今來的一個大冤枉。可是僱傭兵的命運，也並非長久之主張，英國爲想阻止日本參加軸心，曾經封閉滇緬交通線，後來因爲日本終於參加軸心，便又將滇緬交通線開放，這是顯著的事實。這就是說：英美用得着以中國牽制日本的時候，便要這些僱傭兵，用不着時，立刻棄之有如敝屣。這幾日來，報紙上載着日美協調的消息，其有實現的可能與否，且置不論，總之，如其有實現的可能，英美便不需要這些僱傭兵了，只有讓蔣空喊着爲世界而戰了。

以上所說，證明近來蔣的抗戰理論，已由依賴英美，直落到爲英美而戰，不但出賣中國的軍隊，並且出賣中國的國家，中國的民族。這些軍隊，在蔣壓迫之下，不能自由，實爲可痛，而中國的國家民族，尤爲可痛。

今日中國擺在面前的，一條絕路，一條生路。所謂絕路，便是爲英美而戰，無論在長期戰中，中國的國命民命，將被摧殘以盡，即使戰勝，也不過循甲午以來的覆轍，而使之加深，使中國永遠成爲英美的次殖民地，至於戰敗，那就更不忍言了。所謂生路，便是和平反共建國諸先烈所指示的，及以血洗出來的一條光明大道，這是爲中國，爲日本，爲東亞。東亞不安，中國不安，中日不相安，東亞不安，理論是絕對正確，實現有十分可能。曾近數月以來，中日關係，已經有了進步，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已經提高，同時國內建設，亦在各方面積極進行，例如清鄉工作，參加的每一同志，不認爲一隅的工作，而認爲是和平反共建國的實驗場所，要在這場所內，樹立中日協力的模範，樹立肅清匪共的模範，樹立三民主義建設的模範。每個同志，都知道清鄉工作的成功，不只是爲民衆得到一片安居樂業的地方，並且爲國家得到一片完全自由行使權力的地方。日軍方面亦抱同一感想，不惜予以種種助力，以蕪其共同目的之早日實現。目前日本方面最高軍事當局畑總司令官的談話，大家都在報上看見的，清鄉告成，日本於此區域內，不再駐

兵。那麼全面和平縱沒實現，而局部和平，仍能做到，由局部和平展開起來及於全面和平，是可能的，只要腳踏實地的做去。我們今日紀念和平運動諸先烈在成仁的時候，心裏沒有什麼放不下，所放不下的，是中國是否得救，諸先烈成仁的時候，將兩肩上的擔子，付給我們後死同志，一雙眼睛，睜睜的望着，我們後死同志，怎樣的負擔起來：我們後死同志，當紀念先烈的時候，應該告訴他們道，你們放心罷，中國一定得救，和平建國運動一定成功，我們一定能夠繼承你們的遺志，不怕艱難，不怕危險，將中國建築在平安地面，中國安，日本相安，東亞安，這不但是辛亥以來完成的建國工作，靠此完成，甲午以來未調整的中日邦交，也靠此得到調整，向着共存共榮的大道上走，你們的英靈，時時照耀着我們後死同志，我們後死同志的心魂，時時和你們繫在一起。最後高呼一句，和平反共建國諸先烈精神不死，中華民國萬歲。

【註釋】

民國三十年九月一日，汪主席於追悼和平反共建國先烈大會中致詞，哀悼和運烈士，殺身成仁，與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精神一致，並闡明和平反共建國運動，理論絕對正確，實現有十分可能，勗勉後死同志，努力以赴。

註一：清光緒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日俄開戰於東三省，中國宣告中立，結果俄兵大敗，艦隊俱殲，乃以美總統之調停，議和於美之朴次茅斯。

【要旨】

一、和平反共建國同志信仰精神與七十二烈士完全一致，沒有革命運動，中華民國不能發生，沒有和平反共建國運動，中華民國的建國事業不能完成。

二、和平反共建國諸先烈的信仰精神，絕對正確。一個革命黨人，只問真理。真理所在，便是精神氣力寄托所在，一切危險困難，是不願慮的。

三、愛國者要將國家建築在平安的地面上，和平反共建國就是照這主張進行，如果依賴英美的勢力，使中日冤仇愈結愈深，好比將國家建築在滿埋炸藥的地面上，從前三國干涉還遼的事實，以及華盛頓會議的事實，便是絕明顯的教訓。

四、淪蔣由依賴英美，直落到爲英美而戰，不但出賣中國的軍隊，出賣中國的國家，中國的民族，結果將使中國的國命民命，摧萎以盡，永遠成爲英美的次殖民地。

五、救中國只有一條生路，就是和平反共建國諸先烈所指示的，及以血洗出來的一條光明大道。我們紀念和運諸先烈，要繼承他們的遺志，不怕艱難危險的做去，確信中國一定得救，和平建國運動一定成功。

【研究】

問：和平反共建國諸先烈抱着怎樣的信仰精神？

答：確信和平反建國的道理，是絕對正確，絕對需要，就把精神氣力寄託在這真理上頭，一切危險困難，均所不顧，拚命的幹着。這是和運諸先烈的信仰精神。

問：讀了汪主席的紀念和平反共建國諸先烈，應有怎樣的認識？

答：和平反建國運動，是救中國的唯一生路。先烈爲和平反建國而死，身雖死，精神不死，他們的精神，與七十二烈士完全一致，我們後死者要繼承先烈的遺志，不怕艱難，不怕危險，向着和平反建國的光明大道走去。

第十六課 豔電書後

去年今日，我發表豔電，於今整整一年了。我爲紀念今年今日起見，將豔電重讀一過。豔電的着重點，在末後幾句：「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中日兩國，所以有幾十年來的糾紛，以至於今日的戰爭，如果中國一方面，只是說由於日本之侵略主義，日本一方面，只是說由於中國之遠交近攻政策，那麼過去原因不明，自然對於現在的問題，不能解決，而將來的方法，更無從談起。如果能「深求其故而自明瞭其責任」，則可知道這種糾紛和戰爭，對於「東亞幸福」對於「太平洋之安甯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都有害無利。那麼，回過頭來，消釋前嫌，向着「東亞幸福」「太平洋之安甯秩序」「世界之和平保障」，而共同努力，這纔是中日兩國的百年大計。凡是從事和平運動的，必須對於這一點有深切認識，不然，必不能從事和平運動。

和平運動的意義如上所述，我們看看這一年來的中日雙方的輿論。在日本方面，一年以前，早就有對於中日關係須加以重新檢討重新確定之主張。自從近衛聲明以後，全國輿論，更趨一致。所謂東亞協同體，其定義及其條理，固然還沒有十分確定，但如近衛聲明中所說：「日本盼望中國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之任務」，中國要有能力，纔能分此任務，所以對於中國尊重其主權並援助其完成獨立，俾之有分擔此任務的能力，這稱基本意義，日本輿論與日本政府聲明是一致的。雖然我們有時也會從日本雜誌上或報紙上看見一些相反的話，但在大體上是一致的。日本輿論能夠這樣，是和平運動的一大進展。在中國方面，雖

然仍有一部份高唱抗戰到底，最後勝利，但這是假的，這是受着壓力而不得不然的，所以凡是壓力所不及的地方，真輿論便出來了，已知道從根本上重新研究 孫先生大亞洲主義之真精神真面目之所在了，知道中國必須與日本攜手，纔能內則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外則同負保障東亞之責任了。這也不能不說是和平運動的一大進展。

根據了以上事實，我們相信，我們熱烈相信，和平運動的理論，已經成熟，和平運動的成功，必然到來。目前所餘的問題，只是和平原則如何纔能具體實現？和平方案如何纔能完成？這些問題固然重要，但是我們如果本着十二分自信和互信的決心，提出十二分的勇氣來進行，則一切困難必可衝破，一切荆棘必可掃除。

我如今還有幾句話，對主張抗戰到底，最後勝利的諸君說。諸君這些話，不是老實話。最後勝利是渺茫的，諸君自己心裏知道。先就國際形勢來說，諸君以前聽了陣線論[●]的話，以為反侵略陣線必然決戰，決戰的結果，反侵略陣線必然勝利，勝利的結果，必然援助中國制裁日本，所以中國只要抗戰到底，必然最後勝利。這種渺茫的論據，我們在一年以前不知把他駁過多少次了。至於歐戰發生則事實證明，再用不着我們來駁了。被諸君認為反侵略陣線領袖的蘇聯，已經和被諸君認為侵略陣線領袖的德國，聯合起來，夾攻波蘭，並且由蘇聯單獨向芬蘭進攻了[●]，諸君所假定的侵略陣線反侵略陣線，已經因粉碎而空虛了。在這時候，歐洲的交戰國家，都是為着自己着想，談不到援助別人。其對於中日戰爭，將看日本對於歐戰的態度如何。如果日本傾向自己方面呢！自然盼望中日早早和好，俾日本以全力來幫助他戰勝他的敵人，如果日本還沒有決定呢！則最好中日兵連禍結，無解無休，至少予日本以牽制，使之沒有餘力，傾向到他的敵人方面去，這種心事，是顯然的，所謂各為其國，本來不足為奇，然則諸君所假定的援助，豈不陷於空

虛嗎？還有一層，現在歐洲的交戰國家，誰是將來的戰勝者？誰是將來的戰敗者？目前雖然有種種揣測，但是那裏說得定呢？就軍事說，或者以爲某方面海軍力優，某方面潛艇力優，空軍力優；就經濟說，或者以爲某方面能持久，某方面不能持久；這些在目前雖可以揣測，而在將來則不可揣測的。例如上次歐戰，俄國的革命^㉑，德國的革命^㉒，雖然可以從歷史的趨勢上，斷定其可能，然而是否必然發生，及何時發生，則誰也不能斷定，然則諸君所假定的戰勝者豈不又是渺茫嗎？即使如諸君所假定，將來的戰勝者屬於諸君所盼望的方面了，然而那便斷得定援助中國嗎？而且這援助便斷得定有效嗎？例如上次歐戰結果，巴黎和會^㉓，中國是何等的失望！而華盛頓會議^㉔，也不過替九一八事變種下一個根子便了，試問於中國有何益處？然則諸君所假定的援助，又是渺茫了。諸君只要把以上層層想過一遍，便可知道將抗戰到底，最後勝利寄託於國際援助，是如何的渺茫，這是不是忠於謀國者所宜出呢？再就國內形勢來說，這一年來，又喪了多少師，失了多少地，說起來固然傷心，而最可傷心者，還莫過於鋪張小勝，掩飾大敗，小勝不是決定的勝利，用不着鋪張的，何況鋪張起來，以圖欺騙人民，其心更不可問呢！大規模的反攻，不用說了，而焦土戰游擊戰，極其作用，不過騷擾，須知騷擾事小，消耗事大，國力源於民力，民力耗盡，國力隨之，這豈是抗戰到底的辦法？最後勝利更不待言了。共匪惡毒心腸，不必與言，諸君之中，定然有一部份懷着民族自殺政策的，認定國將亡了，不如舉其一切，同歸於盡，如果國之亡無可救，我也和諸君一樣，如果國有可救，難道不應該以救國爲先嗎？我們今日要爲救國而死，不要只爲殉國而死。

以上國際形勢，國內形勢，我在豔電中，已經指出，到了今日，更加證實。中國現在除了和平，沒有出路，所餘的只是和平原則能否實現，和平方案能否完成的問題了。我知道有許多人，對於和平是盼望的，但是懷疑着和平原則能實現嗎？和平方案能完成嗎？於是存了一種念頭，以爲目前姑且不說，等到和平原則已經實現，和平方案已經完成，那時候再來贊成和平，亦還未遲。全國裏頭存着這種念頭的人，可

以說最多了，做個比方，辛亥^①以前，有許多人以為等到革命成功，再來贊成革命，亦為未遲，其結果，等到革命成功，再來贊成革命的人，十分之九是破壞革命的。如今又說等到和平成功，再來贊成和平，則其將來為和平的破壞者，可以預決。為什麼呢？因為他對於革命，對於和平，根本沒有認識，所以其結果必然如此。辛亥革命，還只是國內的改革；如今的和平運動，如上所述，中國必須與日本攜手，纔能內則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外則同負保障東亞之責任，這比之辛亥革命關係重大，工作更鉅。我們只要認定這是必要的，我們便要顧一切的向前奮鬥，即使一時蹉跌，一時失敗，今日之蹉跌與失敗，即是他日成功的基礎，我們何所用其徘徊瞻顧？有人告訴我道：「你須要得到具體的和平條件，方纔可以做和平運動」。這句話，我只承認一半的對，因為具體的和平條件，誠然是必要的，然而具體的和平條件之獲得，有待於和平運動。不但此也，獲得之後，期其實現，也有待於和平運動。具體的和平條件，不會突然發生出來的，總而言之，我對於和平運動，是勇往直前的，如果眼見其成功，固然是國家之福，即不幸失敗，亦必為和平前途留下一些種子，因為中日兩國如果要共存共榮，終不能不向這條路走的，何妨由我來做這條路上的一顆石子，一粒泥沙，有人說道：「為抗戰而死，不失為民族英雄，為和平運動而死，死了還受種種惡名。」哼！請你看蘆溝橋事變以來，幾千百萬同胞的屍骸堆在這裏，你還能有心替自己打算嗎？

末了，我記得一件舊事，我於庚戌三月在北京被捕的時候^②，警察在我身上搜出「革命的決心」幾篇文字，問我道：「帶這些文字做什麼？」我答道：「沒有什麼，這些文字，從前以墨寫出來的，如今想以血寫出來。」我今日想起當初和我一同坐飛機出重慶的曾仲鳴同志，及首先勸我離開重慶的沈棣同志^③，我慚愧我到今日尚在人間！我誓以我所餘的熱血貢獻於和平運動！

【註釋】

① 贛電周年紀念日，

汪主席發表此文，就國際形勢國內形勢，證實贛電所指出中國現在除了和平，別無出路是正

確的，並勉勵國人，勇往直前，爲和平而努力，無所用其徘徊瞻顧。

註一：有些人幻想着世界上有侵略陣線與反侵略陣線，兩條陣線，這種說法，就是陣線論。

註二：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德蘇簽訂互不侵略條約，蘇聯即與德國夾攻波蘭，並單獨進攻芬蘭與波羅的海各國。

註三：民國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革命成功，俄皇尼古拉第二退位，改國體爲共和。同年十一月，共產黨執政，成立蘇維埃政府，改國名爲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註四：第一次歐戰中，德國西線戰事屢敗，人心動搖，遂於民國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發生革命，十一月九日德皇威廉第二出奔荷蘭，由社會民主黨及獨立社會黨成立臨時政府，民國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二月，政府召集憲法會議，制定民主共和憲法，選舉亞柏特爲大總統。

註五：民國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一月，歐戰結束，各國在巴黎凡爾賽宮開和平會議，與會者三十二國，代表七十二人，英美法義日爲五強國，各派代表五人，我國僅二人，答訂和約時，因山東問題來未決，我國拒絕簽字。

註六：民國十年，（公元一九二二）美國總統哈定發起華盛頓會議，（亦名太平洋會議）籌議限制軍備與解決遠東問題，於十一月四日正式開會，我國派全權代表三人出席，議定中日魯案條約，英美法四國太平洋條約，五國海軍條約，五國潛艇毒氣條約，六國海底電線支配條約，九國中國關稅條約，及九國公約。

註七：民國紀元前一年（清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十月十日革命軍起義於武昌，推翻清政府，創建中華民國，世稱辛亥革命。

註八：民國紀元前元年 汪主席與同志黃復生，喻紀雲，陳璧君等祕密入北京，謀炸攝政王載灃。翌年二月，（清宣統二年，歲次庚戌）計劃洩漏，三月初七日，汪主席黃復生先後被捕，民政部大臣肅親王善耆親自訊問，汪主席闡明革命主義，洋洋數千言，善耆大爲感動，請於載灃，判處無期徒刑。事發後，胡漢民將 汪主席所撰革命之決心與南洋各同志書兩文，刊諸報端，一時革命黨人，無不慷慨激昂，加緊工作，不久武昌起義，汪主席與黃復生先生始出獄。

註九：沈崧，字次高，廣東番禺人，民國八年六月十六日 國父蒙難廣州，沈氏出入彈雨中，負創完成使命，受知於國父。十二年奉命襄廣州警政，十四年任東江行政委員，南路行政委員。北伐後追隨 汪主席，無役不從。二十六年七月中日戰起，沈氏擁護 汪主席和平主張，首勸 汪主席離去重慶。後汪主席開始和平運動，沈氏盡其最大之努力，日夜奔走擊畫，卒遭渝方之忌，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夜在香港殉難。（事見 汪主席所撰沈次高先生行狀）

【要旨】

一、從事和平運動的，必須對豔電的著重點，「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自明瞭其責任。」有深切的認識。

二、豔電發表一週年，檢討和平運動有三大進展：一、日本輿論與日本政府一致，對中國尊重其主權並援助其完成獨立，俾有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任職的能力。二、中國的真輿論，認識 國父大亞洲主義之真諦，知道中國必須與日本攜手，對內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對外同負保障東亞之責任。

三、觀察國際形勢，各國都是爲自己着想，談不到援助別人；同時國內形勢，喪師失地更多，民力消耗殆盡；都證實豔電的主張正確，中國現在除了和平，沒有出路。

四、和平運動的理論，已經成熟，和平運動的成功，必然到來。所餘的只是和平原則能否實現，和平方案能否完成的問題，全在我們不顧一切的向前奮鬥。

五、追悼和運先烈會仲鳴先生沈崧先生，汪主席誓以滿腔熱血貢獻於和平運動，最勉同志共同努力。

【研究】

問：怎樣纔是中日兩國的百年大計？

答：中日兩國，消釋前嫌，向着「東亞幸福」，「太平洋之安寧秩序」，「世界之和平保障」而共同努力，這纔是中日兩國的百年大計。

問：國際形勢對於中國的前途怎樣？

答：各國都只爲自己着想，談不到援助中國，中國惟有與日本攜手，對內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對外同負保障東亞之責任。

問：國內形勢對於和平運動的前途怎樣？

答：一年來喪師失地，不可數計，民力消耗殆盡，可見無底抗戰，是民族自殺政策，有亡國的危險，和平運動纔
是救國的出路，現在理論已經成熟，成功必然到來了。

問：和平運動現在進展到如何程度？

答：汪主席在豔電書後裏說：具體的和平條件的獲得，有待於和平運動；獲得之後，期其實現，也有待於和平
運動，國府還都以後，與友邦締結中日調整國交條約，已獲得具體的和平條件，正在努力於實現，這是和平
運動的大進展。

問：讀了汪主席的豔電書後，應有怎樣的認識？

答：確信汪主席的和平主張，是救國主義，和平運動一定成功。汪主席誓以熱血貢獻和平運動，我們也要誓
以熱血効忠汪主席，爲和平運動努力奮鬥。

第十七課 所望于中華民國三十年者

中華民國三十年，將爲劃時代之一年。中國有一句老話：「三十年爲一世」，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於今三十年了，何以尙未能完成建設，而且陷於如此危急存亡的境遇呢？原因雖多，而外交方針不能確定，是一個重要原因，本來中國所以有國民革命，不外欲自拔於次殖民地的地位，總理孫先生在遺囑裏，說得明白：「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給與中國不自由不平等的待遇，使之陷於次殖民地的地位的，是百年來的帝國主義，●中國國民革命之唯一對象，無疑的是帝國主義。可是這帝國主義的勢力，非常厲害，百年以來，幾乎席捲全球，紅綜黑三大人種全被吞沒，黃種人也被吞沒了一半，到了東亞，纔遇着日本的抵禦。日本在東亞是先進，中國是後起，中國國民革命之唯一援助者，無疑的是日本。不幸中日兩國，不能看清此點，同心禦侮，却反互相結下冤仇，如果越結越深，不但中國欲自拔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杳不可得，整個東亞，只怕也要相斫以盡了。

只看重慶，在奄奄一息的時候，帝國主義者，從荷包裏掏出幾個臭錢，一萬萬元二千萬鎊，立刻又高喊抗戰到底起來。中國人的性命，真個就這樣的賣給帝國主義者麼？東亞真個就這樣的斷送了麼？去年的一年，中日兩國，忙於邦交調整，這調整的意義，是解除了從前的一切冤仇，從今以後，結成朋友，共同抵禦帝國主義。自中國來說，是完成國民革命之目的，爭取中國之自由平等；自東亞來說，是復興。這兩件事，其實只是一件事。去年的一年是調整邦交條約之締結，今年的一年是調整邦交條約之實行，所以我說中華民國三十年，將爲劃時代之一年。

東亞復興，與中國自由平等，是一件事。中國不能得到自由平等，則沒有能力來分擔復興東亞的責任，而中國自由平等之完全獲得，必於東亞復興中求之。因此中國的獨立，是必要的，與日本協力，也是必要的。根據於這種意義，所以有東亞聯盟的運動，在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提攜，文化溝通四大條件之下，各本於獨立的立場，爲共同的協力，這種工作，自中華民國三十年起一直做到成功爲止。

今年的一年，重在實行，如上所述。我們要擔負實行的責任，我們先要檢討實行的力量。我們是赤手空拳來做和平運動的，這並不稀奇，一切革命事業，都由創造，換句話說，都由赤手空拳得來。我們對於和運前途，有了信心，自然有了勇氣，這便是力量。我們只要信心堅定，勇氣自然如火之然，如泉之達。以前「敵乎友乎」，徬徨於方寸之中，遲疑不決，即使沒有蘆溝橋事變，中日關係也不會好轉的。如今信心堅定了，不再猶疑了，只要努力做成可以爲友的材料，努力做成可以爲友的資格，不愁人家不來和你做朋友。中國固然積弱，固然戰敗，但是努力的結果，不久定然有一種新興的蓬蓬勃勃的氣象。這種氣象是堅定的信心培養出來的，有了堅定的信心，鼓起不斷的勇氣，一切困難，可以克服，一切事業，可以創造，我們決用不着自暴自棄。

以上所述，是精神方面的力量。至於物質方面呢？我們更可謂赤手空拳，舉目一看，只有荏苒，只有瘡痍，而且有許多人以爲有和平卽有幸福，如今幸福未到，痛苦未去，幾乎要對和平失望了。然而我們細細一想，中日戰事，尙在繼續，重慶方面，正想使人民再糜爛下去，日本全國，亦正在節衣縮食極端刻苦之中，和平區內人民，以爲一有和平卽有幸福，天下那有這樣容易的事呢？我們只有替和平幸福，先定下一個全盤計劃，然後從最低限度着手。所謂最低限度，一是不能不要的兵力，一是不能不要的民食。所謂兵力，是要來保障和平開拓和平的。共匪所倡的「點線面」論，是不要面的，所以用游擊戰焦土戰來糟蹋

面。我們反之，用全力來保障面，換句話說，就是守土。我們每得到一塊地方，必須用全力將他守著，不讓共匪來施展游擊戰焦土戰。這一塊地方，確實的守着，再來取第二塊地方，再來將它守着，這便是所謂保障和平，開拓和平，這是不需要兵力的，所以我們主張建軍。地方守得住，在這塊地方之內的人民，便可從事生聚，從事生產了。中國以農立國，第一自然是農村的興復，農地的整理，交通事業，以及其他工藝事業，自然也就隨以發展，於是乎人民不至於愁吃貴米了。這兩件事，是全盤計劃中之最低限度，不可不於今年的一年之內，就着手解決的。這真是古人所謂「卑之無高論。」正惟其卑之無高論，我盼望於今年的一年之內，努力做到。

末了，對於全面和平有幾句話，歷史往往重演的，時代的進步，未必能把歷史全行抹殺，但至少要把歷史縮短些。明朝亡國，流賊起於西，李自成是米脂人，張獻忠是延安人，從米脂延安殺起，游擊戰焦土戰遍於全國，等到國力兵力糟蹋得一乾二淨了，滿洲從東入關，流賊也就一乾二淨，正如蝗蟲將禾食盡，自己也就餓死一樣。如今共匪的巢穴，正在米脂延安一帶，想到這裏，不寒而慄。真個歷史要重演嗎？我們在這時代，就不能努力將他重演的程途縮短嗎？世界上斷斷乎沒有將國力民力任意糟蹋，而國能不亡的。中國今日除了和平反共建國，斷斷乎沒有第二條救亡的路。請站在重慶方面的同胞們，和舊日同志們，摸摸良心，斷斷乎不可悠悠忽忽，將今年的一年又白過了去。

【註釋】汪主席於民國三十年元旦，發表所望於中華民國三十年者一文，說明去年的一年是調整邦交條約之締結，今年的一年是調整邦交條約之實行。實行要力量，最低限度要建軍以保衛和平，復興農村以充裕民食，是本年內要努力做到的。

註一：帝國主義，即侵略主義。凡一個國家，對別個國家或民族，施行軍事侵略經濟侵略者，叫做帝國主義。

註二：李自成，明米脂人（在陝西省）崇禎時為流寇，自稱闖王，在晉豫湖廣巴蜀等地，焚戮至慘，崇禎十七年率眾陷

京師，莊烈帝殉國，後吳三桂引清兵入，自成西遁，被村民困於九宮山自殺。

註三：張獻忠，明延安衛人，崇禎時爲流寇，與李自成合，連寇晉陝豫等地，所遇屠殺甚慘，後據武昌，陷成都，被清兵所擒伏誅。

【要旨】

一、去年的一年是調整邦交條約之締結，今年的一年是調整邦交條約之實行，所以中華民國三十年，將爲劃時代之一年。從今以後，中日兩國，結成朋友，共同抵禦帝國主義，以達到復興東亞的目的。

二、實行要力量，就精神方面說，我們有了堅定的信念，鼓起不斷的勇氣，一切困難，可以克服，一切事業，可以創造，決不可自暴自棄。

三、就物質方面說，要先定一個全盤計劃，從最低限度着手，（一）建軍以保障和平，開拓和平；（二）復興農村，以充裕民食，盼望於今年的一年之內，努力做到。

四、正告重慶方面的同胞和舊日同志，中國今日除了和平反共建國，沒有第二條救亡的路，游擊戰焦土戰白白糟蹋國力民力，替禍國殃民的共匪造機會，恐怕明朝亡於流賊的歷史要重演了，盼望他們趕快覺悟，促進全面和平。

【研究】

問：調整中日邦交的意義是什麼？

答：解消以前的一切冤仇，從今以後，結爲朋友，共同抵禦英美帝國主義。自中國來說，是完成國民革命之目的，爭取中國之自由平等；自東亞來說，是復興東亞，建設東亞新秩序。

問：實行調整邦交條約，應該怎樣？

答：中日兩國，在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提攜，文化溝通四大條件之下，各本於獨立的立場，爲共同的努力。

問：讀了汪主席的所望於中華民國三十年者，應有怎樣的認識？

答：汪主席昭示我們，民國三十年是調整邦交條約的實行年。大家要對和平反共建國運動，有堅定的信念，鼓起勇氣，努力邁進；並擁護汪主席主張建軍與復興農村的全盤計劃，使全國同胞，共享和平的幸福。

此
页
空
白

附錄

回憶與前瞻

周佛海

自從去年十二月五號離開重慶，十九號離開昆明以後，一直到現在，沒有公開的發表過言論。因為我的沉默，所以引出了許多的揣測。有人以為這是汪先生和蔣先生演的雙簧，否則，我不會離開重慶。有人以為是蔣先生派我出來，暗中監視汪先生的行動。但是無論如何揣測，據我所知道的，除掉共產黨徒及惡意者以外，我的朋友和一般公平的觀察者，對於下述兩點，意見是一致的。第一，以為我向來不是親日派，向來和日本人沒有往來，所以這次的行動，決不是受日人的勾引。這種觀察是對的。我雖然在日本讀了七年書，但是沒有一個日本朋友，平日只知道上講堂，進圖書館，絕對沒有和日本同學交際過。回國以後，除掉兩個朋友的太太是日本人，有時和她們見面以外，十六年之間，沒有見過一個日本人。所以像我這樣的日本留學生，實在是很希奇的。因此，說我向來和日本沒有勾搭，這次不是受日本人的勾引，完全是對的。第二，以為我這次出來，不是為的個人問題，一定另有一種見解和主張。這也是對的。我在中央，不能算是失意，不能算是沒有地位。一個毫無憑藉的窮學生，掙扎到當時的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十幾年辛辛苦苦所獲得的政治和社會的地位，輕輕的丟掉，去尋求一種渺茫空虛，絲毫沒有把握的個人的權利和地位，世界上沒有這樣的蠢材！聽說重慶有一部份朋友，說我胆小怕死，所以逃出來。這尤其是笑話。像我這樣地位的人，老實說，無論在何處，都是有堅固的地下室可以躲避的。日本飛機，決不能輕易炸到。而且空襲的時候，已有「空襲警報」叫我們從容的準備。不像現在，時時刻刻在共產黨徒及重慶特務份子的暗算之中，又沒有「暗殺警報」叫我事前準備，所以現在所受恐怖份子的生命的威脅，比以前所受日本飛機的威脅要大得多。為着要命，為着怕死，反走上恐怖更多，危險更大的路，世界上也沒有這樣的蠢材！至於說到名譽，更不消說了。在共產黨徒及重慶所脅持的報紙雜誌上，當然用着漢奸，賣國，通敵的種種罪名，儘量的加以毒罵和惡咒。所以這次舉動，乃是犧牲地位，犧牲名譽，犧牲一切友誼和私情，犧牲一切歷史和成績，甚至犧牲性命的非常的舉動。為着個人的問題，而

要這種犧牲，世界上更沒有這種的靈材！

既然不是爲的個人，也不是受着日本人的勾引。那末，爲甚麼要出來，爲甚麼要有這次的行動呢？這話說來很長，只好簡單的說說。不過在百忙之中，想到甚麼，就寫甚麼，不能做系統的敘述和說明。

這次的中日戰爭，真是冤枉極了。因爲是陰錯陽差的打起來，就不能不糊裏糊塗的打下去。在蘆溝橋事變初起的時候，兩國的當局，何嘗沒有就地解決的意思，何嘗不採取不擴大的方針。但是雖然都有不擴大之心，而都處於不得不擴大的勢。在日本方面，當時在華的軍人，是氣餒萬丈的，他們以爲中國仍舊是可以不戰而屈的，仍舊是可以威脅成功的。所以儘管東京方面，聲明不擴大方針，而平津方面，則儘量採取擴大的行動。但是無論如何，就是當時的當地軍人，也沒有把當時局部衝突，演成現在這種全面戰爭的意思。在中國方面，當時的現象，更是可以痛心。朝野上下的調子，沒有不高唱入雲的。但是調子唱得很高的人，除着頭腦極簡單的糊塗蟲以外，沒有不明白繼續打下去，中國決不能僥倖成功的道理。這些道理，共產黨，桂系及當時不滿意中央的人，沒有不知道的。蔣先生尤其比任何人要清楚。大家都知道戰爭不能擴大，不應繼續，而偏偏都高唱持久的全面戰爭。這種悲慘的矛盾，決不是將來的歷史家所能了解的。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份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爲要倒蔣，所以高調持久的全面戰爭。蔣先生是絕頂聰明的。這種把戲，那裏滿得過他？所以他們的調子唱得高，他的調子唱得更高。在他的意思，以爲他的調子一高，一方面可以壓服反對的人，使他們失掉了倒蔣的理由，同時對日本也表示自己的決心，使日本知道這次不是可以威脅成功，而促成日本的反省，以提早事件的解決。他的用心，實在很苦。不過他這種用心和辦法，不僅不容易獲得他預期的結果，反足以作繭自縛，逼迫他走上他不願意走的路。我在廬山談話會的席上，聽見他發表關於蘆溝橋事件的意見以後，立刻就發生這種感想。當時我就對朋友說，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適足燒身，前途是未可樂觀的。因爲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着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得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得深。同時，蔣先生本想以高調威脅日本，而日本當時在華的軍人，也不肯在蔣先生高調之下示弱。於是這邊調子越高，那邊態度越強。但是調子高是假的，態度強也是假的。無論調子如何高，態度如何強，當時都沒有從事全面長期的戰爭的決心和準備。不過一方面沒有想到高的調子雖然是假的，將來如何可以變低？別方面也沒有想到強硬的態度雖然是假的，將來如何可以化軟？於是兩方面在假的空氣之下，竟演成了真的空前

的慘劇，使共產黨和俄國在傍鼓掌稱快！我想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應該互相抱頭痛哭，澈底的懺悔和覺悟。

我當時的意見，以為在北方，我們決不能再和九一八一樣的毫無抵抗。因為在北方如果不堅強的抵抗，既不能表示我國的決心和實力，就不能戡當時一部日本軍人的氣燄。我們要以實力表示我們是不可以不戰而屈，我們要以實力使日本知難而退。但是我們要堅持一種政策，就是我們是為結束戰爭而抗戰，不是為擴大戰爭而抗戰。所以我們的抗戰，只應限於北方，不應在北方以外的地方，自行挑戰。自從廬山談話會回到南京以後，就和許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適當情形之下，可以結束北方的抗戰，恢復和平的關係。當時有三種觀察：一是戰必大敗，和必大亂；二是和必大亂，戰未必大敗；三是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我研究的結果，覺得第三種看法是對的。為甚麼戰必大敗？只要是稍有常識，而不絕頂糊塗，稍有理性，而不純粹感情用事的人，沒有不明白的，用不着多說。主張最後勝利的人，也明知道中國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擬。但是他們總覺得國際形勢是會變化的，日本內部是會崩潰的。於是把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比天還大的問題，寄託在這兩個鏡花水月的幻想之中！他們強調只要繼續抗戰半年，俄國一定實際參戰，英美一定對日制裁，日本財政一定崩潰。這些主張，我們且暫緩以理論來反駁，只要先看看過去的事實，就可以證明其荒謬。半年，一年，一年半，到現在兩年了。國際的形勢，變化到足以使我們得到最後勝利的程度沒有？俄國參戰了沒有？英美對日制裁了沒有？日本內部崩潰了沒有？儘管國聯接二連三的決議給中國以道德的同情，個別的援助，究竟這些同情和援助，能不能使中國得到最後的勝利？對於俄國參戰的迷夢，到現在應該醒了。去年張鼓峯事件的時候，一般人如瘋如狂的歡欣鼓舞，以為日俄大戰一定爆發。我當時和一位朋友相賭，如果這次事件會擴大，可以砍去我的頭。饒倅史達林同志，和我要好，替我把頭保住。現在滿蒙邊境的衝突，一定又有許多人在那裏懷着很大的期待，假使我又以頭來相賭，我相信史達林同志，仍舊還要和我要好，仍舊會替我保持的。至於俄國若斷若續，拿來換我們的茶葉和鎢等物的一點點飛機大砲，那何異醫生打給氣息奄奄的病人的鹽水針。要靠這點東西，去獲得最後的勝利，豈不是癡人說夢！至於英美的對日制裁，這兩年尤其表現得明白。唯一的結果，只是美國政府，勸告飛機商人不要賣貨與日德義一類的國家。僅只這一點結果，能够幫忙中國打退日本嗎？現在重慶方面，對於英法蘇的同盟，美國中立法的修正，以及英法新加坡的會議，一定抱着很大的期待和興奮，以為這樣一來，國際形勢，一定可以變化，抗戰的勝利，一定可以達到，在那裏自言自語的自己安慰。我相信即使英蘇同盟成功，美國中立法修

正，要靠這兩事實所引起的變化，來完成中國的勝利，是絕對不可能的，何況這兩件事的本身，還是前途遼遠，難關重重呢？至於新加坡的會議，其性質全係守勢的，那自然沒有什麼影響及中國了。總而言之，無論那個國家，各有各的利害，各有各的環境，不顧自己的環境和利害，單因為同情而替別的國家和另一國家打仗，只有我們中國，才做這種蠢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在個人與個人之間，還不多見，怎能希望於國家與國家之間呢？或則有人以為日本要實行東亞門羅主義，破壞門戶開放政策，所以英美為着自己的利益，一定會和日本打仗。這話可從兩方面觀察：第一，日本是不是要在中國排除第三國的權益，我以為日本的外交政策，決不至這樣愚笨，最近會着日本朝野人士，更證明我的觀察不錯。小的磨擦，當然難免，根本要排除英美勢力，日本現在，確實沒有這樣打算。第二，即使日本要這樣做，英美也不會因為在華的權益和日本打仗，至多也不過經濟制裁。而經濟制裁，是否能置日本於死地，又是很大的疑問。所以想從國際形勢民變化中，去尋中國的最後勝利，不是空中樓閣是甚麼？至於日本是否崩潰，我現在不願多說，以免為日本辯護，替日本宣傳的嫌疑。但是當時我就說過，如果戰爭延長下去，日本當然是要愈益困難的，但是日本感覺着癢的時候，中國已感覺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覺着痛的時候，中國已會因痛而死了。這不是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只要冷靜的剖析一下客觀事實，就可明瞭。所以日本也許崩潰，但是中國崩潰在前。因此，想在日本崩潰之中，尋求中國的最後勝利，也何嘗不是空中樓閣！

以上所述的事實，雖然是事後回溯，也許說我是「事後有先見之明」，但是在當時確早已料到要從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日本內部的崩潰之中，去求中國最後勝利，是斷沒有希望的。只要是稍有民族思想和愛國精神的人，誰願做敗北主義者？但是鐵一般的事實，決不容許我們的空想。因此，我斷定戰必大敗。

然而戰必大敗，和却未必大亂。當然，當時——現在仍舊如此——共產黨，桂系和其他失意無聊的份子，都以抗日為倒蔣的工具，拿着抗日的題目，去逼迫蔣先生。但是如果蔣先生在適當的時期，毅然主張和議，政府的力量，實在足以控制全國而有餘，實在足以壓服各種反對勢力，使不至於大亂。不單是當時，就是現在，如果重慶方面，一旦覺悟，停戰議和，雖然共產黨會拚命的反對和搗亂，但是決不致使政府動搖，決不致使天下大亂。這種理論和事實，只要是稍為明白各種情況，稍為有點常識的人，一定可以明瞭，此地不必多說。因此，在兩年以前，我就斷定和未必大亂。

在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堅確的認識之下，我和幾位朋友，就一面設法約人直接間接向蔣先生進言，一面設法傳佈我

們的主張。汪先生的主張，是完全和我們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爲此事寫給蔣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當面也談過多次。所以我們當時就無形中以汪先生爲中心，醞釀和平運動。溥巧主張相同的幾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裏，有些每日必來，於是空氣漸漸傳出，漸漸引起了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們毫不顧忌，而且把我們這個小小的團體，叫做「低調俱樂部」。有一天在富貴山大地地下室裏辦公，熊天翼約我到一個祕密的房間，很嚴重的對我說道，「你要小心，不宜亂說話。廣西方面某要人，說你是非戰集團的主要人物。」我謝謝天翼的好意，對他說：「中國人只知自愛，而不知愛國。如果我們認爲於國有利的主張，爲甚麼這樣愛惜羽毛，藏在心中而不說呢？」

在當時，我們當然知道立即停止戰鬥行爲，不僅是不可能，而且是不應該。我們主張一面猛烈的抗戰，一面不能斷絕外交的線索。這種線索，不僅不應該斷絕，而且應該漸漸的加強，以便於適當時期，接洽停戰。同時，我們主張在堅強的軍事抵抗之外，不宜從別的方面，再給日本以刺激，再授日本以口實，使他們作爲擴大戰爭的理由。不幸我們所不願意的現象，繼續不斷的發生了。中俄互不侵犯協定成立了，蔣先生容共的談話發表了。前者給日本以刺激，後者授日本以口實，是毫無疑義的。當中俄協定公佈後的兩三天，某晚我聽見蔣先生的容共聲明，明天就要發表，我覺這兩件事，先後接着發表，實在是毫無好處。就和熊天翼商量，最好請蔣先生稍緩發表。天翼也以爲然，溥巧蔣先生那晚約他談話，他就陳述這種意見，並蒙採納。但是只延遲了三天，結果，終於發表了。於是我深刻的認識了抗日勢必聯俄，聯俄必須容共的命運。因此更痛切的感覺，內有惟恐天下不亂的共黨，外有圖收漁人之利的蘇聯，戰事一定擴大，一定延長，而使中日雙方，兩敗俱傷，而爲他們的犧牲了。

羅斯福忽然在芝加哥發表了演說。這種空砲，在我們看起來，不僅於中國沒有好處，而且還有不利的結果。因爲一方面足以增加中國無知之徒的虛矯之氣，一方面更給共產黨及高調主義者以口實；同時實際的援助，却絲毫沒有得着。所以結果，適足以擴大中日的戰爭，而使之繼續。因此，羅斯福先生的用意，雖然和史達林同志的不同，但其結果却是一樣。但是召集九國公約國會議的消息，忽然的傳播出來了。這却給我們低調俱樂部同志以莫大的興奮。我們的根本見解，本來主張中日的關係，應由中日直接交涉來調整。九一八事變的根本錯誤，便在不直接交涉而委諸國聯。否則，事態決不致惡化到現在這個程度。所以這次事件，如果由九國會議來解決，無論日本不肯參加，就是參加，也一定得不到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但是

慰情聊勝於無，也許比京會議，能開一個和平之門，爲中日兩國，造成直接交涉的機會和環境。同時，我們以爲美國一定和日本，事前有相當的接洽和諒解，決不至冒冒失失的隨便召集。因此，我們對於這個會，抱着相當的熱情和期待。萬想不到冒失的國家不單是中國，美國並未和日本有相當的接洽，更沒有相當的諒解，也沒有想到如果日本不參加，美國的面子，怎樣過得去，會議怎樣能下台？於是比京會議，就此無疾而終了。

金山衛登陸了，前線崩潰了，中央議決撤退南京了。我於十一月十九日晚奉命離京。二十日一早，於淒風苦雨，愁雲慘霧之中，驅車到陵園，向陵墓遙拜告辭，再繞市街一週，含淚上船。所謂倉皇辭廟的悲慘情形，不圖親身經歷，也算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了。離京後一直回到長沙。父老相告：「傷兵遍地，無惡不作，將來日本軍隊還沒有來，我們恐怕在傷兵潰勇散匪的蹂躪之下，早已死無噍類了。」父老的言猶在耳，幾個月之後，真的日兵未到來，而長沙已燒得精光了。

正在坐困愁城的時候，漢口忽然來了一個電報，說是和局有望，要我立即到漢口。這却使我莫明其妙了。南京危在旦夕的時候，怎樣還和？難道日本當局，真和俾斯馬克一樣，屯兵城下，來和我們講和嗎？當晚打長途電話去問，才知道是陶德曼的調解。這中間的詳情，請讀者看汪先生「舉一個例」的論文。當時便立即擁擠上幾無隙地的火車，到了漢口，但是不到幾天，調解失敗了，南京陷落了，各線都崩潰了。那個時候的情形，現在實不忍回憶。

陶德曼第二次調解又來了。我們一般低調的同志，當然也相當的興奮，但是却没有懷着多大的期待。後來居然失敗了。接着日本政府，就發表一月十六日的聲明，於是和平機運完全中斷了。

我們覺得世無不和之戰。英法若斷若續的打了一百年，結果還是個和。要說不和而結束的戰爭，歷史上當然也很多，最近的阿比西尼亞，就是一個例。我們當然不願學阿比西尼亞，那末，當然最後還是要講和了，即使中國能够最後勝利，至多也只能把日本軍隊，打出中國。我們要把日本當做阿比西尼亞，也是萬萬不可能的。然則結果還是要講和，「抗戰到底」，底是甚麼？底在那裏？如果不願談和，那何異說要「抗戰到亡」呢？在這個基本認識之下，我們幾個同志，雖然力薄勢微，沒有方法挽回劫運，但是我們不死心，不絕望，我們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門，不要全關，和平之線不要全斷。這中間慘淡經營的經過，現在沒有到公開的時期，只好留待將來了。

爲着振奮人心起見，召集了代表大會和全體會議。我於是實際上便擔負起中央宣傳部的責任了，這是我頂痛苦的一件

事。我是相信抗戰下去，是要滅亡的，但是宣傳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後勝利。我是主張和平之門不全關的，但是宣傳上却要鼓吹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於是我便想盡方法，向蔣先生辭職，拖了三個星期不去接事。結果未承蔣先生允許，只好勉強担任，一天到晚的講鬼話，瞎吹牛了。這是我對不起人民的大罪惡。最痛苦的是每週的三種會議：一個是中宣部政治部和其他有關宣傳的各機關的宣傳會議，一個是召集外國記者的談話會，一個是本國記者的談話會。出席的政治部方面是部長陳誠，副部長周恩來，廳長郭沫若，中宣部是我和董顯光，蕭同茲。每次會議，聽着陳誠一知半解的政治理論，真使人啼笑皆非。聽着周恩來，郭沫若等捏造事實，欺騙民衆的報告，真使人切齒痛心。但是以我的地位，怎好針鋒相對的明白反對。所以我當時的宣傳方針，便提出科學和理性。我要大家根據理性，運用科學，去認清事實，不可爲盲目的感情所驅使。八月底到了重慶，在重慶的一個多月，大部份的精力和時間，用在對共產黨的鬥爭。當時歐洲風雲，非常緊急。於是重慶便發生了兩派議論；一派以爲歐戰一定發生，而且於中國有利；一派以爲歐戰不會發生，如果發生，於中國不利。我們是主張第二種見解的。昏天黑地的孫科及其黨徒，鼓吹第二種議論。於是孫派對於宣傳部雖然不敢明白的攻擊，却慢慢的開始反對了。歐戰是否發生，已有過去八九個月的事實證明，不必多說。但是就是現在，也還有許多人主張歐戰於中國有利，而希望大戰發生的。所以我們不能不說幾句話。在他們的意思，以爲英法俄一條陣線和日德義一條陣線的戰爭，最初也許後者占優勢，但是他們都是窮國，經濟力決不及前者，所以最後的勝利，必屬於前者。我們中國，就可在這個世界戰爭中的總結算中，得到完全的勝利。像這樣持之有故，言之並不成論的論調，或可用來作無聊的安慰，如果真正用做抗戰到底的根據，那實在太危險了。第一、假使這個推測，一點沒有錯誤，中國究竟能否支持到世界戰爭的總結算，不單是一個問題，而且可以說絕對不可能。支持到兩年，已經是意外了。以後海口全被封鎖，法幣日益跌落，武器的供給，壯丁的徵集，人心的渙散，沒有一件事，不比以前困難幾倍。歐戰甚麼時候發生，我們要等，發生之後，甚麼時候才到總結算，我們又要等。我們能支持到這樣的無窮期嗎？打算畫餅來充饑，結果，餅還沒有畫成，人早已餓死了。第二、美國是否參加，尤其是要緊的日本是否參加，乃是決定要素。論者都是假定日美各會參加一方的。這種假定，能否成立，乃是一個絕大的問題，美國前次參加了歐洲大戰，上了一個大當，至今大部份人猶引爲恨。所以孤立派的力量，實際上可以支配政治。理想主義，固無是美國的特長，但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算盤終是要打的。既然上了一次當，那裏會再上第二次？至於日本，如果仔細的研究，參加歐戰，於

他們是沒有好處的。至少在戰爲發生之初，他們是不會參戰的。在日本立場，一定應在有利的形勢之下，才去參加。所以日本永久不參加，則歐戰的誰勝誰負，決不至影響及中日戰爭。如果日本在有利的形勢之下參加，則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日德。所以想從世界混戰的總結算中間，去求中國的最後勝利，這個迷夢，實在可醒了。

在重慶和共產黨徒及孫科等準共產份子，在宣傳上和理論上奮鬥了一個多月，九月底又飛到漢口了。那個時候，武漢的景象，已非常蕭索。在四面楚歌的中間，召開慶祝雙十節的民衆大會。我當主席，我竟不知道說甚麼話才好，勉強幾分鐘違背良心的話，郭沫若忽然造個謠言，當衆報告軍令部來電話，南潯正面大捷，殲滅了八千多敵人，還有萬多正在包圍中。於是羣衆跳躍狂呼。像這種欺騙民衆的舉動，實在令人憤慨。但是當時我能當衆說出這是捏造的嗎？低調主義者，聽着高調，已經是心煩意亂，還是跟着唱高調，我還能長久耐下去嗎？

天外飛來的消息，廣州失陷了。武漢的陷落，也迫在目前了。照例當這種嚴重的局面，一定頒布一個宣傳方針，以安定人心。但是我實在找不出甚麼理由，可以說話。要說武漢沒有軍事的價值，那末，以前爲甚麼要高唱保衛大武漢？要說敵人越深入，他們越困難，那末，爲甚麼要抵抗，爲甚麼不就請他們深入呢？假使有個老百姓問我，鄙人忝爲宣傳部長，實在無可以對。在無可奈何的時候，我和陳博生商量，擬了一個宣傳方針。這個方針，我自己都不能相信，那裏能使別人相信呢？武漢是十月二十五晚失陷的，我於二十四深夜昏黑之中，飛往成都，轉回重慶。不到幾天，長沙大火的消息又來了。當時苦悶、煩惱、和焦急的心境，真非筆墨所能形容，但是一般的人心和情形怎樣？沒有一個人不想和，沒有一個人敢說和。兩個人關着門說話，沒有不疾首痛心，詛咒戰爭，希望和平的。但是有了三個人，調子就高起來了。大家都懷着這種心理，就是和平，是千真萬真，自己所希望，所企求的，但是頂好別人主和，自己主戰。換句話說，就是大家希望別人做漢奸，自己做民族英雄。而這些民族英雄，不僅希望有所謂漢奸出來，代替他們說他們的話，而且從心坎中希望所謂漢奸的主張趕快實現。像這樣人人想和，人人不敢言和，人人心中裏希望別人言和，表面又要反對人言和的可悲的矛盾現象，如果任他繼續下去，一定會把國家的生存，民族的命脈，斷送得乾乾淨淨！可怕這種現象，不僅重慶、成都、昆明、內地各地是這樣，就是現在上海租界之內，大部份還是這樣。國家到了這個情形，大家還是以個人爲本位，以自己爲前提，叫人怎麼不痛心呢？

前面曾經說過，自從八一三以後，我們無形之中，就以汪先生爲中心，企圖以外交方式，結束戰爭。現在到了這種嚴

重局面，我當然要去請教汪先生。當時汪先生痛憤尤多，感觸更深，對外說老實話，共產黨徒固不待說，孫科之流也加以攻擊。一般同情的人，不僅不敢明白表示，甚至假作反對。向蔣先生提出意見，始終沒有確實的結果。但是在重慶有甚麼辦法呢？所以汪先生以毅然決然的精神，決定爲國家爲民族，犧牲自己的一切，離開重慶，以便公開的發表和平主張，從事和平運動。我的主張既然和汪先生一樣，又爲汪先生的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所感動，所以也決心擺脫一切，追隨汪先生，爲國家民族，盡我應盡的責任了。

但是我的決心，是經過了一個月以上的考慮，有時甚至徹夜不能睡眠，然後才行決定的，國家的利害問題，我早已決定，因爲我深信只有和平，才能救國，所以這一點，不必重行考慮。個人的利害，更不成問題。既要打破環境，以開風氣之先，當然要犧牲個人的地位名譽。所以這一點，也沒有費多大的考慮。最使我遲疑不決的，乃是情誼兩個字。等一、十年來，承蔣先生提攜栽培，纔得有今日。過去蔣先生決沒有對我不起的地方。如果一旦脫離重慶，在我的居心，固然沒有絲毫反對他的意思，但是因爲主張不同，事實上不能不處於對立的地位，在私情上，是萬分難受的。第二、在黨部，政府，和軍隊之中，我的很好朋友不少，此去不單音信難通，而且後會無期，這也是足以使我留戀的一大原因。這一個月的光陰，使我經歷有生以來未曾經過的痛苦，飽嘗人世間少有的煩悶。但是經過了極端的煩悶痛苦，我仍決定犧牲私情和友誼，脫離環境，努力主張的實現和貫徹。

我們的和平主張，怎樣纔能貫徹？換句話說，我們的計劃和步驟究竟怎樣？這當然是讀者所亟欲知道的，不過事關秘密，現在還沒到公開的時期。現在只提出讀者的幾個疑問，一述個人的意見。

第一個疑問，便是條件問題。和平的條件，是否會使中國失去獨立？是否會使中國不能生存？這個疑問，是每個愛國的中國人所必有而應有的。如果日本真想以外交方式及和平條約來妨礙中國的獨立與生存，那末，汪先生和我們當然也要主張抗戰到底的。因爲，既然戰亡，和亦亡，當然與其和而屈服的亡不如戰而悲壯的亡，還可以在歷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痕跡。但是不論日本居心如何，事實上他是不能滅亡中國的。既然不能，當然就要和，既然要和，當然應該提早，以免雙方受戰爭的損失。有人或以爲抗戰越久，將來講和的條件，必於吾國越有利。如果吾們的抗戰形勢優勝，這個話是對的。像過去一樣的失城失地，恐怕抗戰越久，亡國越快，那裏還能希望有利的條件？

汪先生的發電和近衛聲明中所述的各點，便是中日議和的根本原則，近衛聲明所述的各點，是不是亡國的條件？不割地、不賠款、不駐兵、這能說是亡國的條件嗎？我們試把近衛聲明所提出的各點和二十六年十一月德大使陶德曼調解時所提出各點一參看。汪先生的「舉一個例」一文對照比較一下。除着近衛聲明中多一個日本人民的中國內地希望有居住及營業之自由，而日本可以放棄領事裁判權，甚至考慮交還租界以外，其餘各點，都是一樣。對於陶德曼所提出的各點，最高軍部幹事會議，既認爲不是亡國條件，（參看前舉一文）何以對於近衛聲明中所述各點，却說是足以使中國滅亡？我們再想一想時期，陶德曼的調解，是在南京沒有陷落之前，近衛聲明，是在丟了南京，失了廣州，放棄了武漢，燒光了長沙以後。打仗打敗到這個程度，而議和的條件，比以前沒有很大的苛刻，爲甚麼當日可以接受和解，現在却反對進行交涉？日本人民在中國內地雜居，自然是陶德曼調解時所未提出的，能够打銷，當然希望打銷。但是日本如果放棄了領事裁判權，並且交還租界，那末內地雜居，也不會使中國滅亡。因爲日本既然放棄了領事裁判權，所有在華的日本人民，都要服從遵守中國的法律，我們可以國內法來管理他們，怎樣會使我們中國亡國？

根據上述，可見議和條約，決不是亡國的。如果我們最後勝利的充分把握，那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否則，抗戰到現在這樣的情形，還能够得到這樣的條件，平心靜氣，也可以滿足。我們主和的人，良心上也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了。

第二個疑問，便是沒有保障。有許多人以爲日本沒有信義，如果直接交涉一定會上當，因此，主張第三國居間調解，最好能在國際會議之中，解決中日糾紛，纔能够得到保障。

這種顧慮和主張，都是對的，能够這樣，誰不願意。但是中日直接交涉乃是九一八以後日本的傳統政策。這個政策要他們取消，是不可能的。既然日本主張直接交涉，我們是否僅僅因爲亦涉方式的問題，情願犧牲比較輕鬆的條件，情願抗戰到亡呢？我們只要是忠誠的謀國，當然情願得到較好的條件，而不願拘泥於交涉形式的。

再進一步看，有沒有保障，全在我們如何的做法。我們自己已有辦法，就有保障。如果自己毫無辦法，甚麼保障都是靠不住的。歐戰以後，英法對於德國和議的條件。是有充分的保障的。英法左手拿着凡爾賽條約，右手拿着國際聯盟，德國還能不規規矩矩的履行條約嗎？但是凡爾賽條約撕破了，保障在那裏？即就中國而論，九國公約，是保證中國的神聖條約，但是除掉在法理上主張不承認主義以外，在事實上給中國以甚麼實際的保障？現在希望英美法出面，他

們都是九國公約的簽字國，他們既然不能根據九國公約來保障，另開一種會議，新訂一種條約，就可以保障嗎？所以問題只在我們如何做，國際保障，也是靠不住的。

然則一點保障都沒有嗎？當然是有的。近衛聲明中的各點，是經過他們五相會議，內閣會議通過，再經御前會議，而公開發表於世界的。他們御前會議所決定的政策，是不容易變更的，此其一。他們既然昭告世界，向中國所要求的條件，在全世界的注視之上我相信日本決不致這樣不講信義，將來再提出苛刻的條件，此其二。有了這兩重保障，我相信將來開始正式談判的時候，日本決不致於近衛聲明各點之外，再提出其他的要求，如果日本真正這樣不顧信義，那裏能立國於世界。

第三，是日本的誠意問題。假定正式和平條約，完全根據近衛聲明和豔電而成立，日本不是誠心誠意的來履行呢？這也是每個愛國的中國人所必有面應有的顧慮。

我從各方探聽關於和平的意見，大約十分之九是贊成和平，而十分之九是懷疑日本的誠意的。他們的懷疑，是好意的，共產黨徒，因為要反對和平，所以惡意的宣傳日本沒有信義。一般人因為希望和平，所以恐怕日本沒有誠意。這種懷疑，足以供我們主和同志的參考，同時也可以促日本人士的反省。我常常聽見說，日本的話，說得很好聽，日本的聲明也說得極漂亮，但是實際上所做的事，完全不是這樣。口口聲聲所說的平等互惠的經濟合作，事實上完全表現為壟斷。英美的經濟侵略，還替中國留下一點生機，像最近一年來，所表現的經濟合作，比幾十年來的經濟侵略，要厲害得多，幾乎不僅把肉吃光，連毛帶骨都要吃得乾乾淨淨，使中國沒有生存的餘地。我又常常聽見說日本內部的意見紛歧，派別複雜，東京所約定的事情，常遭當地軍人的反對，上級當局同意的事下級機關可以不奉行。甚至在同一城中，城北甲機關所發的速行證，不為城南的乙機關所承認，這種情形，使平時對於日本有好感的人，也漸漸覺得毫無辦法，漸漸覺得憂慮和疑懼。這些感觸，都是根據事實，決不是憑空發生的。所以，不懂中國主和的同志，應該充分的注意，就是日本人士，也應該慮心坦懷的去檢閱。這樣疑懼的心理，和不合理的事在，我們當然盡量的告訴日本朋友。我們表示如果這種疑懼的心理不消除，中日的真正親善，是沒有希望的。而消除這種疑懼，必須首先糾正種種不合理的事實。單憑聲明，是絕對不夠的。十餘次愛護中國人民的聲明，他的效力會被城門口的日本兵士給中國人的一個耳光所抵銷，一百回尊重中國內政獨立的聲明，他的影響遠不及宣撫班長給縣長的一頓臭罵。諸如此類的事實，如果不切實糾正，不僅一般人民不易消除反日的情緒，就是我們，也要回到重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214 5705B

汪精衛主義讀本 上冊

民國卅一年二月十五月初版

編輯者 江蘇省教育廳

校訂者 袁 殊

發行者 政治月刊社

上海郵政信箱一七〇六號
南京中山東路太平路口

經售處 上海 街燈書報社 五洲書報社

至誠堂 三通書局

復興書報社 內山書店

上海書店 大陸書房

日本堂 金星堂及各大書局

外埠 南京 建國書店

蘇州 新國民書店

中央書報發行所各地分銷處

實價每冊一元八角正

